



情系毛泽东

# 情系毛泽东

蒋建农

湖南人民出版社



情系毛泽东

# 情系毛泽东

蒋建农

湖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情系毛泽东 / 蒋建农著 .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 2012.12

ISBN 978-7-5438-9002-2

. 情... . 蒋... . 毛泽东思想研究—文集  
. A8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2 ) 第 285377 号

书 名: 情系毛泽东 —— 学习研究毛泽东论文集

作 者: 蒋建农

---

出 品 人: 谢清风

责任校对: 李姗姗

责任编辑: 赵颖峰

封面设计: 叔冰设计工作室

特约编辑: 曹福双

版式设计: 宋晓璐

---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

字 数: 230千字

印 张: 21.5

版 次: 2012年12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8-9002-2

定 价: 45.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 目录

## CONTENTS

- 序：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 001
1. 关于党对苏区私营企业政策 | 001
2. 土地革命中毛泽东对富农政策的演变 | 013
3. 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 027
4. 长征：团结胜利的战歌 | 043
5. 红军长征的最早记录 | 055
6. 长征中围绕领导权的斗争 | 069
7. 中国革命中心的北移与陕甘根据地的战略地位 | 089
8. 斯诺 1936 年的陕北之行及其著作的流传 | 105

9. 毛泽东外交生涯的开端：《毛泽东年谱》编写补记 | 117
10. 毛泽东、共产国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125
11. 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特贡献 | 147
12. 毛泽东抗战时期外交活动研究 | 163
13. “一边倒”的政治决策与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 | 183
14. 毛泽东：社会主义中国的奠基人 | 195
15. 毛泽东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历史贡献 | 209
16. 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及其历史局限 | 225
17. 口述史料：毛泽东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 | 235
18. 毛泽东最后的日子 | 243
19. 毛泽东的开放观与邓小平的创造性发展  
——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之一 | 249
20. 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力量源泉：“三个代表”  
思想的历史考察——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之二 | 261

21. 创造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境界：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生产力理论的发展历程——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之三 | 275

22. 实现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之四 | 287

附录：“毛泽东与我”征文总结 | 295

后记：毛泽东与我 | 303

# 序：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日报》以《学习毛泽东》为题，发表了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报告的一部分。周恩来围绕“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这一主题，从几个方面精辟阐述了如何向毛泽东学习的问题。今天重读周恩来的文章，结合回顾毛泽东的历史贡献，不由得使笔者想起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时，诗人臧克家曾经套用旧时塾师赞颂孔子的话，给笔者写过这样一幅字：“大哉毛泽东，大哉毛泽东。毛泽东之前没有毛泽东，毛泽东之后谁若毛泽东！大哉毛泽东，大哉毛泽东。”

## 一、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一百二十年以前，中国——湖南——湘潭——韶山，一处坐落在偏僻山坳里的普通农居，诞生了一个男婴，他就是毛泽东。正像那首被后人争相咏唱的歌曲中所写：“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是 20 世纪的大变革年代改变中国面貌的一代历史伟人。

一个偏僻山村的农家之子，生活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却成为推动中国

历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世纪伟人。是什么铸就了毛泽东？是什么使他摆脱了父亲为他设计的由米店学徒逐步发家致富的道路？是什么使他由一个说湘潭土话的私塾学生成为五四时期的一方青年领袖？是什么使他由相信皇权至上发展为信奉维新改良，进而成为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什么使他由崇拜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到确定马克思主义为其一生一世的唯一信仰？是他救国济民的赤子之心，是他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目的的宏大志向，是他“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不断进取精神。

毛泽东对真理的追求是执著的。为寻求救国之路，他走三湘、下武汉、两上北京、三赴上海；为求民众的大联合，他从发出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到组织新民学会、俄罗斯研究会和自修大学，直至参与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创建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对真理的追求又是务实认真和富有创造性的。湖南中共地方组织的建设，与上海、北京等地相比不能算是开展得早的，但是由于毛泽东在工作中的深入细致，而成效显著，一再得到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的赞许和推崇；湘区近代工业在全国而言，也远谈不上发达，但在以毛泽东为主任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发动组织下，湖南工人运动却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1923年“二七”大罢工被残酷镇压后，全国各地职工运动都陷于低潮，唯有毛泽东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这被著名的职工运动领袖邓中夏称为“硕果仅存”；出身农家的毛泽东，和国民党没有任何渊源，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却因他执行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真诚和坚定，因他卓越的统战才华和远见，受到国民党左派的推戴和右派的敌视，不仅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还一度出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也不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从事现代农民运动的，在他1925年冬回韶山开展农运之前，浙江

萧山衙前和广东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早已经闻名遐迩，但是毛泽东经过认真的调查和科学的分析，最早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了革命，由他领导发动起来的湘、鄂、赣、豫四省的农民在几个月内就成就了“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完成的事业”；除去1911年辛亥革命时在湖南新军中的半年下士经历外，毛泽东谈不上有什么军旅阅历，更没有读过一天军校，但他却在革命的洪流中切实感受到了建立革命武装的急切和重要，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明确地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如果说1918年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时是作为后起之秀投入中国社会变革洪流的话，那么，经过近十年的砥砺锤炼，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他已经成长为具有独立见解的坚定的革命领袖。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领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毛泽东这不无懊悔的话语，透映着他思想的成熟。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大的危急关头，他毅然回绝了要他去苏联留学或是去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工作的建议，而选择了“下湖上山”，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之路。

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毛泽东，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暴风骤雨所造就的一代历史伟人。

## 二、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中国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而且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对此问题上的独特贡献，不仅在于他从更深刻更广泛的意义上论证并阐明了斯大林关于中国

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一著名论断，更主要的在于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在产业工人数量少而广大农民居于革命战争主力地位的情况下，中国的无产阶级如何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而不是在敌人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领导其可靠的同盟军——农民，通过武装斗争取得革命胜利的问题。

作为一个从未带过兵的师范毕业生，毛泽东凭着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从浏阳文家市到永新三湾村，到宁冈，到茨坪，直至赣南、闽西和闽粤边，深深地印下他跋涉探索的踪迹；蒋介石，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粤军参谋长、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总司令的阅历，但留下的却是“进剿”、“会剿”、“围剿”，一次次失败的耻辱。这绝对是两个等量级的较量。毛泽东靠什么能打败蒋介石指挥的精锐之旅。靠的是众志成城，靠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靠红军指战员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毛泽东把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有机地统一起来，创造了红色政权的理论，并进而独立自主地开辟了有别于城市中心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实践证明，这是唯一能引导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光辉道路。在这条道路的指引下，全国各红色根据地人民和各路红军同中外反动势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先后开辟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红军最多时发展到三十万人，特别是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这给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苦苦挣扎的四万万同胞带来了希望，正如毛泽东当时所描绘的那样：犹如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犹如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犹如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通往胜利的大道并非尽是坦途。毛泽东能指挥他这支原来并不被人们看重的农民武装粉碎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国民党正规军的一次次“围剿”，却无法

说服党内那些奉共产国际决议为神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指挥。他因坚持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主张，而一再受到指责和排挤。眼见亲手创建的红军在强敌的进攻下受挫而锐减，苦心经营的苏区在一块块地丧失，毛泽东的心情是万分沉痛的。但是他没有消沉，而是尽可能的设法避免和减少“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害。为了扭转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败势，他几次犯颜直谏，而不被采纳。在长征的危急时刻，为防止红军在国民党军的重重围追堵截中被彻底围歼，他又反复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师的原定计划，力主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开进。在他的积极努力下，1935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的生死关头挽救了革命。从此，中国革命的航船有了毛泽东这位伟大的舵手，英勇的红军在他的指挥下跨越万水千山，踏上胜利的彼岸。

### 三、没有毛泽东，中国至少还要在黑暗中 再徘徊二、三十年

“没有毛泽东，中国至少还要在黑暗中再徘徊二、三十年。”这是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中肯评价，也是对中国革命自遵义会议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二十年间，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的客观总结。在这二十年间，虽然中外反动势力的进攻依然强劲，虽然中国革命的任务依然艰巨而复杂，虽然还有过无数次惊涛骇浪的拍打冲击，虽然在很长时间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还处在要为一个连部的照明油灯究竟是用一根灯芯还是两根灯芯而筹措的困境，但是航向已经明确，党的核心领导空前的坚强有力。因此，再也没有出现像大革命后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中期那样，来自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路线对中国革命的全局性的颠覆和失误。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劈波斩浪，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和险阻，

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毛泽东征尘未洗就投入到摆脱尾追之敌、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急迫任务之中。他亲自率部东征，运筹西征，联合张杨，抗蒋拒阎，迎接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毛泽东为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日夜操劳，更为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亡而焦虑。如果说长征中毛泽东指挥红军战胜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从而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他对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贡献的话，那么，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段关系的变化，正确地制定并促成坚持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最终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在近百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无数次斗争中，终于第一次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这无疑是对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的一个伟大贡献。

在中国人民求生存、求解放、争独立、争民主的奋斗历程中，毛泽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他不仅在理论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而且在实践中他始终战斗在按照这一理论对敌斗争的第一线，并且承担了最重要的领导职责，表现出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在毛泽东身上，敢于胜利的斗争精神和善于胜利的超人智慧是交相辉映的。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了争取一个光明的中国，他毅然亲赴重庆和谈，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在和平协议被蒋介石撕毁后，面对气势汹汹的几百万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他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著名论断，并在战争中阐明了十大军事原则，领导解放区军民先后粉碎了强敌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在转战陕北的艰险岁月里，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眼光和气魄，指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使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随后，他和他的战友们精心部署并指挥了同国民党军的战略大决战。这场大决战，其规模之大，参战人数之多，战况之激烈在中外历史上都属罕见。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彻底埋葬了蒋家王朝，也彻底结束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的黑暗统治。

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一个世纪以来千百万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反复构想过的奋斗目标。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在隆隆炮声中的胜利推进，毛泽东开始逐步把主要精力转向创建人民共和国的工作。1949年元旦，他发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号召各族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同年3月，他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讨论和制定夺取最后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具体战略；6月，他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全面阐述新生政权的国体和政体；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式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次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具有宪法意义的《共同纲领》，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49年10月1日，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 四、毛泽东——社会主义中国的奠基人

当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时候，萦绕在他心际的既有胜利的自豪和喜悦，又有任重道远的历史责任感。但他坚信：“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

医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开国之初百废待举的局面，担任党、军队、国家和政协最高领导职务的毛泽东，凭借着多年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知识，审慎地观察和研究领导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所面临的新问题。他和战友们一起为新中国制定了一系列的基本国策，使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在政治上，他狠抓民主建政工作，在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基础上，于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由他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并建立、健全了各级政权机构；在经济上，他在领导全国人民平抑了建国初的大涨价和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之后，致力于合理调整工商业结构和全面恢复经济，医治战争创伤，经过三年的努力，初见成效；军事上，他指挥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进军，彻底肃清大陆上残余的国民党军队，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完成了除台湾等岛屿之外的祖国大陆的解放和统一；在外交上，他为新中国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周边国家、对敌视新中国的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分别采取了“一边倒”、睦邻友好和开展民间外交等政策，迅速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封锁，树立起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思想文化工作方面，他积极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方针，号召广大知识分子通过参加土地改革等社会实践，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为了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为了保卫和巩固新生政权以及捍卫国际主义原则的需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这三大运动的胜利，从根本上消灭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剥削制度，基本上肃清了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再加上没收官僚资本和对

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资产的冻结的清理，大大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济秩序。

在这种政通人和、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毛泽东开始酝酿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他把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制定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采取一套切实可行的理论和方法，用非暴力的方式，顺利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消灭了持续几千年的剥削制度破天荒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奠定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基石。这是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又一个划时代的伟大贡献。

## 五、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个最基本的经验，就是提出和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循着这条路子，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全党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独立自主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占领城市的中国革命之路，从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还是循着这条路子，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毛泽东又独立自主地开辟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之路，使中国确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仍旧是循着这条路子，毛泽东没有盲从他国的建设经验，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伊始，就率先开始探寻与苏联不完全相同的适合中国实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对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中国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经济状况做出正确的分析与判断，最早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尽管曾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失误，但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直是他始终不渝的奋斗

目标：他独创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认为可以把社会主义社会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他提出并阐明了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这样一条有别于苏东国家的，实际是工农业并举的工业化道路；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主要矛盾、基本矛盾），特别是创立了关于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他提出要对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兼顾国家、集体和生产者个人三方面的积极性，要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办法等；他系统地论述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并响亮地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毛泽东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多方面的，从微观到宏观，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比如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方面，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政党制度、民族政策等都作了原则的规定和深刻的阐述。当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国家因民族问题四分五裂时，人们无不深感毛泽东为新中国确定的民族区域自制政策的英明与伟大。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特别应强调的是，毛泽东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率领全党共同进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他鲜明提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号召全党“必须从实际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

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了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正是由于他注重调动和发挥全党同志的智慧，才使得全党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全面的丰硕成果，并指导中国的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江泽民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大会上曾经精辟地概括了毛泽东的卓越贡献，他说：“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一个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的国家。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一个除台湾等岛屿外实现统一的国家。一个人民备受欺凌压迫的国家，变成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享有民主权利的国家。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走向经济繁荣、全面进步的国家。一个在世界上被人们看不起的国家，变成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国家。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为我国迈向光明的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在探索中也有过偏差和严重的失误，并且由于他的失误所造成的教训也是非常沉痛的。但那毕竟是探索中的失误。如果毛泽东当年不是顶住各种压力另辟蹊径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而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走，那不仅意味着中国会走上一条不那么明朗的社会主义道路，甚至会成为苏联的一个“卫星国”，那么，一旦出现像苏东剧变时的情形，其后果不堪设想。邓小平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他在谈到毛泽东的失误时指出：“因为我们的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后人：“毛

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

可以告慰毛泽东的是，在他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人，仍然继续和发展着他的未竟之业，特别是秉承着他实事求是和勇于创新的精神，进一步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的口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开创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新的辉煌。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所开创的事业，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深情地指出：“历史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今天由昨天发展而来，明天是今天的延续。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和他们的战友们以及千百万革命先烈的伟大理想。他们为实现这一伟大理想殚精竭虑、前赴后继，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壮丽诗篇。今天，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的手中。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把老一辈革命家历经千辛万苦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诗继续谱写下去。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我们的事业伟大而艰巨，我们的前程光明而美好。”

# 1. 关于党对苏区私营企业政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苏区私营工矿企业，是苏区新民主主义经济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采取什么政策对待这些私人资本，是我们党在开展红色政权斗争中所不能回避的政治性问题。对此，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曾进行了反复的实践和探索。那时期在政策上的严重失误，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记忆。1948年2月，他针对片面强调工人阶级“眼前利益”的一些做法，语重心长地批评道：“他们忘记了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时期内实行过的那种‘左’倾冒险主义的工业政策与职工运动路线曾给予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与革命政府以何等重大的损害。”他强调：“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sup>①</sup>

---

苏区私营工业的生产方式，多是手工业。从经营者的阶级成分看，一部分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属于小手工业。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诚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所指出：他们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

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夺取革命胜利，对他们应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以争取他们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线中来，同时，注意防止他们的动摇和妥协。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小手工业主是革命的团结对象，因此，应当采取保护的政策。我们党在这个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曾几经波折。

土地革命刚刚开始不久，瞿秋白主持的党中央在对私人工商业的政策上就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瞿秋白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与地主豪绅已经成了绝对的反革命势力，对他们应该“彻底扑灭”。至于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店东、小厂主等以及所谓中小商人，“在现时亦已经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革命的障碍”。<sup>(2)</sup>基于这种认识，他错误地提出，在根据“使小资产阶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结果，因“小有产者（富农小商人）也同样的被打击，破坏后又没有注意建设，弄到社会一般的破产，经济没有出路，生活非常困难，顿呈一种萧凉景象”。<sup>(3)</sup>毛泽东在领导苏区的党组织和群众进行实际斗争中，渐渐地意识到这种错误的危害，并自觉地予以抵制。从而纠正了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在私人工商业政策方面的错误，使根据地的私营工业得到了保护。

1930年6月，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在李立三支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为着力争全国革命的胜利，不只是一定要没收帝国主义的银行、企业、工厂，使民主革命彻底，而且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以铲除反革命的武器。”<sup>(4)</sup>随之，开始对根据地的私营工业实行全面没收的政策，再次给苏区经济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危害。同年9月，“立三路线”被纠正，

它对私营工业实行全面没收的政策，随即也被纠正。

1931年初，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占据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统治。在苏区私营工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犯了更严重的“左”倾错误。虽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同志的坚决抵制，但直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始终未能得到彻底纠正。

## 二

“左”倾机会主义在私营企业政策方面的错之初步探误，集中地表现在劳动保护政策上。

以国家颁布劳动法的方式，将工人阶级的利益置于国家法律的保护之下，是我党的一贯主张。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各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在苏区出现了新型的生产关系。这时，苏维埃政府颁布劳动法，贯彻党的劳动政策，就是完全可能和非常必要的了。其作用就是通过调整劳资关系来维护新型的生产关系，维护劳动者的基本利益，从而使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得到广大劳动群众的支持。但是，这种劳动政策，必须按照现阶段的革命性质，从有利于改善工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有利于发展生产出发。否则，就会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一共制定和颁布了三个劳动法。它们的颁布和实施，使苏区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极大地调动了苏区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区工业生产的发展。

但是，在“左”倾冒险主义盛行的情况下，这些劳动法不可避免地夹杂了许多“左”的条文，尤其是1930年5月，李立三主持下通过的《劳动

暂行法》和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一苏大”劳动法）<sup>⑤</sup>“左”的色彩最浓。它们的贯彻，给苏区经济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劳动法应起的积极作用。这些“左”的劳动政策，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表现：

其一，机械地推行八小时工作制和过高的劳动条件。“一苏大”劳动法所规定的八小时工作制，作为大中城市工运斗争的口号，借以反对资本家用延长劳动时间的办法剥削工人，是正确的。这是针对城市中企业生产多系机器生产，工人劳动强度高的特点提出的。但各革命根据地多处于经济落后的偏僻农村，又面临游击战争的环境，基本上没有什么近代工业，只有规模不大的手工作坊和家庭手工业。在这种情况下，不顾根据地的实际和手工业生产的特点，不区别国有工厂、私营工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性质，一律硬性推行八小时工作制，显然是错误的。

“一苏大”的劳动法还规定：“每个工人每周经常须有继续不断的四十二点钟的连续休息。”“在任何企业内的工人，连续工作到六个月以上者，至少须有两个星期的例假，工资照发。在危害工人健康之工业中工作的工人，每年至少必须有四个星期的例假，工资照发。”并且，每年还有一些名目繁多的节假日，除去地方性的革命纪念日 and 传统节日外，还有一些在苏区实行的纪念日，如列宁逝世纪念日、“二七”纪念日、巴黎公社纪念日等等。纪念日全天休息，在纪念日和休息日（如星期日）“前一日工作时间，至多不超过六点钟。”这些规定，不从苏区的实际出发，盲目搬用苏联劳动法的有关条目，严重脱离了各革命根据地的实际。

其二，片面的社会福利要求。当时的劳动法除去有最低工资额（是根据社会生活情形和工人家庭必须费用作标准，由政府随时颁布，社会生活增

高，最低工资也随着增高)之规定外，还有许多片面的社会福利要求。如“无论何种企业必须发给工人工作专门服”，“雇主于应付的工资外，支付全部工资额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的数目，作为社会保险之基金。”社会保险的抚恤种类有：“免费的医药帮助”、“暂时失去工作能力者的津贴”、“失业津贴费”、“残废及老弱的抚恤金”、“婴儿补助金”等。另外还规定：“由工厂出资建筑工人寄宿舍，无代价的分给工人及其家庭住，未建筑寄宿舍的，每月由工厂津贴相当的房金。”所有这些都表现出超现实理想主义色彩，背离了苏区所处的发展阶段，大大超过了苏区私营企业的承担能力。

其三，在苏区组织同盟罢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不顾对象、地点、环境的变化，在根据地随意组织总同盟罢工，影响了苏区的生产运输和市场供应，影响了革命战争。当时，陈云就曾指出：“在根据地组织同盟罢工，不但妨碍商品流通的作战和行动，而且却被资本家利用去团结一致，来反对工人的斗争，来实施对苏维埃经济上的怠工。因此，这种总同盟罢工不但是斗争方式上的错误，而且是政治上的极大错误，非但对于工人阶级最高利益——巩固苏维埃政权没有任何利益，而且不能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与政治觉悟，不能正确地提高群众的积极性。”<sup>⑥</sup>

除去“左”倾的劳动保护政策外，“左”倾机会主义者还对苏区的私营企业实行了硬性摊派、征收、超负荷的所得税，甚至无条件地没收等其他“左”倾政策。这些“左”倾政策的贯彻执行，给根据地的经济事业特别是私营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首先，片面地强调工人对私人资本的监督，工人监督委员会的权力至高无上，无所不统，结果资本家以至店东、小作坊主的经营管理权被剥夺殆尽，甚至有学徒强制师傅劳动的现象。小有产者和资产者普遍失去投资

经营生产的积极性。不利于苏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其次，过高的劳动条件，过分的工资、福利支出以及不合理的摊派，大大超过了苏区私营企业的负荷力。因无利可图或难以支撑，私营工厂、作坊、店铺纷纷倒闭，企业主或裹挟资金外逃或消极怠工。这样，就使苏区经济日渐萧条，难以满足人民的日常生活，难以打破敌人对苏区经济的封锁，更难以支撑革命战争的后勤援助任务，严重影响了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

再次，由于对私营企业打击过重，结果白色恐怖一来，中间阶级马上反水，“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sup>⑦</sup>削弱了革命阵线，扩大敌对势力，孤立了自己。

造成这种“左”倾政策泛滥的根源，从客观上讲是我们党缺乏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的经验，加之严酷的战争环境压迫，容易造成敌我混淆。而更应引起人们重视的是主观上的原因。这主要有三：一是盲目学习苏联经验，不加鉴别地照抄照搬，搞一些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东西，二是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没有认识到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还有一个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过渡阶段，三是对于中国社会特别是苏区的形势没有清醒的认识，缺乏客观的分析，过于看重了苏区私人经济的资本主义因素，而没有认识到在红色政权下私营经济对苏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 三

上述情况说明，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干扰，使我们党在私营企业政策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失误。但仅是事物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十年土地革命时期，“左”倾机会主义并不是始终占据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苏区人民创建和巩固红色政权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推行了一些适合苏区私营经济特点和根据地实际情况的政策，在实际中逐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即使是在“左”倾机会主义占据统治地位时，许多同志还进行了勇敢的抵制和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左”倾政策的危害和损失，捍卫了党的正确路线。

我们知道，早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革命根据地之初，就曾提出“保护中小工商业”的政策。后来在同“左”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毛泽东又进一步结合苏区的实际，更加明确地指出：在苏区的多种经济成分中，国营经济和生产合作社事业是新生的经济力量，但十分弱小。私人经济“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时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因此，“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sup>⑧</sup>在这个基本的指导思想之下，中央和苏区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文件，具体的阐述了对私营企业的管理办法。

如1931年11月，“一苏大”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决议案》，规定了苏维埃政府对私人企业的基本方针。即：“苏维埃政府对于中国资本家的企业及手工业，现尚保留在旧业主手中而并不实行国有，但由工人监督

生产委员会及工会委员会实行监督生产。若这些企业主怠工破坏苏维埃法律或参加反革命的活动，故意破坏或停止生产，则必须立即没收他的企业，按照具体条件，交给工人劳动合作社或苏维埃政府管理。”<sup>(9)</sup>

1932年1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颁布了《关于工商业投资暂行条例的决议》规定：“凡遵守苏维埃一切法令，实行劳动法，并按照苏维埃政府所颁布之税则，完纳国税的条件下，得允许私人资本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境内自由投资经营工商业。”“无论国家的企业、矿山、森林等和私人的产业，均可投资经营或承租、承办，但须由双方协商，订立租赁合同向当地苏维埃政府登记。”<sup>(10)</sup>

可见，当时在政策上是允许私人资本存在的，并准许私人资本自由投资或承租、承办国家的企业、矿山、森林和私人的产业。私人企业的产权仍属私有，但须在工人的监督下组织生产。

那么，工人应该怎样行使对私营企业生产的监督权呢？在“左”倾机会主义者那里，他们把工人对私营企业监督权无限夸大，使企业主或作坊主几乎无权过问生产，再加上劳动法中某些条文的苛刻限制，实际形成了变相没收一切私营企业的局面。

这种“左”倾政策遭到毛泽东等人的批判和抵制。陈云当时在深入调查研究之后，就明确地指出：“要审慎地去考察资本家怠工与否，分别按各种情形执行不同的策略。领导工人坚决地反对在经济上故意停止营业，破坏苏维埃经济的资本家，监督这个店铺作坊的生产。对于生意清淡将要倒闭的资本家，工会应该领导工人要求资本家继续营业，同时应领导工人在他们自愿的条件下，减少一部分工资到企业不致倒闭为度。在某些企业的工作关系上不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如木船等），应该取得工人的同意，

用增加额外工资的办法来补偿额外工作的时间。党与工会只有这样去了解实际情形，给予各种工人以具体的领导，才能提高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取得工人的信仰，团聚群众于我们的周围。”<sup>①</sup>在这里陈云提出，工人监督生产的对象主要是指那些怠工，故意停业、破坏苏维埃经济的资本家，而对于确实有困难无法维持生产的资本家，工会应该领导工人帮助资本家克服困难继续营业。在监督生产时，应区别不同情况，以发展生产为目的，以不致倒闭为最低限度，反对机械地执行政策。

1933年5月，中国店员手工艺工人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苏区店员手工艺工人在经济斗争中的任务的决议》，进一步规定了工人应如何对私人企业进行生产监督的问题。决议指出：“监督生产的办法，过去把现金完全集中于工人管理，不让资本家有丝毫权柄来支配现金，这是错误的。正确的监督生产方法，应该时刻计算企业在生产上、贸易上、经济上的情形，监督生产数量上的提高，要求资本家在一定期内报告营业与经济状况，不让其故意将现款收藏停办货物，不让资本家故意浪费、破坏生产、登记现款与货物。”这段引文的基本思想是要把生产搞好，它比较具体地规定了工人民主监督私人企业的内容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企业主的产权和经营管理权。虽然仍存在统得过严等“左”的倾向，但比那种“不让资本家有丝毫权柄来支配现金”的“监督”方式，进了一大步。

从上述情况看，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对于私营企业的正确政策是允许并鼓励其存在和发展的。在原则上也主张尊重私营企业资本家的产权和经营自主权（实际上没能做到）。按照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正确路线对于私人企业的政策来归纳，当时苏区私人企业的管理体制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国家法律政策的指导和限制，其二是企业的经营管理，其三是

私营企业工人对生产的民主监督。这既有国家的限制，保证私人经济不超出新民主主义经济许可的界限；又有工人的民主监督，来防止企业主的舞弊和怠工，维护工人的权益；还照顾了企业主的利益，使其产权不受侵犯，并允许企业在一定限度内发展。从该体制本身看，它符合中国革命性质的要求和苏区经济发展的实际，反映了我们党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私人资本问题的正确认识。倘若能在指导思想上坚持毛泽东等提出的鼓励私人资本发展的方针，那么，这种正确的管理体制的贯彻，必将对苏区私人经济的发展和根据地经济的繁荣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长达四年的统治，使苏区私人企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打击。极大地影响了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和苏区经济事业的发展影响了红色政权的巩固和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这个沉痛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总之，这个阶段党在关于私营企业政策上的实践与探索，使我们党无论在指导思想、具体政策上，还是在实际运用中，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党的多数同志对中国私营企业，特别是对落后地区手工业性质的私人企业之特点，开始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可以说，如果没有土地革命时期党对私营企业管理上的探索，尤其是对“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挫折的认真总结。就不会有全国解放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顺利改造。尽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对苏区私营企业的政策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我们党毕竟是在改造旧经济、建设新体系的坎坷道路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它雄辩地证明，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把革命引向胜利。这是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都必须遵循的一条真理。

## 注：

(1) 《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参见1948年2月8日《人民日报》。

(2) 翟秋白：《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新策略》。参见《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七期。

(3)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13页。

(4)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第275页。

(5) 《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第1版，第173～180页。

(6) 《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第一版，第11页。

(7)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69页。

(8) 《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119页。

(9)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第一版，第239页。

(10) 同上书，第265页。

(11) 《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第10页。



## 2. 土地革命中毛泽东对富农政策的演变

**富**农问题，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土地革命斗争中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毛泽东关于富农政策问题的理论，是他领导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探索中国土地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般地讲，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他们大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资料和资金，经常以雇工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他们与地主的区别是自己参加劳动，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农民的一部分”。<sup>①</sup>而中国的富农，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又具有其特点。一是具有浓厚的封建和半封建的性质，他们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还兼放高利贷。这是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从个体小农经济中分化产生的少量富农经济，力量十分单薄，不可能冲破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经济的多重束缚，所以，造成他们的畸形状态。二是这种富农经济在整个中国农村经济中不占重要地位。在中国，富农大约占农村人口的5%，占有10%~15%的土地。而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富农占其农户总数的15%，占有全部耕地面积的一半。这说明中国的富农经济在整个农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富农剥削不是农村中的主要剥削方式。

但由于富农在农村的经济地位处于中农和地主之间，对富农的政策得当与否，直接影响着能否团结中农、孤立和打击地主、满足无地和少地贫

农对土地的要求，同时也由于对富农的政策还牵涉到对工商业者的政策，所以，富农问题，成为一个极其敏感和重要的问题，是关系到土地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之一。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中国农村社会各阶级的。1926年1月1日出版的《中国农民》，发表了他写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他用一定的篇幅论述了介于“大地主”和“自耕农”之间的“小地主”阶层。毛泽东认为这部分人占农村人口的11%，“其来源大部分为力田起家即自耕农升上来者，亦有一部分都市商人购置土地，又有一部分为官僚后裔之衰败者及现有之小官僚。其剥削方法为重租、高利贷和剥削剩余劳动三种。”其血统与大地主要亲，与农民协会要疏，“为中国的中产阶级”。这里所说的“小地主”，实际主要就是指富农，但也包括了小地主。毛泽东勾画了他们的基本轮廓和政治倾向，为指导当时正在兴起的现代农民运动提供了初步的阶级分析。

1927年3月，毛泽东在对湖南地区的农民运动进行深入考察之后，第一次提出“富农”的概念。他认为“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对于农民运动，富农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大革命失败前后，根本取消地主土地所有制被提上议事日程。于是确定没收土地的对象和范围也就成为一个急切的问题。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确定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对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而实行“减租”。毛泽东对此有异议。他认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

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小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sup>(2)</sup>而富农、中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了，所以要确定方向。<sup>(3)</sup>遵照毛泽东的意见，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阶级路线。这里，毛泽东第一次对富农和小地主做了区分。

总之，在这个阶段中国现代农民运动还只是初步开展起来，土地革命基本上尚未实行。但是站在第一线领导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农村革命的阶级路线问题。他不是一般地提出贫农是主力、中农必须争取，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而是具体地分析了农村各阶级，特别是一开始就注意到富农问题的复杂性和对富农政策的重要性。他认真分析了中国富农的构成、经济地位和剥削方式，及其政治倾向。他不是简单地把富农归结为反动势力，而是既指出富农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同时又看到富农区别于地主的一面。正是基于这种审慎的分析，毛泽东在讨论确定没收土地的对象和范围时，没有去争论究竟是没收占有二百亩以上土地的地主的土地，还是没收有五十亩以上的土地的地主的土地，而是从地主和富农在剥削方式等方面的差别上，提出“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方针。因此，他关于土地革命的方针较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通过的方针，更切合实际。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阶段，毛泽东对富农问题的认识还是初步的，不是十分深入和准确，显得比较直观。因而对一些概念的运用还比较含混。

## 二

毛泽东对富农问题的认识是在同“左”的和右的错误干扰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逐渐明确和深化的。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队伍深入井冈山地区，开始了土地革命的伟大实践。但是这场摧毁封建统治基础的土地斗争，一开始就受到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严重干扰。首先是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他们不加分析地认为：富农、商贾与地主、高利贷者同是“中国农村的剥削者”。因此，要没收一切土地，取消一切债务。要以“不顾忌的手段”去镇压“贵族式富农”的反动，防止他们同地主勾结。

中央的错误指示逐渐贯彻到各革命根据地，先后造成湘赣边界的“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抵制。1928年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提出今后农村斗争的策略是“团结贫农，抓住中农，深入土地革命，实行赤色恐怖，毫无顾惜地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用赤色恐怖手段威胁富农，使不敢帮助地主阶级。”这一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央“左”倾政策的影响，但又有所区别，其区别之处就在于它不认为富农和地主一样同是革命的主要敌人，而认为在土地斗争取富农中立的必要和可能。毛泽东当时痛感打击中间阶级过重，使分田运动“大受阻碍”，造成了我们的孤立，“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

1929年7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闽西“一大”，并亲自为大会修改了《政治决议案》。这次大会贯彻了党“六大”的土地革命路线，在总结井冈山和闽西土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共“六大”制定的对富农政策做了具体的落实和发展。第一，富农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与豪绅地主不同，是可以中立的。第二，在革命初期时，应集中力量反对地主豪绅，对富农则“不没收其土地，并不派款，不烧契，不废除其债务”。当革命已经发展，广大群众已经起来，革命势力有了保障时，党应帮助贫农分配富农的土地，但只没收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可过分打击，以保持其中立。第三，“富

农凡亲自参加劳动者，可以参加政权”，但必须防止他们占据政权中的领导职位。<sup>(4)</sup>第四，允许富农放债、雇工和出售余粮，即给富农经济留有活动余地。同时，又对其放债利息、雇工报酬和粮食价格作了具体的限定。<sup>(5)</sup>

中共闽西“一大”制定的对富农政策表明，毛泽东从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实际状况出发，从开展土地斗争的策略需要着眼，已经摆脱了中央“左”倾盲动政策的干扰和影响，制定出比较切合实际的对富农政策，对富农问题的认识也较以前加深。他不仅从斗争的策略上考虑，提出要争取富农中立，而且认识到富农一般还自己参加劳动，富农经济还有资本主义化的一面。因而，对富农的政策和对地主的政策应有原则的不同。

正当毛泽东领导赣南闽西军民按照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轰轰烈烈地开展土地斗争的时候，来自共产国际和中央的错误指示，又使党对富农的政策受到严重干扰。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来《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指责中共在对富农问题上犯了严重的策略错误。来信认为，中国的富农绝大多数“都是小地主”。因此，不要害怕富农退出革命，在反对地主的同时，应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指出：“同一富农既然在他的半封建性上决定了他必然走向反革命，决没有又因为他的资产阶级性而参加革命。”因此，“党的策略决不应企图联合富农在反对封建势力的战线之内，而应坚决地反对富农。”此后，在李立三指导下的党中央，指示各根据地普遍开展反富农斗争，在党内还开展了反对“富农路线”的斗争。

毛泽东当时也对苏区土地斗争中确实存在的牵就富农的现象进行了斗争，但与共产国际和“立三中央”的形而上学指令不同，他是在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后，有分寸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富农的斗争的。1930年5月，毛

泽东在寻乌进行了深入的社会调查，写出了著名的《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和《寻乌调查》两篇光辉著作。《反对本本主义》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寻乌调查》是毛泽东调查寻乌城乡情况的记录。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提出了限制富农的政策。毛泽东认为，寻乌的“半地主性的富农”占农村人口的4%。他们大多出租土地、兼营商业和放高利贷，雇佣劳动的条件也是半封建性的。因此，在反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斗争中，广大贫苦农民同时要求废除富农的半封建剥削。为了争取广大贫农，必须采取限制富农的政策，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

1930年6月，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三次入闽。6月11日至13日，毛泽东在长汀南阳（今属上杭）召开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土地革命史上第一个专门解决富农问题的文件——《富农问题》。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针对当时出现的右倾的错误，提出了限制富农的一些正确政策。即：（一）坚持以人口为标准分配土地，指出“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土地是于富农有利的”；（二）在分配土地的原则上，除肯定“抽多补少”外，还肯定了闽西特委关于“抽肥补瘦”的原则，使富农“不得把持肥田”；（三）在政权建设上规定，不得使富农当选为苏维埃代表及其他一切政权机关职务等。这些政策是必要和可行的。但是，在会议期间到达南阳的中央特派员涂振农，传达了共产国际和中央关于加紧反对富农的指示。致使《富农问题》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左”倾错误指示的影响，实行了一些错误的政策，其结果，把富农财产中不属于封建和半封建剥削的部分也没收了，限制了他们向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实际上要消灭富农经济。而且，对富裕中农采取和对富农、

地主一样的政策，严重侵害了中农的利益，在政治上把富农和一部分中农推向敌对阵营，削弱了革命力量，使土地斗争因阻力过重而无法实行。

“立三路线”对中央的统治被结束后，1930年10月至11月，毛泽东再次来到赣南。他在过去寻乌调查的基础上，又先后进行了兴国、木口村、东塘等处调查，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丰富了自己的见解。

1931年2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发出第九号通告《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通告从根本上指出：目前中国革命是工农民权革命阶段，“尚不是消灭富农阶段”。通告还纠正了把富裕中农划为“初期性富农”进行打击的错误，重申土地斗争绝对不能侵犯中农。通告针对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民对土地的强烈私有观念，特别指出：“必须使广大农民在革命中取得他们唯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才能加强他们对于土地革命和争取全国胜利的热烈情绪，才能使土地革命深入。”同月，毛泽东又致信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指出：“过去分好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租借买卖，由他自由”。

这样，毛泽东从新的高度上再次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对土地革命路线、特别是对富农政策问题上的干扰和错误，重申保留富农经济和限制富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还较好地解决了长期未能解决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的解决，不仅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参加土地革命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而且，由于明确了土地私有、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和租借，就为富农经济保留了活动余地，也使一部分劳动力强的农民希望上升为新富农的愿望成为可能，这反映了“民权革命阶段”的特点。所以，土地所有权问题的解决，标志着中共“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

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条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对中央的统治后，第三次“左”倾错误对土地革命路线的干扰，又是主要地集中在对富农政策问题上。他们指责“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和“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原则，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主张立即消灭富农经济，实行所谓“消灭地主，反对富农，依靠贫农，联合中农的明确的阶级路线”。1932年2月，“左”倾冒险主义者要求迅速检查土地分配情况，立即没收富农分得的好田，由此开始了一场旨在贯彻其“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的查田运动。

查田运动在中央苏区全面铺开，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查出了一批借宗族和地域关系隐匿漏划的地主和富农。但是由于“左”倾中央的错误指令，查田运动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左”倾偏差，把一部分中农划为富农，并对富农采取了过火政策。这致使一部分农民恐慌。当时在瑞金县竟有中农跑到苏维埃来请求改变自己的成分，他们请求改为贫农，他们说：“中农危险得很，挨上就是富农，改为贫农咧！隔富农就远了一点。”<sup>(6)</sup>

和“左”倾中央制定的关于查田运动的阶级路线不同，毛泽东认为查田运动应“是以工人为领导，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去削弱富农，消灭地主”。他强调：“查田运动中，应审慎决定那些介在中农与富农之间的疑似成分，不使弄错。”“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的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同时还应看到，“富农与地主有区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不劳动，所以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同时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地主待遇”。<sup>(7)</sup>

为了防止混淆农村阶级阵线，毛泽东根据多年领导农民运动和土地斗争的经验，在进一步对中央苏区的阶级状况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于1933

年6月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对农村各阶级的划分作了质的规定。其中关于富农，毛泽东写道：“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分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种情况也应以富农对待。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占很大比例并且是主要的。”随后，毛泽东又主持制定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从量的方面规定了划分农村阶级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对富农与地主、富农与富裕中农的区别作了具体的规定。关于地主和富农，《决定》明确，是否自己参加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1人每年有1/3时间从事主要的劳动（指犁田、蒔田、割禾及其生产上之重要劳动事项——引者注）叫做劳动。”劳动时间不满1/3或从事的是辅助性劳动，叫做“附带劳动”，仍属地主范畴。关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分界标准，《决定》指出：有两个标准，一是剥削数量标准，一个是剥削时间标准，即：“富裕中农一年剥削收入的分量，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15%，富农则超过15%”；富农的剥削时间，是“从暴动时起，向上推算，在连续三年之内，除自己参加生产之外，还依靠剥削为其全家生活来源之一或大部，剥削分量超过其家一年总收入的15%者，叫做富农”。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当时并没有完全摆脱“左”倾盲动主义者“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错误主张的影响。

但是毛泽东在两个文件中结合中国农村和苏区的实际，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详细准确地划定了中国农村的各阶级，大大发展和完善了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等著作中提出的思想。特别是毛泽东从中国富农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和数量，以及中国富农剥削和经营的方式、地租剥削在其总收入中的比重等几个方面，详尽勾画出中国富农的特点和他与地主、富裕中农的区别，为其以后制定更为完善的对富农政策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这两个文件的制定和公布，不仅对纠正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查田运动中造成的阶级阵线混乱起了良好的作用，而且对指导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分析和划定农村各阶级的纲领性文件。这两个文件的制定和发表，还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富农问题的认识及其对富农政策的理论的成熟。

### 三

毛泽东对中国富农问题的认识是随着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广泛开展和深入逐步加深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提供了阶级分析的基本方法，但并没有具体指出中国农村的哪部分人属于贫农、中农，哪一部分又应该属于地主和富农。毛泽东在开始时也只是直观地看到地主和中农之间还有不同于前二者的阶层或阶级，他把其命之为“小地主”或“富农”。但对这一阶层的特点还把握不准。在领导当时农运的实践中，毛泽东从这部分人的政治态度着手进而探讨其经济情况，转而再同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相联系，逐步搞清了中国富农的一般状况和特点。从而明确了他们的政治态度及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制定正确的对富农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对中国富农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的基础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在不同阶段所面临的不同任务，适时适事地制定出不同的对富农政策，以配合完成各个阶段的主要任务。

1935年12月1日，刚刚指挥取得长征和直罗镇战役胜利的毛泽东，就致电张闻天，提出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富农问题上错误政策的具体意见。12月15日，他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并以此作为适应建立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而改变土地政策的开端。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确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代之以减租减息政策的过程中，对富农政策问题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在强调对富农的封建剥削部分的租息“也须照减”的同时，毛泽东提出：富农作为农村的资产阶级还具有“民主的要求”，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份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斗争也可能保持中立”。而且富农在生产中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因而，要对富农采取更宽松积极的政策。毛泽东对富农政策的这种调整，不仅是考虑到当时民族矛盾压倒一切矛盾的现实，也有拆散富农、资产阶级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联合的可能，以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考虑。

抗战胜利后，在关系中国的前途是光明还是黑暗的生死较量中，毛泽东一方面反对激化阶级矛盾，对地主和富农乱打、乱杀的过“左”做法；另一方面，坚决地支持广大贫苦农民渴望获得自己土地的要求，进一步明确土地革命的对象是“地主阶级和归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因此不仅要没收地主的土地，而且要没收富农的多余土地，分配给农民。这项决策在解放区的实施和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在广大新区的

陆续开展，赢得了广大翻身农民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全力支持。

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在领导涉及三亿一千万人口的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又提出了暂时不动富农经济的策略。他在访问苏联期间给刘少奇的电报和回国后给邓子恢等大区领导人探讨这一问题的电报中详细论证了这样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指出：第一，这次土改的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左”的偏差。如果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进行分配，而保留富农经济不动，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以前老解放区土改是在战争环境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战争结束，土改就显得特别重大。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富农，则将“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我们已经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组织上都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保留富农经济也是比较妥当的。第四，现时形势与过去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进行着生死斗争、胜负未分时的情况不同了，“国家可以用贷款方式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在领导解放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对富农采取了更为宽大的政策，从而大大孤立了地主阶级，保护了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使得这场涉及几亿人口的社会大变革得以顺利进行，在中国彻底废除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关于中国富农问题的理论，只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宝库中关于土地革命的路线里，诸多政策的一项。它是具体的细微的，又是重要的、复杂的。毛泽东不拘泥于现成的理论和说教，而是从中国富农的实际状况出发，深入调查、反复摸索，顶住了“左”的或右的干扰和压力，把对富农的政策问题，同中国农村的阶级阵线、同整个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动力、同中国

革命的性质、同中国革命不同阶段的主要任务、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相联系，制定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理论。虽然它只是毛泽东思想理论长河中的一片浪花，但它透映着思想家的深邃和光辉，不仅推进了土地革命实践的开展，而且使后人从中得到启迪和振奋。

## 注：

- (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643 页。
- (2) 1927 年 8 月 18 日在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 (3)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
- (4) 中共闽西“一大”《政治决议案》。
- (5) 中共闽西“一大”《土地问题决议案》。
- (6) 《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参见《斗争》第 32 期。
- (7) 《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1933 年 6 月。



### 3. 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遵义会议直接的积极成果而言，主要是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军事教条主义路线，在实际上开始确立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地位。但这仅是转折的起点。遵义会议后，红军仍处在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之中，中国革命仍处在最低谷，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仍然是生死未卜。转折，应该有一个周期，有一个由低潮到高潮或高潮到低潮的发展周期。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伟大转折的周期，事实上是到1937年七七事变全民抗战的爆发才告一段落的。这里对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这个周期中的努力及其所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做一简单的概述。

—

中国共产党人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斗争实践中逐步深刻地认识到，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共产国际也在1930年就把建立根据地作为“中国共产党头等重要的任务”。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的丧失，迫使红军“把主力从过去的苏区撤出，目的是要在中国西部的广阔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sup>(1)</sup>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的惨重牺牲，更加重了人们对根据地的依赖。在一定意义上说，能否找到新的

根据地做立脚点是红军长征成败的标志。这是当时全党全军的共识。但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方针则是大不相同的。

把持中央领导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将摆脱危机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既定的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上，他们幻想先放下包袱，再回过头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毛泽东则更清醒地注意到红军当时面临的危险处境，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摆脱强敌的围追堵截，掌握战场的主动权。毛泽东坚决反对“左”倾领导者不顾蒋介石已经在通往湘西的途中布置了十几万大军的口袋阵，还要硬往里钻的做法。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的意见虽然得到多数同志的支持，并在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上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得到确认，但还是受到“左”倾领导者的激烈反对。

纠正“左”倾的错误军事路线是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而遵义会议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彻底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肯定并恢复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这是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也是革命根据地能否得以重建的前提。遵义会议在解决最急迫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的同时，又鉴于贵州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等情况，决定改向比较富庶、并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可做策应的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1935年1月28日，毛泽东指挥北进的中央红军与四川军阀刘湘的军队在土城遭遇，打了一扬拉锯战。毛泽东果断地命令部队撤出战斗，一渡赤水，放弃了北渡长江入川的计划，避开敌人锋芒，转到云南扎西地区集结。在扎西，毛泽东在中革军委讨论战略方针和红军行动问题的会上，分析了当时的敌情，指出要用敌变我变的原则指导红军的行动。他说：“目前，敌人的主力和注意力都调到川南一线来了，黔北比较空虚，我们应该

利用敌人的过失，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sup>(2)</sup>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进一步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sup>(3)</sup>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文告虽然也阐述了中央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苏区根据地的意图，但它更突出地强调的则是“打大胜仗消灭大量的敌人，缴他们的枪与子弹武装我们自己，并武装云贵川数千万劳苦群众，是我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此后，中央拟建根据地的区域又几经变化，但毛泽东不为其所限制。他根据敌情率领中央红军又两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在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中往来穿插，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并最终摆脱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把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现实任务和重建根据地的既定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他不为寻找新根据地所束缚，而是依据战场实际，时而向北摆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态势，时而又回头显露出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趋向，巧妙地与强敌周旋，在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生路，取得了重建革命根据地斗争第一个阶段的胜利。而这一胜利的取得，正是遵义会议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直接成果。

如果说毛泽东在重建根据地斗争的第一个阶段主要致力于领导红军摆脱强敌的围追堵截，那么，第二个阶段则着重于确定应在什么地区重建根据地。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针对华北事变以来民族危机的加重和中国革命的不平衡发展，把革命低潮时的退却（被迫寻找立足的新根据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进攻联系起来，提出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正确方针；而把持红四方面军领导权的张国焘出于争夺军权和党权的个人野心，以及对革命形势的悲观判断，主张南下人烟稀少的四川西康边境地区。张国焘坚决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北上的方针，甚至企图以武力威胁中央改变方针，于是引发了党和红军内部的一场空前严重的危机。

毛泽东率红一、三军团（后改称陕甘支队）摆脱危机先期北上后，又对其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做了局部的调整。1935年9月27日，在榜罗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根据新近了解到的陕北还保存有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这一新情况，确定前往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抵达陕北后，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先后胜利地部署和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征战役、山城堡战役。此外，他们还直接领导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和策应因发动西安事变而遭国民党中央军队进攻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和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以及西路军的英勇远征，不仅粉碎了各路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围剿”，而且沉重打击了根据地周边地区的敌军，大大拓展了苏区。使原来的陕北苏区发展成为以延安为首府，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26个县和200万人口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全国的各路红军是在反“围剿”失败后，被迫放弃各自的根据地踏上长征征途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后，在以毛泽

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指挥下，枪是昨天的枪，人是昨天的人，却逐步地反败为胜，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找到并巩固和发展了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标志着长征获得最终的胜利和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企图的彻底破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新的栖息地，中国革命有了长期稳固的大本营，也标志着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国民党盘根错节统治的南方转到了敌人统治相对薄弱的北方。

## 二

遵义会议还有一大成就，就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调整了中央的组织问题。自中共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中央主要领导的更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共产国际操纵的。比如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和让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做总书记，特别是扶植王明上台和让博古主持临时中央的工作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惨重损失，使中央领导层普遍认识到必须改变中央的领导成员和决策机制。再加上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的中断，在客观上促成遵义会议和会后对中央领导人选和决策机制的自主调整。先是在遵义会议之前的猴场会议上就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就恢复了政治局的应有权力，使“三人团”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受到了限制。遵义会议上增加毛泽东为中央常委，重新明确朱德和周恩来的军事指挥权，并强调周恩来是代表党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会后常委分工时进一步明确，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sup>④</sup>这样就剥夺了原“三人团”中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遵义会议上还决定让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突出了他在中央核心层的作用。

会后不久，据周恩来回忆：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向云南扎西行军途中，洛甫（即张闻天）首先提出中央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毛泽东找周恩来商量，把洛甫要求变换中央领导的意见告诉了他。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泽东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sup>⑤</sup>1935年2月5日前后，中共中央到达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落时（一说是叙永的石厢子，另一种说法是在威信的水田寨），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那里开会分工，决定由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

还需要指出的是，遵义会议后，在批判“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和调整党中央、中革军委组织问题的过程中，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像过去宗派主义者那样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而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端正思想，通过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程序改变其领导，以保证正确军事路线的贯彻执行。比如对博古，仍然保留了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长征到陕北后，又让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要职；再如对在遵义会议上公开支持博古，并同毛泽东激烈争论的凯丰，后来仍让他担任少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和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特别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从当时党内情况出发，回避开政治路线的是非争论，并十分策略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集中解决当时最急迫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权问题。而在遵义会议后变更党内“负总责”这一最高领导职位时，毛泽东又谦虚地推举张闻天替代博古。这样，就最大的程度地争取了中央领导层同志们的支持，很好地维护和促进了党中央的团结。党中央的团结和统一，不仅保证了对中央红军战胜敌军围追堵截的坚强有力领导，而且在后来克服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当张国焘扬言要“审查中央路线”，并借口统一指挥来“解决组织问题”时，就愈见毛泽东在遵义会

议上只解决军事问题而一般地肯定党的政治路线之高明。

在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径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把在遵义会议已经成功运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原则，再次成功地运用于同张国焘的斗争，并有所创新，树立了一个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典范。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虽然真理在握，但并不以个人命令去强制别人执行。他很注意发挥党中央集体的领导作用，重大决定都由政治局会议做出。发挥了党中央集体的坚强有力领导。二是在原则性问题上不退让。张国焘的行为不只是一般的党内争论，后来发展到分裂党的严重程度。因此，毛泽东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如北上方针这一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的大问题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三是表现出灵活性。为了维护全党和全军的团结，毛泽东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批评帮助，并作了适当的妥协让步，比如让出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等。特别是在张国焘公然抗拒中央，企图以武力威胁中央改变方针，党中央不得不率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的严重情况下，毛泽东一方面在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上揭露批判张国焘的军阀主义行径，同时他又努力说服要求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同志。他说，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因为他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许多干部的安全。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统率着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难以见面了。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们北上。甚至在张国焘擅立第二中央，公开分裂党的严峻时刻，毛泽东在与之进行严肃斗争的同时，仍冷静地说服其他同志不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以便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张国焘的倒行逆施受到包括红四方面军广

大指战员在内的全党上下一致强烈的反对，加上其南下川康边的行动严重受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张浩、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以及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并放弃其南下计划。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一同北上，于是有了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的大会师。这样，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所造成严重的党内危机终于被克服。

必须强调的是，在遵义会议后的这场伟大转折中，毛泽东虽然始终没有担任“党内负总责”或中革军委主席等最高领导职务，但他在党内和军队的核心领导地位、他那无可替代的杰出领袖才能和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在纷繁复杂的生死大搏斗中逐步地得到全党和全军的衷心拥护。陈云在1935年10月15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报告遵义会议情况时就明确：“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sup>⑥</sup>与此同时，在长征途中和毛泽东一起劈波斩浪的一批领袖人物，也在这危难时刻的风头浪尖上经受了锤炼，得到全党全军的拥护和认可，从而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这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全部是经过长征磨练的。1956年党的八大后形成的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邓小平等组成的中央领导集体，也全部是从长征队伍里走出来的，并且全部是遵义会议的亲历者。艰难困苦，玉汝以成。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选择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这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由小到大、中国革命所以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组织保证，也是遵义会议后取得的最重要成果。

遵义会议虽然是着重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但在事实上毛泽东和

他的战友们在那前后已经开始着手端正和树立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在江西遭到撤职和错误批判的邓小平就是在1934年底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并参加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及其以后通过调整中央分工，确立了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体制，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过程中，一批过去“左”倾教条主义者撤职处分，甚至是在保卫局监督下参加长征的干部被解放出来，走上新的战斗岗位；在同“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由于坚持正确的党内斗争原则，又团结和教育了一大批各个方面军的干部。毛泽东率陕甘支队到陕北后开始全面地纠正“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干部路线，他果断地停止了仍在继续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北方局和中央代表对陕北红军和陕北根据地搞的错误肃反，释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骨干，并恢复了他们的职务。同时，给予在陕北搞肃反者以处分，撤销陕甘省委，改派李富春为新成立的陕甘宁省委书记。当听说还有三百多名在鄂豫皖苏区肃反中被定为“反革命嫌疑”的人尚未做结论时，毛泽东说：“他们长征都走过来了，这是最好的证明，应该统统释放；党员、团员要一律恢复组织生活，干部要分配工作。”<sup>(7)</sup>

由于树立和贯彻了正确的党的组织路线，恢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正确地开展了党内斗争，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的干部路线，在全国各路红军大迁徙的特定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团结了全党和全军。随着全国各主力红军会师西北高原，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十年后，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迎接全面抗战的爆发和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积蓄了强大的力量。

## 三

当全国各路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在步步深入，中华民族遭遇了空前的危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不得不同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发动的全面“围剿”进行殊死的阶级搏斗，另一方面必须进行抵抗日寇侵略的全民动员和准备，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责任。这是一对复杂而又尖锐的并必须解决的矛盾。

在遵义会议以前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中国共产党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缺乏独立自主性，往往依赖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指导，有些给中国以很大的帮助，有些则因偏离中国实际而造成严重的危害。对日关系问题也是如此。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内对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孰重孰轻的认识是不清楚的。一度占据中央领导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还照搬苏联提出的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的对立是“国际关系的核心”的论断，认为日本侵略我东三省是进攻苏联的序幕，提出要武装保卫苏联，要首先推翻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能直接地毫无阻碍地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关门主义，使党和红军坐失九一八后国内抗日民主运动高涨的良机，使自己陷入孤立，并遭受严重损失。共产国际“七大”，以及在其精神指导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开始转变方针，对中国共产党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八一宣言》缺乏对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因而使得一些很好的

主张只能流于一般性的号召。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命运的开端。在抗日战争前夜中国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复杂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能够确立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也正是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独立自主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果。同王明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联蒋抗日”的主张相比，毛泽东不仅有更科学的分析和更可行的办法，而且有切切实实的实践。

自遵义会议起逐渐确定了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毛泽东，也日夜思索着抗日救亡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他对这个问题思索不是一般地去发号召，而是综合考察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归纳分析各阶级在外敌入侵时的态度和利害关系，因而他提出的主张显得更切实可行。1935年12月17日，长征刚结束不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作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他提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针对蒋介石集团为置红军于死地而发动的大规模“剿”共战争，他又提出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sup>⑧</sup>这就明确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的关系，把民族战争摆在了第一位。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首先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和蕴藏在中国各阶层人民中的巨大潜力与积极性，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接着，报告分析了国民党阵营的分化，即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时刻的动摇和转变，阐明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切实地提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任务。

更为难能的是，毛泽东一开始就注意到在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一个必须正视的核心问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问题。毛泽东始终不认为地主买办营垒是铁板一块。他首先从理论分析中得出：在半殖民地条件下，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触犯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利益时，中国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亲英美派“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接着，毛泽东在阐述“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时进一步指出：“这个政府的范围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因此，这个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毛泽东的这个结论，是建立在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而王明关于“联蒋抗日”的空泛口号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历史不能假设，王明虽然提出“联蒋抗日”在先，但他没有参加国内创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如果我们以王明1937年11月回国后关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做法进行反推理，那么，按照他的主张去“联蒋抗日”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

毛泽东是在实践中逐步认识这个问题的，有一个变化过程。由于蒋介石坚持反共、“剿”共的立场，在瓦窑堡会议前后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是抗日反蒋并提。1936年2月，毛泽东开始改变这一看法。2月27日，受宋庆龄、宋子文委托前往陕北的董健吾，和受上海地下党委派来汇报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等谈判情况的张子华，抵达瓦窑堡，带来了蒋介石亦有和红军妥协共同反日倾向的信息。这印证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他

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2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sup>⑨</sup>3月4日，毛泽东更明确地转告董健吾：“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和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等五项具体意见。<sup>⑩</sup>4月9日，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又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张闻天，重申“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讨日令”。5月5日，毛泽东在著名的回师通电中正式放弃“反蒋”口号，提出“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队撤回黄河西岸”。此后，毛泽东“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sup>⑪</sup>，“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sup>⑫</sup>。8月25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明确建议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实现与南京蒋介石政权的合作，在利用一切渠道表达中共合作抗日诚意的同时，毛泽东一方面指挥红军坚决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打破了蒋介石消灭红军和用军事力量压迫中共同意其收编红军的幻想；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中广泛地开展了统一战线思想的教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肃清了“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号召全党各级干部都去做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总之，对蒋介石南京政府，毛泽东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双方力量的消长，日本侵略的加深和蒋介石态度的转变等），适时地提出“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等阶段性的口号，以促成全国全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泽东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有一系列的步骤和方法。前文讲到，在同张国焘争论应在何处建立根据地时，毛泽东就把革命低潮

时的退却（被迫寻找立足的新根据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进攻联系起来，提出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正确方针。到达陕北后，在粉碎敌人“围剿”和扩大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特别注意对战略主攻方向的选择。他为红军制定了“西边创造新根据地，东边坚持游击战争，南边作东北军的工作”的战略方针。<sup>⑬</sup>毛泽东还对根据地周边的各路国民党军做了政策上的区分。即把东北军、西北军同其他地方军阀武装加以区别，把晋绥军、高桂滋、高双成、邓宝珊、马鸿宾等地方实力派同国民党中央军加以区别，对他们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逐步建立起不同程度的统战关系，争取和影响了一些国民党武装对红军抗日救亡主张的同情和支持。循着这样一条路线，毛泽东还以很大的精力亲自开展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多次致信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宋庆龄、蔡元培等爱国领袖和国民党左派，表达对他们爱国行动的敬佩和赞赏；他广泛联系地方实力派，如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西康的刘文辉，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华北的宋哲元，云南的龙云，以及失势的各政治势力代表冯玉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给蒋介石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外部压力。他还直接致信电给国民党政府的军政要员和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邵力子、宋子文、孙科、于右任、陈立夫、覃振和胡宗南、王均、汤恩伯、陈诚、贺耀祖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并通过他们影响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

总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仔细深入地分析和研究抗日战争前夜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提出并实践了党在历史性转变时期的政治路线。他和他的战友们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团结起

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各阶层群众，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使中国革命由低潮走向高潮，并在更深远、更广泛的意义上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遵义会议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是党成熟的标志。它虽然没有提出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却为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做了组织准备；它虽然也没有提出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但它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纠正和随后所实行的那条正确的军事路线，却充分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精髓。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及其战友们领导的这场伟大转折表明，遵义会议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走向胜利的道路。

## 注：

(1) 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参见《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

(2) 《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7页。

(3) 《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8页。

(4) 陈云，《遵义会议扩大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参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5) 周恩来1972年6月10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毛泽东年谱》，第446页。

(6) 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参见《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

(7) 《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9页。

(8) 1935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的发言，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年谱》，第497页。

(9) 1936年9月8日致朱德等电，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年谱》，第576页。

(10) 1936年3月4日致秦邦宪转董健吾电，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年谱》，第519页。

(11) 1936年8月12日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年谱》，第568页。

(12) 1936年8月25日致潘汉年电，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年谱》，第573页。

(13) 1936年5月29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年谱》，第546页。

## 4. 长征：团结胜利的战歌

长征，是在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处于生死攸关的时刻，是在中华民族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而出现空前危机之际，是在中国革命处于最低谷的情况下，中国南方的各路红军被迫进行的一次战略大转移。1936年10月，各路红军会师西北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兴起，标志着长征的胜利。那么，在两年的光阴里，是什么使红军将士能够以劣势的兵力和装备却冲破十几倍于己的大军堵截最终到达胜利的彼岸？是什么使各路红军能够在鸟尽人踪灭的恶劣自然环境中，克服饥饿、寒冷、伤病等超越人类生存极限的困难，闯出一条生路？又是什么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由颓势走向兴盛，并点燃起中华民族复兴和解放的熊熊火焰呢？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的英明统率，是全体红军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不怕牺牲、敢于胜利、充满乐观、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是由崇高的革命理想、深厚的阶级情谊和强烈的爱国精神所凝结起来的亲密团结。长征期间充弛于军民之间、官兵之间、全党上下和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亲密团结，乃至后来为抵御外侮在全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之间形成的同仇敌忾，是各路红军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力量源泉。

## 一、全党的团结是红军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长征开始时，中国共产党人处于最困难的境地。面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军事、政治和文化“围剿”，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下，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丧失了100%，在苏区的损失了90%。使全党上下困惑不解，为什么人是昨天的人，枪是昨天的枪，昨天在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的指挥下打胜仗，今天却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引导下打败仗。于是，有了遵义会议的酝酿和召开。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的情况下召开的。这一偶然的情况在客观上保证了党的领导人得以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会议首先解决当时最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重新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的主导权。同时，开始调整党的组织路线。会议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又以张闻天替代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成立新的“三人小组”指挥军事，在实际上开始逐步确立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为了维护党中央的统一和团结，会议极为策略地回避了对党的政治路线的是非争论，并一般地笼统肯定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会议树立了正确的党内斗争原则，对于在会上坚持其错误主张的博古、凯丰和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不是像“左”倾宗派主义者统治时期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那样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进行耐心的批评帮助，并让他们继续参与中央的领导。党中央的团结和统一，不仅保证了对中央红军战胜敌军围追堵截的坚强有力领导，而且在后来克服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当张国焘扬言要“审查中央路线”，

并借口统一指挥来“解决组织问题”时，博古、凯丰和李德等都坚决地站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一边，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和统一，使张国焘没有可乘之机。

在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径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一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虽然真理在握，但他并不以个人命令去强制别人执行，而是重大决定都由政治局会议做出，注重发挥党中央集体的坚强有力领导；二是注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毛泽东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同张国焘进行坚决的斗争的同时，为了维护全党和全军的团结，也对张国焘作了适当的妥协让步，比如让出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等。特别是在张国焘公然抗拒中央，企图以武力威胁中央改变方针，党中央不得不率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的严重情况下，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批判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行径的俄界会议上，还耐心地劝说要求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同志。他说，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因为他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许多干部的安全。甚至在张国焘擅立第二中央，公开分裂党的严峻时刻，毛泽东仍冷静地说服其他同志不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以便团结和争取整个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倒行逆施受到包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内的全党上下一致强烈的反对，加上其南下川康边的行动严重受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张浩、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以及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并放弃其南下计划。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一同北上，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将台堡地区大会师。这样，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所造成的党内危机终于被克服。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长征这危难时刻的风头浪尖上经受了锤炼，得到全党全军的衷心拥护和信服，从而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这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全部是经过长征磨练的。1956年党的八大后形成的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邓小平等组成的中央领导集体，也全部是从长征队伍里走出来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长征途中，由于形成了毛泽东为首的领导核心，树立和贯彻了正确的党的组织路线，恢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正确地开展了党内斗争，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的干部路线，从而在全国各路红军大迁徙的特定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团结了全党和全军。随着全国各主力红军会师西北高原，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十年后，呈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这为迎接全面抗战的爆发和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

## 二、长征的胜利是全国各路红军共同浴血奋战的结果

长征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无奈之举，但它又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战略行动。为了打破国民党军的军事“围剿”，1934年7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率红七军团由瑞金出发，与在闽浙赣地区开展斗争的方志敏部会合，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先行远征；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由湘赣根据地的遂川出发西征；1934年11月，徐宝珊、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的罗山县向西北转战。这三支红军的突围远征是全国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主要是为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和策应主力红军的长征，起战略牵制敌军的作用。方志敏所部未能冲

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先是寻淮洲在作战中牺牲，不久方志敏、刘畴西也在怀玉山中被捕后英勇就义；红六军团则成功地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并建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红二十五军也是一路冲破重围，胜利地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组成红十五军团，巩固和发展了陕北和陕甘根据地，为各路红军的大转移保留了惟一的落脚点。

三大主力红军之间的战略配合和战役合作，更是对红军夺取长征的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长征前各路红军分别在各自的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战争有所不同，长征开始后除在南方八省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红军突围的后方部队之外，各路红军都投入到战略大转移之中。这在客观上为各主力红军间的战略配合造成了非常有利的态势。在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中，毛泽东正是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把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现实任务和重建新根据地的既定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他时而指挥中央红军向北摆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态势，时而又回头显露出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趋向，巧妙地与强敌周旋，反复地调动敌人，将包袱甩给敌人，从而争得了战场主动，在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生路。与此同时，坚持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斗争的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也积极地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他们主动出击，消灭和牵制了大量的敌军。

在战略转移中的各路红军共有过七次会师，如红七军团和红十军（方志敏所部）的会师、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的会师、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陕甘支队（红一方面军一部）与红十五军团的会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以及最后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的大会师等。每一次会师，对于来自不同根据地的红军将士来说，都是精神上的相互声援，也是战术上的学习和交流，

更是阶级兄弟的情谊交融；每一次会师，都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创造了有利的战机，取得了一次次的辉煌战绩，鼓舞了红军的斗志，从而将必胜的信念化作挡不住的铁流。无须讳言，长期在国民党军分隔包围下独立作战的各路红军，也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和不尽相同的战斗作风与战术素养。乍一会合，也难免有分歧，甚至在少数人的头脑中不排除还有山头主义的思想作祟，以至于在长征路上出现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造成的严重情况。但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和目标，普遍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组织原则，特别是在张国焘操纵下致使红四方面军的南下作战遭受惨重的牺牲，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全军。红军上下普遍认识到团结的弥足珍贵，维护团结成为红军全体将士的共识。从此之后，各路红军更加自觉地接受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统一指挥，更加注重协同作战。先行北上到达陕北的陕甘支队，为策应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北上，他们会同红十五军团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并发动了东征和西征，建立了巩固的陕甘宁根据地；率领红二、六军团（不久即改编为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贺龙、任弼时等，连同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战胜了张国焘的阻挠，和红四方面军一道按照中革军委的指挥北上抗日，并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这样，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陆续诞生的各支红军，终于齐聚西北，第一次纳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直接统一指挥之下，形成一支坚不可摧的钢铁力量。

### 三、军民团结同甘苦，官兵一致克凶顽

被迫踏上长征路的红军指战员们，离开生活和战斗了七八年的根据地，与朝夕相处的亲人分离，也痛感缺少人民的支撑和没有根据地依托的失落

与困难。基于人民军队的本质，同时也出于失去根据地人民支持的痛楚，全党和全军上下在长征路上，都十分重视对沿途群众的宣传和动员。尽管军情危急，戎马倥偬（平均每天行军 74 华里，几乎每天都有一次战斗），但是各路红军在行军途中，每到一处，总是打垮反动势力，救助穷苦百姓，播撒革命火种，建立红色政权。特别是红军将士一路上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发自内心地对穷苦百姓的爱护与帮助，深深地打动了沿途的广大群众。沿途的黎民百姓箪食壶浆迎接红军，参军作战，送粮草，捐衣被，救伤员，当向导，不惜毁家舍命，赴汤蹈火。据统计，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共补充新兵 17000 多人。长征中，红军还在近 20 个民族居住的地区播撒了民族平等的火种，谱写了“彝海结盟”这样万古流传的篇章。长征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做少数民族工作的开端。毛泽东说：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确，长征中，红军以自己的行动向 16 个省的 2 亿多人口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和过去在各个根据地的狭小区域里孤军奋战不同，长征则是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动摇了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长征使共产主义的“福音”，由苏区一隅传向了全中国。

官兵一致是红军基本的建军原则之一，在长征这场最危险、最艰难的生死考验中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印证。在长征中，红军的领袖和各级指挥员承担了比普通战士更重的责任。条条湍急的河流，座座危耸的山峰，茫茫无边的草地，领袖和各级指挥员与普通的战士一样，凭借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地走完；敌人的枪弹和天上的飞机轰炸，并不因为你的职务高低而对任何人格外开恩。每一个战役展开，每一次战斗打响，从总司令到各级指挥员，都身先士卒（土城战役时，朱德就曾亲自端起机枪冲锋）。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长征中牺牲的留下姓名的营级以上指挥员共 432 人。

红军长征历经 11 个省，翻越了 18 多座大山，跋涉了近百条河流。许多险关、激流，都有敌人的重兵把守，用毛泽东的话讲，“天上每日有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军一路斩关夺隘，大小战斗 600 余次，击溃和歼灭敌人数百个团的兵力，俘虏敌军两万余，攻占 62 个中小城镇。这些战斗形势之险恶，战事之激烈和红军将士之英勇，无法用言词来形容。正是红军将士上下一致同仇敌忾，硬是走通了前人走不通的路，战胜了极其凶残的敌人，从许多被注定为覆灭之地杀出了一条生路。

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区，大多数是人烟稀少的贫困地区，甚至是没有人烟的原始森林和茫茫水草地。这些地方远离文明，缺少粮食，没有医药，而且地势险峻，气候变化无常。千年雪山，积雪终年不化，人烟绝迹。红军将士手拉手，甚至用绳子连在一起，不，是把生命绑在一起攀登跋涉。一支身着单衣、饥寒交迫的疲惫之师，凭着阶级的友爱，抱着必胜的信念，一步一步，艰难而又豪迈地征服了一座座雪山。茫茫草地，一望无边，时而雷雨风雹，时而烈日炎炎。许多人走着走着倒下了，再也没有站起来，还有的人一脚踏入沼泽，别的同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友活生生地被泥潭吞没而无力救援。到后来，连掩埋战友遗体的力气也没有了，后续部队不是靠路标，而是循着烈士的尸骨辨别前进方向。有人估计，草地吞噬的红军将士的生命，相当于长征中各次战斗中牺牲人数之和。在过草地时，战士们互相推让干粮袋中最后一把青稞，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自己宁愿选择饥饿和死亡。毛泽东把为自己准备的担架让给病号，周恩来把自己粮袋中最后一点青稞面煮成汤与战士共享，朱德亲自为部队寻找辨别可以吃的野菜，贺龙钓鱼为战士煮鱼汤……成为世代传颂的佳话。这种崇高的阶级友爱，激励和温暖着革命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生命跨越了时空，不只是自己的，

而是成为一个大“我”，活着就是一切，走出草地就是胜利。支撑着红军英雄们身躯的，不只是食物，也不只是意志，而是阶级兄弟的情谊和对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念。正是这种精神和情感，使红军终于超越了生存极限的困难，成为绝境天兵。

#### 四、北上抗日，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

当全国各路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在步步深入，中华民族遭遇了空前的危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不得不同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发动的全面“围剿”进行殊死的阶级搏斗，另一方面必须进行抵抗日寇侵略的全民动员和准备，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责任。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在同张国焘争论应在何处建立根据地时，就把革命低潮时的退却（被迫寻找立足的新根据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进攻联系起来，提出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正确方针。稍后，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指导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对中国共产党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35年12月17日，刚刚抵达陕北不久，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提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针对蒋介石集团为置红军于死地而发动的大规模“剿”共战争，他又提出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首先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和蕴藏在中国各阶层人民中的巨大潜力与积极性，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接着，分析了国民党阵营

的分化，即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时刻的动摇和转变，阐明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切实地提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任务。

北上抗日和在西北建立根据地的主张顺应了民心，也切合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实际。正如斯诺当年所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它有助于他们把一种有可能变成败坏士气的退却转变为斗志昂扬的胜利进军。”遵循这一战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如在党内和红军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调整国内关系、改变对富农政策等。同时制定和实施了创建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以此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针，适时地引导党的政策逐步实现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变。通过这些战略、方针、政策和步骤，促成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巩固和发展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团结起全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各阶层群众，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使中国革命由低潮走向高潮，并在更深远、更广泛的意义上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征成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总之，在危难之刻人们出于求生存的本能每每能迸发出精诚团结之心，但同时也总伴有惊慌、涣散和屈服。源自求生本能的合作，往往只是直接相关者在局部环节上的短暂合作。而在万里长征的两年光阴中所呈现的全党上下和军民之间、官兵之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生死与共的亲密团结，以及整个中华民族后来所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则是用求生本能所无法解释的。长征的光辉历程表明，这种团结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的

统率，必须有一大批经得起磨难考验的骨干力量去忘我奋斗，必须有崇高的理想和信念为支撑，还必须有现实的目标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引导；这种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是在同有碍奋斗目标实现的各种力量和思想进行斗争中达成的团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克服千难万苦促成这种团结，从而形成了无坚不摧的钢铁力量，终于赢得长征的胜利，谱写了中华民族奋斗史上辉煌的篇章。



## 5. 红军长征的最早记录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76 周年，长征的胜利结束是以 1936 年 10 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地区大会师为标志的。但是，关于红军长征的系统报道和宣传，却是在长征结束前一年就已经问世。

### 一、范长江与中国的西北角

当各路红军转战正酣之时，范长江就以《大公报》临时通讯员的名义于 1935 年 7 月至 1936 年 6 月，从成都出发到西北各省游历。他西北旅行考察的线路与红军长征过程重叠交错。常常是红军刚撤离，他就到达现场，报道战场实况，进行局势分析。他将沿途见闻写成 69 篇通讯，自 1935 年 9 月起陆续在《大公报》上刊出。范长江西北之行的多数通讯，被收入《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可能是出于政治上比较敏感的考虑，编入此书的通讯对红军行动的报道还只是一些片段，并不系统。当时他在《大公报》上还有 7 篇专门关于红军行动和红军领袖情况的报道，如 1935 年 9 月 13 日《大公报》刊载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在第一时间认定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毛尔盖地区集结一个多月后的动向，必是北出；10 月 9 日刊载的

《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一文，则具体分析了毛泽东统率的中央红军向北发展的五条可选择的路线，并详细探讨了吴焕先、程子华和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的行动路线；11月21日刊载的《红军之分裂》竟然比较准确地记述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分裂的原因和过程；11月26日刊载的《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更是以惊人地准确，描述了中央红军的构成和人数锐减过程，甚至得出陕甘支队单独北上后“毛泽东所统率的八九千人，仍为中央红军的主体，这一部分人的行动，仍代表红军的根本意图”的结论；同日刊载的《从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是通过采访一个掉队的红军人员，系统地记述了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经过湘桂黔滇川甘，直至陕边的大致过程；11月28日刊载的《陕北共魁——刘志丹的生平》讲到陕北红军发展迅猛时写道：“刘之个性强，富煽动性，政治与军事知识皆有相当长处，更加以地方黑暗政治为背景，容易煽动，遂成今日之局。”1936年1月4日发表《松潘战争之前后》一文，进一步分析了红一、四方面军分裂的原因，具体阐述了国共双方在松潘战役军事部署的得失和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被歼的经过，特别指出这场战役的后果之一“是中央苏维埃已由长江流域移到黄河流域，中央红军的主力，亦由中国的东南转到西北的陕北上来了”。

范长江的这些报道，从第三者的角度第一次十分准确而又系统地介绍了红军和红军长征的情况，立意公允，但又时常流露出对红军的同情和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一经发表，就引起广泛的关注，为《大公报》争得很大的声誉，《中国的西北角》热销一时，范长江也从此一举成名，成为较早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

## 二、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

几乎与范长江同时宣传长征的是陈云。有所不同的是，陈云是红军长征的亲历者。他是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和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参加长征的。长征开始时，他又被指定为驻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以后又担任军委纵队的政委，是中央决策核心的成员。1935年1月15至17日，陈云出席著名的遵义会议。会后，他和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受命到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陈云的传达提纲手稿，至今仍是研究遵义会议最重要的档案依据。在红军勇夺泸定桥的当天晚上，即1935年5月29日，陈云出席中央政治局泸定会议。会议决定派遣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去上海，恢复党在白区的工作。这样，陈云惜别朝夕相处的战友，由当地的地下党员席懋昭和随红军长征的冕宁地下党党员陈梁护送，经天全、雅州（今雅安）、成都、重庆，辗转于8月5日到上海。后经宋庆龄精心安排，由马海德护送乘船赴海参崴，于8月20日抵达莫斯科。此后不久，陈云回顾自己在长征途中8个月的不平凡经历，假托为一名被俘的国民党军医，化名“廉臣”写下《随军西行见闻录》。

《随军西行见闻录》全文约4万5千字，不仅是出自作者的亲历亲闻，而且是在作者离开长征队伍不久即写出的，加之作者曾经参与长征的领导决策这种特殊身份，因而具有真实性、权威性和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主要是：第一，系统地记述了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中旬从中央苏区突围西征，到1935年6月陈云离开这八个月间，由江西经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中华民国旧省名），而转入四川之理县、松潘与

红四方面军会合这一万二千里行程。单就战役而讲，《见闻录》较详细地记载了连破敌人四道封锁、转兵贵州、抢渡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兵临昆明、巧渡金沙、勇夺泸定等主要战役的经过，具体描绘了红军将士一路夺关斩将势不可挡的豪迈气概和传奇经历。这虽然不是长征的全部路程，但如此系统地正面记述红军长征的历史还是第一次。第二，为后人研究长征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例如，一些学术著述论及红军被迫离开苏区长征时，大多一味责难“左”倾领导者不准备不动员，仓促行动。事实上，难以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形势早已明朗，就连博古本人也清楚地认识到形势的严峻。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这么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左”倾领导者将行动神秘化，或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是有的，但完全不进行任何准备，不进行一定的动员是不可能的。《见闻录》中记载“此次红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入四川，显系有计划之行动。当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之目光观之，则红军确已进行了充分准备。自五月到九月召集了红军新兵将近十万人……”一段话，就很能启发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路。再如转兵贵州问题，有的论著认为，中央作出改变长征方向转兵贵州的决定不是在通道，至少是在红军占领黎平两天以后（1934年12月16日以后）。《见闻录》则在叙述了国民党军薛岳、周浑元等在城步、绥宁、靖县一带部署重兵阻止我与贺龙、萧克之红军会合的态势之后，明确地写道：“当时红军前锋已占通道县，即避实就虚而经过贵州之黎平府。”另外，1982年6月，陈云在答复有关部门询问他是否参加过黎平会议的复信中也曾写道：“中央决定不在湖南会同建立革命根据地，并向贵州进军。我和刘伯承应博古之约，在洪州司与他见面。他告诉我们，红军改向贵州前进。”红五军团（陈云当时随五军团行动）抵达洪州司的时间是12月16日，

第二日即移驻中赵，18日抵黎平。由此可知中央决定转贵州的时间应在到黎平之前，通道转兵的说法是完全成立的。总之，这样的事例和线索在《见闻录》中有很多，是研究红军长征历史的宝贵凭据。第三，《见闻录》不仅系统地记载了长征中红军将士行军打仗的主要过程，而且还涉及红军的俘虏政策、红军的群众工作、红军的组织纪律、红军的民族政策、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拥护和帮助、红军的抗日爱国热诚等多方面的内容。此外，《见闻录》还假借一个国民党军被俘军医的第三者眼光，如实入微地描绘了红军领袖们的坚毅、勇敢和机智，以及他们与国民党军形成鲜明对照的朴实、高尚的品质和廉洁、民主的作风。如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和他在为路旁饿以待毙的农妇让衣让粮时所表现的一片爱心；如朱德与士兵水乳相融素有“伙伏头”的称谓；如“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像徐特立林伯渠等的乐观、豁达、和蔼、可敬等等。在《见闻录》中提到的红军将领有几十人之多。在国民党方面对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人大加诋毁的情况下，如此全面真实地歌颂红军及其领袖，宣传红军的政策及红军的英勇无畏与不可战胜，不仅在当时起到了鼓舞振奋民心，团结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的作用，而且至今仍是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优秀素材。

《随军西行见闻录》写成于1935年秋，最早发表于中国共产党1936年在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同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1937年7月30日的巴黎《救国时报》再次发表此文。8月5日出版的《救国时报》还刊载了《廉臣捐赠“随军西行见闻录”版权启事》。这样就首先在海外宣传和报道了红军长征。目前所知，国内最早印行此文的是1937年3月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印行的《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一书，全文收入了此稿。该书是由北平进步青年王福时召集李华春、李放、郭达等人，

在美国记者斯诺夫妇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汇集并翻译斯诺等外国记者有关苏区的中英文报道编辑而成。该书共8篇300页。第一篇《毛施会见记》，是1936年7月15日至9月23日毛泽东与斯诺（当时他根据译音取中国名字为“施乐”）历次谈话的记录（不包括9月底至10月初毛泽东与斯诺谈自己生平和红军长征的内容）；第二篇《红党与西北》，是斯诺1937年1月21日在北平协和教會的讲演稿；第三篇是根据斯诺访问苏区后在《大美晚报》、《每日先驱报》等报刊上发表的13篇稿子翻译的，题为《红旗下的中国》；第四、五、六篇是根据英文刊物《亚洲》刊载的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诺曼·韩威尔有关红四方面军川陕苏区的三篇见闻翻译的，即《中国红军》、《中国红军怎样建立苏区》、《在中国红区里》；第七篇《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是毛泽东1937年3月1日同史沫特莱的谈话，是3月10日毛泽东亲自托人捎给斯诺请他“广为宣播”的；第八篇就是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需要强调的是该书虽然都是关于中国红军和苏区的内容，但专门谈红军长征的只有陈云这一篇。此外，斯诺还为该书提供了包括“毛泽东在保安”那幅著名照片在内的32幅照片和10首在红军中流行的歌曲，以及毛泽东的《七律·长征》。这是毛泽东“长征”诗的首次发表，与现在流行的版本对照，“金沙水拍云崖暖”一句，当时为“金沙水拍悬崖暖”。

《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第一版印行5千册，很快就销售一空。此后各地出现过十几种翻印本，其中流传较广的有1937年4月上海丁丑编译社和1937年1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翻印本。国内出版的单行本较早的有两种，即1937年11月民生出版社本（题目改为《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和陕甘人民出版社1937年12月本。此外，1939年1月大文出版社还将斯诺采访毛泽东关于红军长征的那段记述同陈云的这篇文章一同束集出版，题

为《长征两面写》（32开本，62页，北京图书馆收藏）。1985年1月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红旗》杂志曾经全文发表了这篇著作。1995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云文选》又根据1936年7月莫斯科出版的此文单行本，重新校订，再次全文收入此篇著作。《随军西行见闻录》是第一部系统反映红军长征这一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的著作。

陈云当时还有一篇关于长征的重要文献，即1935年10月15日，陈云（化名“史平”）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和《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写作风格和读者对象完全不同，这篇报告从正面叙述了长征的经过，并对其中的一些事件进行了因果分析和评论，更由于是对共产国际的报告，不存在保密的问题，因此，其史料价值和思想性之高，是同期所有关于长征的宣传报道和读物都无法比拟的。比如说学术界在论述遵义会议在实际上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时，往往只能从毛泽东所起的主导作用进行探讨，因为他在整个长征过程中都没有担任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职务。但是，这篇报告在介绍长征中如何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时，明确写道：“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这就为我们研究遵义会议后是否重新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提供了重要的佐证。陈云这篇报告很长时间未能公开，2001年第4期《党的文献》才首次发表了此报告俄文记录稿的翻译整理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的《陈云文集》第一卷，全文收入。

与此报告相关，陈云还有一篇关于长征的文章。1937年春出版的《共产国际》（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发表有署名“施平”的《英勇的西征》一文。笔者1995年在撰写一篇论文时曾向当时负责《陈云文选》编辑的一

位同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任陈云的秘书）询问此文的作者是否就是陈云，他说他曾问过陈云，陈云否认写过此文。但笔者将此文同《随军西行见闻录》对照，二者的起止时间是一致的，内容上也有许许多多的相近之处。而且，中央档案馆编辑的《馆藏革命历史资料作者篇名索引》中也将此文归在陈云名下。可是因为有权威人士的否定，只好存疑。1996年第5期《党的文献》重新发表《英勇的西征》，并在注释中明确，“施平”就是陈云。2001年陈云在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发表后，对比之下明显可见，《英勇的西征》不仅主要内容与陈云对共产国际的报告大致相同，甚至有些段落的行文也相一致。“施平”应该是“史平”的谐音，《英勇的西征》就是根据陈云对共产国际报告整理的，或者说是其“压缩版”。陈云是中国共产党高层宣传长征的第一人。

### 三、毛泽东亲自组织的长征宣传浪潮

毛泽东作为领导红军夺取长征胜利的统帅，对长征胜利的历史非常自豪，也十分重视对长征的宣传。1936年8月5日，他和总政治部代主任杨尚昆联名向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函：“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同时，他们又向各部队发出电报：“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段，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毛泽东和杨尚昆的征稿函所提到的“国际宣传”，主要是指为当时正

在陕北苏区进行采访活动的美国记者斯诺提供素材。斯诺是1936年7月13日抵达当时的红色首都——保安（今志丹县）的。从7月15日开始，到10月12日斯诺离开保安，毛泽东同斯诺进行了数十次谈话。其中，7月底到9月下旬，斯诺到彭德怀率领的西征军进行前线采访。据文献查证，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涉及的主要问题是：7月15日，谈外交问题；7月16日，论日本帝国主义；7月18日，谈内政问题；7月19日，继续谈内政问题；7月23日，谈特殊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及苏联的关系）；9月23日，论联合战线；9月底至10月上旬，应斯诺的一再要求，毛泽东与斯诺谈了他个人的生平。但是，正如斯诺后来所记述的那样，毛泽东谈着、谈着，就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斯诺记录下来的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生平，而主要是毛泽东所经历的中共党史，特别是对他刚刚领导的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得尤其细致。后来出版的以“毛泽东自传”或“毛泽东自述”冠名的各种书籍，大多就是在斯诺根据这些谈话写作发表的书籍和文章的基础上，编译而成的。因此，其内容除了叙述毛泽东的自述的简要生平外，几乎都有对红军长征过程的描述。除系统地采访毛泽东外，斯诺在苏区先后采访了数以百计的中共领袖和红军将领，以及普通的红军战士。刚刚结束的红军长征，仍然是他们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斯诺是1936年10月离开陕北的，毛泽东在8月发起的《长征记》征稿活动为他提供关于长征的系统资料，毛泽东本人还亲笔为他题写了《七律·长征》。斯诺可

谓满载而归。

斯诺离开苏区后在最短的时间里就写出多篇的报道。11月12日，当时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密勒氏评论报》就开始分期刊登斯诺写的《毛泽东访问记》。上海的英文报纸《大美晚报》，在稍后些的日子予以转载。接着，1937年2月5日，《大美晚报》发表了斯诺1月21日在北平协和教会发表演讲的稿子《红党与西北》；4月15日创刊的英文刊物《民主》，发表了《苏维埃的台柱子》（即回来收入《西行漫记》中的《苏维埃掌权人物》一节）；美国的《亚洲》杂志发表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毛泽东自传》以及关于长征的报道；《美亚》杂志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新共和》刊登了《中共为何要长征》；《星期六晚邮报》刊载了《我去红色中国——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秘史》。此外，《生活》杂志不仅刊载斯诺的有关报道，还以一千美元索购斯诺在苏区拍的照片75张。《每日先驱报》则在头版连载斯诺的报道，并配以大篇幅的照片和有关的社论。斯诺自己回忆，他单是为《纽约太阳报》就写了30篇报道。当然，斯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活动还是在撰写上述相关文章的基础上，写作和出版他的不朽之作——《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7月，《红星照耀中国》刚一出版，便立刻风行全球。10月，《红星照耀中国》英文本首先由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它一鸣惊人，短短的几周就发行10万册以上，一个月就加印了五次，被誉为“真正具有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著作”。1938年1月3日，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版。书出后，一个月就售出12000册，并连印数次，成为有关远东的非小说中的最畅销书。此后，《红星照耀中国》在国外被一版再版，先后被翻译为法、德、俄、西、意、葡、日、蒙、荷、瑞典、印地、哈萨克、希伯来、塞尔维亚等十余种文字

出版，驰誉全球。在斯诺的这些文章和著作发表不久，相关的汉译本随之问世。《红星照耀中国》最早的中译本是胡愈之组织翻译由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其广泛流传的盛况，已为众所熟知。还有一些字数不多的小册子，也流传广泛。如汪衡根据斯诺在《亚洲》杂志发表的《毛泽东自传》翻译、由上海文摘社于1937年11月印行的该书汉译本，当月就又印了第二版。根据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记载，截止到1949年，汪衡的这个译本，陆续有华北新华书店、大连大众书店、太岳新华书店、佳木斯东北书店、华北书店、冀中新华书店、胶东新华书店、北京民主书局、辽东书店、吉林书店等多家、多版次的翻印本问世。需要说明的是，在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上还可以看到，在汪衡译的《毛泽东自传》出版前后，还有多种其他译者翻译和别的出版机构出版的《毛泽东自传》问世（也都包括大量关于长征的内容）。比如，翰青、黄峰合译，上海光明书局1937年11月3日版；张洛甫译，陕西延安书店1937年版；平凡译，战时文化书局1937年版；张宗泽译，延安文明书店1937年10月再版；以及李杜译，汉口抗敌出版社版；毕正译，新建出版社版；丁洛译，上海三友图书公司版等。在共产党尚处于在野和非法地位的情况下，斯诺关于中国苏区报道的著作不仅能够热销一时，而且长久不衰，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著作真实地介绍了毛泽东的生平，传播了红军长征事迹，弘扬了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正如斯诺后来所言：从严格的意义来讲，这本书的大部分不是我写的，是中国革命青年所创造、所写下的。读者从中“可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毛泽东和杨尚昆发起的《长征记》征稿活动，截止期为1936年10月底。

由于征稿活动开展期间，红二、四方面军正在向陕北开进的途中，因此，所征集到的稿件几乎全部是反映红一方面军长征情况的。共有200多篇稿件，50多万字。经由徐梦秋、丁玲、徐特立、成仿吾等组成的编辑委员会编辑整理，于1937年2月编成《二万五千里》一书。该书由110篇文稿、30多万字，分上下两册，当时没有印刷，只是抄写了20份。直至1942年11月，八路军总政治部才把《二万五千里》作为党内参考资料印行。1955年5月，人民出版社选取其中51篇文稿，另收入“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和杨定华的《雪山草地行军记》（自1937年1月15日起在巴黎《救国时报》上连载）、《由甘肃到陕西》（自1937年7月5日起在巴黎《救国时报》上连载，当时的篇名为《由甘肃到山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后一阶段》）等文章资料，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为名，正式公开出版发行此书。

《二万五千里》虽然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印行，但仍为宣传长征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它的部分文稿刚刚征集上来就提供给斯诺之外，整部书稿编成后曾由潘汉年带到上海一部，潘将稿子转交给董健吾，嘱咐他设法出版。董健吾是中共秘密党员，公开身份是牧师。1936年2月，他和张子华受上海地下党的委托曾经潜往陕北苏区，传递国民党要员陈立夫希望与中共接触谈判的信息。同年7月，又是由他带领斯诺和马海德到陕北的。董健吾根据《红军长征记》，编写成《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一文，化名“幽谷”，在1937年7月出版的《逸经》杂志第33、34期合刊上刊出，文末还附录了“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为掩人耳目，作者在序言中自白：“余既非参与其役，又未列于追剿，何能言之凿凿，一若亲历其境者？盖于双方对峙之营垒中均有余之友好，各以其所知者尽述于余。余乃考其异

同，辨其虚实，然后以其可言者言之，以其可记者记之，而成此篇。”《二万五千里西引记》虽然篇幅不长，但把红一方面军经历的主要战斗、事件以及行军路线都按时间顺序交代得非常清楚、准确。将《西引记》的内容与《二万五千里》相对照，可见《西引记》中的有些情节直接引用了《二万五千里》的文字。例如，强渡乌江一节，引自刘亚楼的《渡乌江》；在茅台的经历一段，引自熊伯涛的《茅台酒》；关于“火焰山”行军的内容，引自艾平（张爱萍）的《火焰山》。《西引记》的公开发表后，引起轰动。除有一些刊物转载外，还有一些根据此文编写的读物出版。如1937年11月，上海光明书局出版黄峰编《八路军行军记》；12月，上海大众出版社出版赵文华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同月，复兴出版社的大华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等。这些文章、书籍的出版，多少弥补了《红军长征记》（即《二万五千里》）未能及时印行的缺憾。

这一时期关于红军长征的报道和宣传物，比较著名的还有继斯诺之后到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写的《伟大的道路》、斯诺的妻子海伦·福斯特（尼姆·韦尔斯）写的《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漫记》）和德国友好人士王安娜（王炳南的前妻）写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等。值得注意的是，1934年10月被红六军团裹挟一同在长征路上生活了18个月的瑞士传教士勃沙特（全名鲁道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比亚吉特），在被释放离开红二、六军团后，撰写了《抑制的手》一书，比较客观地记录了他在长征中的奇异经历。该书于1936年12月由英国伦敦哈德尔和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汉译本名为《神灵之手——一个为基督事业在中国被俘者的自述》），勃沙特成为第一个向国外介绍中国红军长征的外国人。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谱写的一幕英雄史诗，

是一曲前无古人的绝唱。这段真实的神话，在第一时间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极大地震撼着中国和世界。人们惊奇地看到：在中国有这样一个群体，虽然自己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处于生死未卜的危险境地，但却肩负着民族解放的期望，胸怀着世界大同的理想；他们凭借着崇高的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坚忍不拔，团结友爱，英勇奋战；他们以劣势的装备和兵力，却冲破了几十倍于己的强敌的围追堵截，克服了超越生存极限的各种艰难险阻，硬是从注定为覆灭之地杀出一条生路，并掀起拯救民族危亡的新高潮。这一人间奇迹，使得在黑暗中苦苦挣扎的四万万中国同胞看到了民族解放和兴盛的希望，也使得全世界的善良人们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和坚强。

## 6. 长征中围绕领导权的斗争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绝境求生的一场伟大斗争。所谓长征，实际就是远距离的转移作战，作为一种战略，存在着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其中长征的领导权问题，特别是究竟采用什么样的军事路线问题。这是决定长征成败的最直接、最关键的因素。这里想着重探讨的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领导权问题。

—

在敌强我弱的总态势下，各路红军在其战略转移中都曾遭遇过重大的挫折与困难，方志敏所部更是基本上全军覆没。红一方面军作为红军的主力之一，又是和党中央、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一起行动，更成为敌军疯狂围追堵截的重点。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遭受惨重牺牲，8万6千中央红军锐减为3万，几乎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这给党的领袖和红军将领，乃至全体红军，以前所未有的震撼。而这一严重挫折又与中央根据地被迫沦陷过程中的一次次沉痛记忆联系在一起，就更加重了人们对把持军事指挥权的“三人团”的严重愤懑，进而引起人们对军事路线的深刻反思，声讨的矛头直指“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

事实上，由博古、周恩来和李德组成的“三人团”，是在长征前夕专

门为实施战略转移而成立的。1935年5月广昌战役失败后，在中央苏区面临失守的情况下，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的“三人团”<sup>①</sup>，负责筹划和领导红军的战略转移。但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在中央苏区的贯彻和对红军指挥权的把持，却由来已久。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作战方针进一步加以指责，并完全剥夺其对红军的指挥权。虽然在随后进行的第四次反“围剿”中，由于周恩来和朱德等继续实行毛泽东既往的军事方针（毛泽东开始时也参与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计划的筹划），从而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但是，在第四次反“围剿”后，“左”倾教条主义的深入贯彻而所采取的红军主力分兵出击、地方武装升级组建主力军团准备与国民党军“总决战”等军事冒险行动，已经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分兵把守、短促出击、以堡垒对堡垒、决不丧失苏区一寸土地等军事教条主义主张全面渗透，军事指挥权也逐步地为既不了解中国国情，更不了解苏区实际的“洋顾问”李德等人所完全把持。他们实行一条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和退却时的逃跑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而“三人团”成立后，军事指挥的进一步专断，使“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达到顶峰，并最终使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后陷入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

当时，把持中央和红军领导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将摆脱危机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既定的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上，他们幻想先放下包袱，再回过头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毛泽东则更洞察红军当时面临的危险处境，认为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摆脱强敌的围追堵截，掌握战场的主动权。毛泽东坚决抵制那种不顾蒋介石已经在通往湘西的途中布置了十几万大军的口

袋阵，还要硬往里钻的做法，明确提出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样，围绕战略方针的转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绝大多数红军将领与“左”倾教条主义者争夺红军指挥权和领导权的斗争，就激烈地爆发了。

转兵贵州的意见，经过在老山界的争论和通道会议的讨论，得到多数同志的支持，并在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上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得到确认。在随后召开的猴场会议上又得到进一步的重申，并限制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这些，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遵义会议上，经过激烈的争论，形成的重要成果可概括为三：一是彻底否定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取消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体制，决定仍由军事上的最高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二是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完毕后中央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sup>(2)</sup>；三是决定俟后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并指定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以上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围绕领导权问题斗争第一阶段的主要情形。

遵义会议作为“伟大的历史转折”而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1945年4月21日，党中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评价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共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sup>(3)</sup>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但是，遵义会议当

时并没有推举毛泽东“在党内负总责”，也没有让他成为“最后在军事指挥上下决心的负责人”。那么，怎么认识这一史实与上述两个历史决议所做论断之间的差异呢？

第一，中央红军创建和发展的历史证明，毛泽东是正确军事路线的代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阶段红军节节失败的惨痛现实，使全军上下达成共识，毛泽东是替代已经走投无路的教条主义者，指挥红军重新走向胜利的唯一恰当人选。关于这两点认识，有很多回忆材料可资证明，因为众所熟知，故不再赘述。

第二，从长征开始到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是与“左”倾教条主义者及其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斗争的主导者。这包括适时提出正确的进军路线、作战方针和思想发动、组织串联等。有鉴于此，也有很多史料佐证，这里不再一一列出。

第三，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长篇发言，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周恩来发言时就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拥护。<sup>④</sup>杨尚昆也回忆：“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sup>⑤</sup>在随后酝酿更换党的“总负责人”时，据周恩来回忆：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向云南扎西行军途中，洛甫首先提出中央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毛泽东找周恩来商量，把洛甫要求变换中央领导的意见告诉了他。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泽东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sup>⑥</sup>可见，毛泽东当时就是红军和党的最高领导职位的主要人选。只不过是个人坚决不同意而暂缓。

第四，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领导长征最终取得胜利的大小决策

中，也确实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这是党的其他领袖人物和红军将领们一致的认识。陈云是党中央决策层的重要成员，他对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担任党和红军最高职务的情况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根据毛泽东事实上所发挥的作用，在1935年10月15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报告遵义会议情况时就明确：“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sup>(7)</sup>几十年以后，邓小平在审阅《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时，明确要求删掉其中“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领导地位”一语中的“实际上”三个字。他说他当时是党的秘书长，是遵义会议的与会者。会后的行军中，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他实际上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sup>(8)</sup>

## 二

遵义会议是“伟大的历史转折”，这一转折的作用主要是在会后发生的。同样，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但是其领导地位能否得到全党和红军的衷心拥护，在当时还是个未知数，关键是要摆脱长征以来的危险被动局面，使红军转危为安。这个过程几经周折。

（一）遵义会议在解决最急迫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的同时，又鉴于贵州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等情况，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改向比较富庶、并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可做策应的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1935年1月28日，毛泽东指挥北进的中央红

军与四川军阀刘湘的军队在土城遭遇，由于对敌情判断有误，打了一扬拉锯战（从未能实现战役目的的角度，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开会，决定立即命令部队撤出战斗，于29日拂晓前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进入泸州的古蔺、叙永地区，伺机北渡长江。

（二）2月2日，红一军团攻打叙永城未克，电台又侦知川军有5个旅从北面压来，与从背后追击上来3个旅，对红军形成夹击之势。2月3日至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叙永石厢子的万寿宫（当时属古蔺）开会，决定改向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集结，避开敌人锋芒，准备从云南昭通渡过金沙江。

在石厢子还有一个重要决策，就是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对此，学术界一直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的花房子。我的理由是：其一，陈云当时的记录和周恩来等多位亲历者事后的回忆都是在向威信进军途中川、滇、黔交界处一个“鸡鸣三省”的地方（或村子）。当地的学者实地考察后确认，在三省交界处，在当时和现在都没有一个以“鸡鸣三省”命名的村庄，而三省交界的岔河一带被人们通称为“鸡鸣三省”。具体地说包括云南威信县的水田寨等地、贵州毕节县的德胜等地和四川叙永的水潦（距石厢子仅有10分钟的车距，同属今天的石坝彝族乡，笔者在2012年6月22日曾实地考察）等地。<sup>⑨</sup>其二，杨尚昆回忆“时间大约在1935年2月5日”，刘英回忆也是2月5日。<sup>⑩</sup>更重要的是，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于2月4日1时来电请示行动方针，并要求“中央和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2月5日，项英再次来电催促中央“请立复”。2月5日，中央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复电，郑重告知：“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指原中央苏区——引者注）的问题”，指示他们在原

地坚持游击战争，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指定由项英、陈毅、贺昌等五人成立中革军委中区分会，以及军委分会与中央分局的分工等重要内容。这份电报开头处标识“万万火急”，电报末尾又特意说明“决议详情续后”，这表明是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发出的（比如马上要出发）。根据项英4日的来电和5日中央的这份回电确定，中央政治局和军委肯定在2月4日至2月5日召开过会议。而且，学术界也普遍推论，在讨论给项英复电内容之前，肯定要先讨论决定了张闻天与博古交接权力问题，然后才可能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正式复电项英。其三，军委纵队在石厢子的两天正好是除夕和大年初一，这是中央领导在一渡赤水后至2月9日到扎西镇期间，唯一一次在一个地点逗留两天的机会。朱德2月3日22时致各军团首长的电报明确：“军委纵队明日仍在石厢子不动，准备开水田寨、扎西之间的地域。”因为没有会议记录留存，我们只能从发出的电报分析开会讨论的内容。查朱德在2月4日的23时半和2月5日的凌晨3时，分别签署有电报。其后最早的电报则是5日21时的。其中2月5日凌晨3时的电报分别调整了红一、三、九军团的行军路线，并明确：“我野战军目前方针在集中全力于长宁以南及西南地域争取休息，进行渡金沙江的侦察，在渡江不可能时，即留川滇边的机动。”这一计划实际上也是这次会议讨论决定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四，在5日的21时半的电报中，朱德明确：“军委一梯队今到滇境之水田寨，明拟续向扎西前进。”<sup>①</sup>据当时因受伤而和军委纵队同行的陈伯钧日记记载：2月5日，“由石厢子走小路到水田寨，行程75里”，“到宿营地已次日2时了”。陈的日记中还讲到有滇军一营固守碉堡，不能立即克敌，形成对峙。军委二局（负责收发电报和监听敌台）的伍云甫2月5日日记记载：“由石厢子出发，经水田寨，团匪据炮楼二座扰乱，绕山道至花屋子（即

花房子——引者注）宿营，路甚难行（3里路约行3小时），23时半才到。”这些电报和日记表明，2月5日白天，军委纵队行军一天到水田寨，因为有守敌干扰，又绕道到3里外的花房子宿营，已经很晚。翌日（2月6日）天亮就又行军45华里到石坎子了。由此，我们推论2月5日晚抵达花房子后，中央和军委领导不可能有从容的时间集会讨论党的最高领导权交接、给苏区中央分局和项英复电和中央红军下一步的战略方向等多项重要内容。所以，在没有更可靠的材料证明的情况下，我认为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的时间，应该是1935年2月3日至2月5日凌晨（至少可以肯定2月4日是开过会）在石厢子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的。朱德在2月5日的凌晨3时签署的电报可为佐证，说明至少在5日凌晨3时会议还没有结束。综上所述，石厢子会议决定了三件事情：一是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二是关于苏区中央分局今后的行动方针和成立中革军委中央苏区分会；三是调整并确定中央红军新的进军方向。

著名学者程中原把2月5日至9日，中央和中革军委在行军路上分别于水田寨、石坎子、大河滩和扎西镇的江西会馆召开的一系列会议，通称为“扎西会议”，并认为这些会议与遵义会议有着密切的联系，是解决遵义会议“未解决了的”和“未解决好的”问题。<sup>②</sup>这一观点是很有见地的。受其启发，我认为尽管从地域关系说，石厢子会议不像其他几次会议都是在云南威信县（扎西镇）境内召开的，但就其所解决问题的性质而言，与上述会议是完全一致的，是上述会议的开端。或者说石厢子会议属于“扎西会议”系列之一，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期间，继中央常委再行分工更换最高领导之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还有一些重要的举措和行动。一是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并向全军传达，用毛泽东一贯力行的军事原则和作战方针

武装各级指挥员的思想；二是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减少了番号和指挥层次，充实了一线战斗部队，并进一步彻底清理了行装；三是加强了与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与中央军委（原中央苏区）的沟通和联系，促成各路红军的协同配合；四是划拨400多精干指战员，组织了由干部团政治科科长余泽鸿和红三军团师政委徐策率领的川南游击队，以策应主力红军的行动。这些举措和行动，使全军上下步调一致，部队的战斗力得到大大地加强。

（三）扎西会议期间，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改变了遵义会议关于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一度确定在川滇黔边界地区创建根据地。这时，通过军委二局破译敌军电报得知，不仅滇军主力从昭通、毕节压了过来，而且川军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都跟进围追上来，形成合围之势。毛泽东和军委决定跳出敌人包围圈，杀个回马枪。主力红军于2月18日和19日，出敌不意，分别从太平渡和二郎滩再渡赤水河，插向敌军防守薄弱的黔北地区。2月下旬，红军强占娄山关、再取遵义城，追歼吴奇伟，取得击溃黔军8个团、消灭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俘虏3000人的重大胜利。这是长征以来中央红军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1934年4月广昌战役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3月4日，根据张闻天的建议，为加强和统一指挥作战，中革军委签发命令，设立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以来，重新担任的第一个军队领导职务。

（四）遵义战役胜利后，红军上下，欢欣鼓舞，高级将领们也都积极寻找战机，欲图再打几个大胜仗，彻底转变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但是，在事实上，面对十倍于我的敌军，特别是又无根据地为依托，红军不仅在实力、装备方面，而且在伤员安置、后勤补给、敌情侦察和隐蔽行动等方面，

都存在超乎寻常的困难，很难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才是第一位的任务，而寻机歼敌则需要足够的耐心。3月10日，张闻天在鸭溪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到会的绝大多数同志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他认为已经没有战机，不主张硬啃，强调还是打运动战。双方互不妥协，毛泽东提出如果一定要打，他就辞去刚刚担任的前敌政治委员职务。会议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还是要打打鼓新场，并免去毛泽东的这一新任职。当晚毛泽东仍然对此战的后果担忧，就去找周恩来，经过仔细分析，周恩来同意暂缓发出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第二天一早，张闻天再次召集会议讨论，毛泽东和周恩来终于说服了大家，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因此事触发，毛泽东认为，遵义会议以来每每要通过政治局和军委联席会议形式讨论决定作战方针的状况，不能适应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他建议成立新的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3月12日，张闻天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临机决断，全权指挥部队。这样，毛泽东在红军的主导地位从组织上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五）毛泽东把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现实任务和重建根据地的既定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他不为寻找新根据地所束缚，而是依据战场实际，时而向北摆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态势，时而又回头显露出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趋向，把包袱甩给敌人，机敏地与强敌周旋。他根据敌情率领中央红军又两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在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中往来穿插，彻底改变了遵义会议前红军的被动局面，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在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生路，最终摆脱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

以上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围绕领导权问题斗争第二阶段的主要情形。

### 三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之战，不仅为亲身经历了那场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的广大红军指战员所称道，而且也一直被学术界广泛认可，毛泽东本人更是称其为他战争生涯的得意之笔。但是，2010年第11期《炎黄春秋》发表夏宇立的文章《四渡赤水评价考》，对此有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评价。其中特别把毛泽东提议成立“新三人团”自己成为成员一事，称为“权谋”。这里谈两点我的认识。

第一，遵义会议除了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外，还有一大成就，就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调整党和军队的组织问题。自中共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中央主要领导的更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共产国际操纵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惨重损失，使中央领导层普遍认识到必须改变中央的领导成员和决策机制。再加上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的中断，在客观上促成遵义会议和会后对中央领导人选和决策机制的自主调整。但是，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隶属关系和其由历史形成的影响力，也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等当时必须充分考虑的因素。因此，在这次自主决定主要领导的权力过渡中，采用的是平稳的逐步过渡。首先是在遵义会议之前的猴场会议上就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就恢复了政治局的决策权，使“三人团”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受到了限制。第二步是遵义会议上剥夺了原“三人团”中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但没有立即撤消博古党内最高负责人的职位。而让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

的总结的决议》，突出了张在中央核心层的作用。第三步是在叙永县的石厢子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由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第四步是成立“新三人团”，进一步组织上突出毛泽东在军事指挥方面的核心地位，但是并没有改变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这一地位。不仅如此，遵义会议后，在批判“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和调整党中央、中革军委组织问题的过程中，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像过去宗派主义者那样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而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端正思想，通过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程序改变其领导，以保证正确军事路线的贯彻执行。比如对博古，仍然保留了他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与四方面军会师后还一度让他接替王稼祥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长征到陕北后，又让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重要职务；再如对在遵义会议上公开支持博古，并同毛泽东激烈争论的凯丰，后来仍让他担任少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和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而实际是党内和军内主心骨的毛泽东，却始终不肯担任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位。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从当时党内情况出发，回避开政治路线的是非争论，并十分策略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集中解决当时最急迫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权问题。这样，就最大程度地争取了中央领导层同志们的支持，很好地维护和促进了党中央的团结。党中央的团结和统一，不仅保证了对中央红军战胜敌军围追堵截的坚强有力领导，而且在后来克服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当张国焘扬言要“审查中央路线”，并借口统一指挥来“解决组织问题”时，博古、凯丰和李德等都坚决地站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一边，赞同和支持党中央关于北上的方针，使张国焘没有可乘之机。这就愈见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解决军事问题而一般肯定党的政治路线之

高明。上述情况，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坚定的党性原则与高超的领导艺术，以及忍辱负重的宽阔胸怀。

第二，四渡赤水之战是决定党和红军命运之战，是在红军士气最低落、身心最疲惫、处境最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生死攸关的绝地反击；对于被推到历史大潮浪尖上的毛泽东来说，则是对其军事指挥才能和军事思想的最直接的检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面临着如何维系党和红军的团结、如何肃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路线的影响、如何把无根据地依托所造成的困难降到最低、如何克服高山大河等恶劣自然环境、特别是如何突破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等一系列严峻情况的挑战。从军事学角度看，指挥四渡赤水之战不同于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时期毛泽东的战略指挥，也不同于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毛泽东领导粉碎敌人“进剿”、“会剿”和“围剿”时的战役指挥，而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战役指挥，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关红军的生死和中国革命的兴亡。当时形势之危急、问题之复杂、压力之巨大、任务之艰险，在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从1935年1月下旬离开遵义到5月9日全军渡过金沙江，长达4个月时间。在整个令人窒息和倍感煎熬的战役过程中，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并不是一下子和盘托出了，其战术安排也是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不要说红军作战部队的基层干部和普通战士，就是在中央决策层的领导和高级红军将领中，能够完全理解毛泽东战略意图的也为数很少。特别是在当时瞬息万变的危急形势下，客观上也不允许把全局的作战计划悉数告知分路行军的各军团首长。因此，质疑和责难之声不绝于耳。但是，多年的艰苦磨砺，造就了毛泽东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自信，他以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排除了各种困惑和干扰，率领全体红军将士

迸发出钢铁般的意志和无坚不摧的力量，硬是从绝境中杀出一条生路。这其中，至为重要的是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正确的军事路线。正如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所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sup>⑩</sup>就这样，中央红军“人是昨天的人，枪是昨天的枪，昨天打败仗，今天打胜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成就了红军这段神话般的历史。

#### 四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围绕红军的领导权问题爆发了更为激烈的斗争。

由于长期在国民党军分隔包围下独立作战，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和不尽相同的战斗作风与战术素养。乍一会合，也难免有分歧，甚至在少数人的头脑中不排除还有山头主义的影响作祟，以至于在长征路上出现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的严重膨胀。从表面看，双方争论的焦点是究竟在什么地区寻找和建立新的根据地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武装斗争的实践中逐步深刻地认识到，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共产国际也在1930年就把建立根据地作为“中国党头等重要的任务”。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的丧失，迫使红军“把主力从过去的苏区撤出，目的是要在中国西部的广阔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sup>⑪</sup>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的惨重牺牲，特别是四渡赤水战役中无根据地依托所造成的困难和痛楚，更加重了战士们

对根据地的依赖。对此，红四方面军同样是感同身受的。在一定意义上说，能否找到新的根据地做立脚点是红军长征成败的标志。这是当时全党全军的共识。如果说，在长征中关于领导权问题斗争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主要是围绕达到这一目标的方针展开的（实质是实行什么样的军事路线）；那么，在此阶段争执的核心则是进军方向问题。

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在川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思想，首先是基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周边的敌情和相关战略方向的地理环境、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当时夹金山以南是国民党的追兵严阵以待，向东岷江成都方向也有130个团重兵把守，向西则是广阔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稀少，自然条件恶劣；只有向北经川西北到川陕甘地区，那里地势开阔，人口稠密，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其次，南方各路红军反“围剿”的失败与各根据地的丧失，以及遵义会议后在川西和川滇黔建立根据地努力的落空等客观事实，使毛泽东等认识到敌强我弱的大环境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即使是建立起新的根据地，也会在强敌的持续围攻下陷落，还必须得到更可靠、更有力的依托与支持。因此，他们的目光投向了与中国西北等地接壤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向西北进军“打通国际线”，成为这时确定战略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再者，毛泽东针对华北事变以来民族危机的加重，他在6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并认为“这最能动员群众。”<sup>⑤</sup>这样就把北上抗日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军方向联系起来，实际就是把革命低潮时的退却（被迫寻找立足的新根据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进攻联系起来。因此，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的战略发展方针是当时唯一可行、后来又被实践证明的正确方针。相形之下，张国焘所坚持的西进南下方针，及其所谓“大举南下，

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蛊惑，则显得苍白无力。其与中央进行争执的实质，是个人野心膨胀，企图攫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同时也反映出其逃跑主义的军事主张。

在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径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把在遵义会议以来已经成功运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原则，发挥到极致，树立了一个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典范。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虽然真理在握，但并不以个人命令去强制别人执行。他很注意发挥党中央集体的领导作用，重大决定都由政治局会议做出，发挥了党中央集体的坚强有力领导。二是在原则性问题上不退让。张国焘的行为不只是一般的党内争论，后来发展到分裂党的严重程度。因此，毛泽东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如对张国焘觊觎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权和对红军最高指挥权，以及挑战党中央北上方针等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的大问题等，理直气壮地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三是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为了促成北上方针的实施，维护全党和全军的团结，毛泽东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批评帮助，并一再做出很大的妥协让步，比如先是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进而动员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委的职务。特别是在张国焘公然抗拒中央，企图以武力威胁中央改变方针，党中央不得不率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的严重情况下，毛泽东一方面在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上揭露批判张国焘的军阀主义行径，同时他又努力说服要求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同志。他说，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因为他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许多干部的安全。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统率着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难以见面了。

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们北上，甚至在10月5日张国焘擅立第二中央，公开分裂党以后，毛泽东在与之进行严肃斗争的同时，仍冷静地说服其他同志不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以便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11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对外名义和组织分工的会议上，毛泽东煞费苦心提议：中央对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的名义。<sup>①</sup>这就为以后由共产国际派遣回国的张浩从容协调中央与红四方面军的关系，埋下了重要伏笔。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推举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红军的最高军事首长。

张国焘的倒行逆施受到包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内的全党上下一致强烈的反对，加上其南下川康边的行动严重受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张浩、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以及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并放弃其南下计划。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一同北上，于是有了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的大会师。这样，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所造成严重的党内危机终于被克服。

在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坚决斗争的过程中，1935年9月9日，毛泽东率红一军、红三军（即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后改称陕甘支队）摆脱危机先期北上后，又对其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做了局部的调整。1935年9月27日，在榜罗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根据新近了解到的陕北还保存有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这一新情况，确定前往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抵达陕北后，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先后胜利地部署和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征战役、山城堡战役。此外，他们还直接领导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和策

应因发动西安事变而遭国民党中央军队进攻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和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以及西路军的英勇远征，不仅粉碎了各路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围剿”，而且沉重打击了根据地周边地区的敌军，大大拓展了苏区。使原来的陕北苏区发展成为以延安为首府，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26个县和200万人口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这标志着长征获得最终的胜利和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企图彻底破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新的栖息地和出发点，中国革命有了长期稳固的大本营。

以上为长征中关于领导权问题斗争第三阶段的主要情形。

综上所述，长征中的领导权问题关系到军事路线的正确与否和正确行动方针的能否顺畅地贯彻，关系到全党的团结与否和红军战斗力的强弱，关系到彻底打破强敌的围追堵截还是被其歼灭，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与中国革命的兴衰。这是一个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纷繁复杂而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解之题。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之所以最终能交出胜利的答卷，其原因有很多，比如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追求真理和坚持真理的勇气；毛泽东等领袖人物的大智大勇；全体红军将士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与吃苦耐劳精神；由共同理想信念凝结起来的全党和全军的团结等等。归根结底，最为重要的是，经过无数次成功与挫折的磨练，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中国革命和红军的坚强领导核心。其成熟的标志就是开始独立自主地根据所面临的实际，确定自己的路线，最大限度地团结和组织调动一切力量，审时度势，为达目的而努力奋斗。如果在遵义会议前，党和红军的领导群体没有形成共识与决心，就不可能在遵义会议上否定“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并剥夺其领导，长征就不可能出现根本转机；如果没有在四渡赤水阶段血与火的生死较量中检验，

遵义会议会议的成果就得不到巩固和发展，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他所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就不可能真正确立，也就不可能摆脱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取得长征的主动权；如果没有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及其坚强有力的领导，就不可能制胜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也就不可能有各路红军会师西北，并最终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长征的亲历者陈云，当年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把党的成熟作为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他指出：“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它在国内战争的炮火中得到了锻炼，的确变得有能力领导像我们的西征这样光荣伟大的事业。”<sup>⑦</sup>

## 注：

(1)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版，第262页。

(2)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参见《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3页。

(3) 《毛泽东选集·附录》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页。

(4)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9页。

(5)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118页。

(6) 周恩来1972年6月10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6页。

(7) 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

参见《陈云文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 页。

(8) 邓力群：《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8 页。

(9) 翟昭明，《“鸡鸣三省”洛甫博古接交权时间地点考》。参见《光辉的扎西会议》，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31 页。

(10) 《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9 页。

(11) 《朱德年谱（1886～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58 页。

(12) 程中原，《关于扎西会议的几个问题》。参见《光辉的扎西会议》，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7 页。

(1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48 页。

(14) 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 年 10 月 15 日）。参见《陈云文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 页。

(15)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61 页。

(16)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84 页。

(17) 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 年 10 月 15 日）。参见《陈云文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7 页。

## 7. 中国革命中心的北移与陕甘根据地的战略地位

20 世纪 30 年代中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路红军由南向北进行了大迁徙。大迁徙的原因，起初是因为在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的强力“围剿”下，由于中共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红军未能击退敌人的进攻，南方各红色根据地丧失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但是在迁徙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改变并逐步纠正了党内的错误路线，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领导核心，他们正确地判断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经过艰苦的英勇奋斗，将为求生存被动进行的迁徙，转变为以抗日救亡为中心内容的主动进攻，并胜利地实现了革命重心的北移。而陕甘革命根据地则成为各路红军这次胜利迁徙的最终落脚点，同时它也成为中国革命走向新高潮的出发点。

—

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以来，中国革命的中心一直是在南方。辛亥革命主要是在南方发动并取得胜利的；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等领导的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战争等也是由南向北发动的；国共合作掀起的大

革命和北伐战争依然是以南方为中心逐步展开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也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中心摆在了中国南方。南昌起义后向广东的进军、海陆丰的武装暴动和广州起义，都有先建立两广根据地，再度北伐的意图；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的毛泽东也认为，红军的组成、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区，必须是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sup>①</sup>当时先后建立的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除陕甘和陕北之外，基本上分布于中国的南方省份。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发生转变，中国革命的重心逐步由南方向北方转移。这是因为：

其一，自明成祖定都北京以来，北方长期是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心。但是，清末以来，继满清封建统治的被推翻，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的分裂及其随后在国民革命军发动的北伐和二次北伐中的土崩瓦解，在中国北方，不仅旧的反动统治势力已经被摧毁，而且继之而起的新军阀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的势力，也在新军阀混战、南京国民政府的削弱政策的打击，以及日本侵占我东三省的过程中，遭到重创。中国北方的反动统治力量大为削弱。

其二，大革命后期通过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起的蒋介石政权，由于得到江浙等富庶地区地主买办阶级以及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1928年12月，随着东北易帜而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接着，南京政权在与各路军阀混战中，一一胜出。特别是在规模最大的一次军阀内战——中原大战中，蒋介石战胜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以及汪精卫

等国民党内各反蒋政治派系的联合挑战，其统治力得到空前的巩固和膨胀。虽然，此后直至蒋介石政权最后在大陆覆灭，各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甚至是武装摩擦，一直没有停止过，但都已不足以对蒋介石的统治构成实质性的威胁。蒋介石政权把持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命脉。

其三，在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平息以后，蒋介石一方面在其统治的中心区发动更为严酷的白色恐怖，使长期在上海领导全国革命的中共中央无法立足，不得不迁往中央苏区。与此同时，他还纠集大军对分布在南方各省的各路红军和各红色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在强敌的进攻下，先是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敌人第四次“围剿”，撤出了鄂豫皖根据地（关于红四方面这次战略转移的决策是否得当，这里不论），转战川陕；不久，留下坚持在鄂豫皖地区斗争的红二十五军，也踏上了战略转移之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成为丧失；接着，湘赣革命根据地也陷入危急，红六军团作为战略先遣队撤离湘赣根据地，赴湘鄂西与贺龙部会合，湘赣根据地失守；与湘赣根据地共同作为中央苏区战略支撑和屏障的闽浙赣苏区，此时在敌人的围攻下，红十军团几乎全军覆没，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被捕就义，苏区沦陷；最后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后，也落入敌手，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与分布在南方的各路红军一样，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这样，中国南方的革命运动陷入低潮。

其四，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东北、热河的武装侵占和对华北地区侵略渗透，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机。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风起云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出现和长城抗战、绥远抗战的爆发，以及北平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的酝酿，表明以抗日救亡为核心的新的革命高潮正在中国的北方日益高涨。

而位于北方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包括陕北），硕果仅存，历史性地成为党中央与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新的革命高潮的策源地。

## 二

各路进行战略转移的红军最终需要有一个落脚点，所以，能否重建新的根据地成为长征胜负的标志。这是所有红军将领和党的领袖们的共识。当年刚刚抵达陕北瓦窑堡的毛泽东，就曾明确地指出：“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豪迈地宣告：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sup>②</sup>长征中各路红军长途跋涉寻找或开辟新的根据地的过程，恰恰就是中国革命重心北移的过程。

在战略转移的过程中，各路红军都曾为建立新的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其中，红六军团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后改为红二军团）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会师后，曾建立了以湖南大庸（今张家界）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1935年1月到11月）；红四方面军则建立了以四川通江、南江、巴中地区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1933年10月到1935年2月）；红二十五军开辟了鄂豫陕根据地（1934年12月到1935年7月）。这三路红军一度或部分取得成功的原因，除去红军指战员的英勇作战、注重发动群众，以及分别有贺龙部队、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队、鄂豫陕地方党组织接应等因素外，主要是因为上述地区在红军开进时，尚没有蒋介石的嫡系武装进驻，而当地的军阀又分为多个派系，利益纷争。随着国民党正规军的跟进，特别是在蒋介石以中央政权的军令、政令，统一指挥调度和严厉督促下，地方军阀协调一致共同对我的情况下，这三支红军虽然都取得了巨大的战

果，但已经很难站稳脚跟，使新建的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后来红四方面军根据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电令，红二、六军团根据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的电令，红二十五军则是依据他们掌握的情报和战场形势，分别决定并陆续重新踏上长征路。这反映出南方地区反动统治势力的强大，红军已经难以在那些地区建立稳固的根据地。

中国南方反动统治势力的强大，在中央红军创建新根据地的斗争中反映得更为突出。中央红军作为红军的主要力量，又是和党中央、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一起行动，更成为敌军疯狂围追堵截的重点。在突破敌军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之战后中，出发时的 86000 红军锐减至三万，并且由于国民党重兵堵截，这使当时把持中央和红军领导权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既定的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建立新根据地的设想，成为泡影。

毛泽东洞察红军当时面临的危险处境，认为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摆脱强敌的围追堵截，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他坚决反对“左”倾领导者不顾蒋介石已经在通往湘西的途中布置了十几万大军的口袋阵，还要硬往里钻的做法，明确提出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转兵贵州的意见，经过自越过老山界开始的一路争论和通道会议的讨论，得到多数同志的同意支持，并在随后召开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得到确认。在做出转兵贵州决策的同时，当时还确定了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作为新的进军目标。

占领遵义后举行的遵义会议，除彻底否定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取消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体制，并实际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外，又鉴于贵州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等情况，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改向比较富庶、并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革命根据

地可做策应的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1935年1月28日，毛泽东指挥北进的中央红军与四川军阀刘湘的军队在土城遭遇，由于对敌情判断有误，打了一场拉锯战（从未能实现战役目的的角度，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开会，决定立即命令部队撤出战斗，于29日拂晓前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进入泸州的古蔺、叙永地区。2月3日至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叙永石厢子的万寿宫（当时属古蔺）开会，决定改向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集结，避开敌人锋芒，准备从云南昭通渡过金沙江。从而改变了遵义会议关于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再次确定在川滇黔边界地区创建根据地。

这一时期，毛泽东把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现实任务和重建根据地的既定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他不为寻找新根据地所束缚，而是依据战场实际，时而向北摆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态势，时而又回头显露出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趋向，把包袱甩给敌人，机敏地与强敌周旋。他根据敌情率领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接着，又两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最终摆脱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围绕进军方向问题，以毛泽东和张国焘为代表的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的在川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思想，首先是基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周边的敌情和相关战略方向的地理环境、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当时夹金山以南是国民党的追兵严阵以待，向东岷江成都方向也有130个团重兵把守，向西则是广阔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稀少，自然条件恶劣；只有向北经川西北到川陕甘地区，那里地势开阔，人口稠密，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其次，南方各路红

军反“围剿”的失败与各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以及遵义会议后在川西和川滇黔建立根据地的努力落空等残酷现实，也使毛泽东等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南部，敌强我弱的大环境短时间很难改变，即使是建立起新的根据地，也会在强敌的持续围攻下陷落，还必须得到更可靠、更有力的依托与支持。因此，他们的目光投向了与中国西北等地接壤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向西北进军“打通国际线”，成为这时确定战略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再者，毛泽东针对华北事变以来民族危机的加重，他在6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并认为“这最能动员群众。”<sup>③</sup>这样就把北上抗日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军方向联系起来，实际就是把革命低潮时的退却（被迫寻找立足的新根据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进攻联系起来。综上所述可知，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的川陕甘战略发展方针是当时唯一可行、后来又被实践证明的正确方针。相形之下，张国焘所坚持的西进南下方针，及其所谓“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蛊惑，则显得苍白无力。其与中央进行争执的实质，是个人野心膨胀，企图攫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同时也反映出其逃跑主义的军事主张。最后发展到公然抗拒中央，企图以武力威胁中央改变方针，党中央不得不率红一、三军（即红一、三军团，9月22日又根据俄界会议的决定整编为陕甘支队）先行北上。

随后，毛泽东又对其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做了局部的调整。1935年9月28日，在榜罗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根据从报纸上进一步了解到的陕甘苏区状况和红二十五军已经与陕甘根据地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并组成红十五军团这一新情况（作为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到中央苏区参加了“二苏大”的贾拓夫，长征中以红军总政治部白

区工作部部长身份一直随中央纵队行军，他已经介绍过陕甘根据地 1933 年 10 月以前的一些情况），确定前往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10 月 19 日，陕甘支队胜利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

### 三

陕甘根据地（包括陕北）是自大革命失败前后起，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一次次在失败和挫折中奋起，经过近 10 年的牺牲奋斗，才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块红色根据地。到中央红军长征到来时，这里已经在连成一片的 20 多个县（一说 23 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所及达 30 多个县，根据地面积 6 万多平方公里；这里有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两支主力红军 4000 多人，另有相应人数的游击队，加上新近抵达的红二十五军，陕甘根据地共有红军 8000 人，与陕甘支队的人数大体相当；这里临近抗日前线，又与苏联和蒙古国遥相呼应，符合实施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打通国际线依托苏联、发动民族抗战推动革命新高潮战略的条件；这里虽然也被杨虎城西北军、张学良东北军、阎锡山晋军，以及宁夏马鸿逵等军阀武装所包围，但由于这些地方实力派同时还与蒋介石之间心怀二志，客观上对蒋介石嫡系追兵的“进剿”起着碍手碍脚的作用，这使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稍得喘息；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有人口 150 余万，长时期以来受到共产党人的发动和影响，特别是多数地区已经进行了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革命，群众的斗争觉悟普遍很高，并形成了刘志丹、谢子长、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领导骨干和干

部队伍。但是在另一方面，陕甘根据地客观上也存在着与成为中国革命大本营和新的革命高潮策源地这一重要地位不相称的差距。这主要是地域狭小、人口稀少、地瘠人贫，特别是在中央红军抵达这里时，由于仍在顽固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北方局代表等开展的错误肃反，包括刘志丹、张秀山、高岗、习仲勋等在内的一大批领导人被抓，数以百计的红军骨干被杀，陕甘根据地和陕甘红军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

如何在陕甘根据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是党中央抵达陕北后萦绕在毛泽东脑际的主要问题。他认真反思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丢失中央根据地的原因。他认为，“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指中共与外界的一切交往，而不是专指与外国的交往——引者注）之策（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sup>④</sup>有鉴于此，毛泽东当时主要从组织路线、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等三个方面领导进行了巩固与发展陕甘根据地、迎接中国新高潮的艰苦努力。

第一，开始全面地纠正“左”倾教条主义者的组织路线，果断地停止了在陕甘根据地进行的所谓“肃反”，释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骨干，并重新分配了他们工作。同时，给予在陕北搞肃反者以处分。当听说还有三百多名在鄂豫皖苏区肃反中被定为“反革命嫌疑”的人尚未做结论时，毛泽东说：他们长征都走过来了，这是最好的证明，应该统统释放；党员、团员要一律恢复组织生活，干部要分配工作。<sup>⑤</sup>鉴于因为“肃反”造成的红十五军团内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军之间隔阂，他要求对红二十五军和由红一军团调到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干部进行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教育，

对陕甘红军“不得发生任何骄傲与轻视的态度，”对陕甘红军干部的“尚怀不安与不满进行诚恳的解释，”“使红十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团结如一个人一样。”<sup>(6)</sup>与此同时，毛泽东认为“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应该“从发展北方以至全国的武装力量出发”予以重视。他要求清查降级使用人员，把他们提升起来，同时提拔老战士开办教导营。<sup>(7)</sup>他在给红军主要将领的电报中曾明确要求：“凡属同意党的纲领政策而工作中表现积极的分子，不念其社会关系如何，均应广泛地吸收入党，尤其是陕甘支队及二十五军经过长征斗争的指战员，应更广泛地吸收入党。”“凡属经过长征的分子，一律免除候补期。”<sup>(8)</sup>

事实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遵义会议前后已经开始着手端正和树立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在江西遭到撤职和错误批判的邓小平就是在1934年底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并参加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及其以后通过调整中央分工，确立了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体制，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过程中，一批过去“左”倾教条主义者撤职处分，甚至是在保卫局监督下参加长征的干部被解放出来，走上新的战斗岗位；遵义会议后，在批判“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和调整党中央、中革军委组织问题的过程中，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像过去宗派主义者那样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而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端正思想，通过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程序改变其领导，以保证正确军事路线的贯彻执行。比如对博古，仍然保留了他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长征到陕北后，又让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主席的要职；再如对在遵义会议上公开支持博古，并同毛泽东激烈争论的凯丰，

后来仍让他担任少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和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在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更是苦口婆心。他坚持正确的党内斗争原则，十分注重团结和教育各个方面军的干部。由于树立和贯彻了正确的党的组织路线，恢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正确地开展了党内斗争，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的干部路线，在全国各路红军大迁徙的特定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团结了全党和全军。随着全国各主力红军会师西北高原，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十年后，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迎接全面抗战的爆发和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积蓄了强大的力量。这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的根本前提。

第二，毛泽东及其战友们以陕甘根据地为依托，先后胜利地部署和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征战役、山城堡战役。此外，他们还直接领导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和策应因发动西安事变而遭国民党中央军进攻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和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以及西路军的英勇远征，不仅粉碎了各路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围剿”，而且沉重打击了根据地周边地区的敌军，大大拓展了苏区。使原来的陕甘苏区发展成为以延安为首府，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26个县和200万人口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这标志着长征获得最终的胜利和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企图的彻底破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新的栖息地和出发点，中国革命有了长期稳固的大本营。在此过程中，毛泽东还用很大的精力总结自己的军事思想，力图从理论上肃清“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影响，并以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军。他在保安（今志丹县）创办了著名的窑洞大学——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并亲自为学员们讲授“中国

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肃清。

第三，解决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内对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孰重孰轻的认识是不清楚的。当时占据中央领导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根据苏联提出的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的对立是“国际关系的核心”的论断，积极响应苏联所谓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是进攻苏联的序幕的观点，提出要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他们认为，只有首先推翻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能直接地毫无阻碍地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关门主义，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坐失九一八后国内抗日民主运动高涨的良机，使自己陷入孤立，并在强敌的围攻下遭受严重损失。无独有偶，在陕甘根据地主持“肃反”的北方局代表也不切实际地要求西北红军武装保卫苏联，打通国际线。<sup>⑨</sup>

“北上抗日”是红军长征伊始就打出的旗帜。1934年7月红七军团就是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从瑞金出发到闽浙赣根据地的。如前所述，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提出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北上抗日，以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陕甘支队长征抵达陕北苏区时，他和他的战友们面临的抉择是，如果不战胜国民党军的“围剿”，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生存还都是疑问，何谈抗日？但如果不正视中日间的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这一严重现实，就会失去民众的支持，不仅难以战胜以“政府”名义来“进剿”的国民党军，而且，即使是能够克服眼前的生存危机，也必然会失去领导神圣的民族抗战的资格。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既不是照搬共产国际七大

的精神，<sup>⑩</sup>也不是泛泛地发号召，而是综合考察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归纳分析各阶级在外敌入侵时的态度和利害关系，因而他提出的主张显得更切实可行。12月1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sup>⑪</sup>这就初步明确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的关系，把民族大团结战争摆在了第一位。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首先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和蕴藏在中国各阶层人民中的巨大潜力与积极性，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迫切性。接着，报告分析了国民党阵营的分化，即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时刻的动摇和转变，阐明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向党和全国人民切实地提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任务。更为难能的是，毛泽东一开始就注意到在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一个必须正视的核心问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问题。毛泽东始终不认为地主买办营垒是铁板一块。他首先从理论分析中得出：在半殖民地条件下，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触犯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利益时，中国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亲英美派“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接着，毛泽东在阐述“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时进一步指出：“这个政府的范围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因此，这个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此后，

毛泽东一方面在全党和全军中广泛地开展了统一战线思想的教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肃清了“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号召全党都去做统一战线工作；另一方面他也不是一味地、无条件地求和，他指挥红军坚决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打破了蒋介石消灭红军和用军事力量压迫中共同意其收编红军的幻想。与此同时，毛泽东既领导全党为广泛建立下层统一战线而积极努力，又以很大的精力亲自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他多次致信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宋庆龄、蔡元培等爱国领袖和国民党左派，表达对他们爱国行动的敬佩和赞赏；他广泛联系地方实力派，如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西康的刘文辉，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华北的宋哲元，云南的龙云，以及失势的地方实力派首领冯玉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争取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给蒋介石以外部的压力。他还直接致信、电给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和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邵力子、宋子文、孙科、于右任、陈立夫、覃振和胡宗南、王均、汤恩伯、陈诚、贺耀祖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并通过他们影响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立足于陕甘根据地，努力扩大红军，积极发展与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之间的统战关系，提出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三位一体”，以西北的联合抗日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一重要战略。这一战略的成功实施，客观上成为发生西安事变重要前提条件。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则成为时局转变的关键，并最终促成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在这一过程中，陕甘宁根据地成为了发动新的革命高潮——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策源地和出发点。

长期以来坊间流传着两句话：究竟是陕甘救了中央，还是中央救了陕甘？从上述情况看，没有陕甘根据地就没有长征的胜利；同样，如果没有党中央的到来，陕甘根据地也难以为继，更不会有后来的辉煌与影响力。1945年4月，在长征胜利10年之后，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这样评价陕甘根据地：“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人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sup>①</sup>他的话，一语中的。

## 注：

(1)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页。

(2)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50页。

(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1页。

(4) 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时的批注，阅读的时间是1936年11月到1937年4月4日。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107页。

(5)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9页。

(6)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1页。

(7)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1页。

(8)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0~501页。

(9) 张达志,《忆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第二、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的一些情况》。参见《甘肃文史资料》第九期。

(10)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及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参见《毛泽东、共产国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党史资料》第72期。

(11)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7页。

(12) 《毛泽东在七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 8. 斯诺 1936 年的陕北之行及其著作的流传

1936 年 7 月至 10 月，美国记者斯诺的陕北苏区之行及其同毛泽东的会晤，是中外新闻史和外交史上的传奇之笔。随着斯诺相关著作的出版和流行，在中国和全世界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七十多年后，重温这段历史，依然历久弥新。

—

斯诺的陕北之行，之所以能够成行，不是偶然的冒打冒撞，而是经过双方的精心组织和准备。斯诺去苏区的想法，首先是通过他所执教的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和地下党员的介绍，得到中共北方局的支持；而后他又到上海得到宋庆龄、董健吾等的帮助。1936 年 3 月，斯诺和马海德曾经赶到西安，想通过在张学良处做地下工作的中共代表刘鼎的关系去陕北，但未果。7 月，他们第二次又去，终于成行。在中共中央方面，对接待第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记者，也十分重视，事先做了认真的准备。1936 年 4、5 月间，中共中央曾收到过斯诺提出的一份问题单子，上面所列的 11 个问题，就是 7 月 15 日，毛泽东第一次同斯诺谈话时所回答的主要内容。5 月 15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了“对外邦如何态度——外国新闻记者之答复”。中央常委张闻天、毛泽东和博古，以及王稼祥等参加了会议，并发了言。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记录下这次会议对斯诺所提问题的答复，其主要精神也可在7月15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见，双方事先都对这次后来显现出历史性意义的会见，做了充分的准备。

斯诺和同行的美国医生马海德是1936年7月初到达共产党人的辖区——陕北安塞，开始了他的红色中国之旅。按照在安塞迎接他们的周恩来为他们制定的为期92天的行程，7月13日，他们抵达当时的红色首都——保安。当天，毛泽东就到他们的驻地看望这两位远方来客。翌日，第一次接待西方记者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意召开了欢迎大会，毛泽东又亲自出席。从7月15日开始，到10月12日斯诺离开保安，毛泽东同斯诺进行了数十次谈话。后来斯诺发表的所有相关文章和著作，主要就是依据这些谈话的内容编写的。据文献查证：

7月15日，谈外交问题；7月16日，论日本帝国主义；7月18日，谈内政问题；7月19日，继续谈内政问题；7月23日，谈特殊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及苏联的关系）；9月23日，论联合战线（7月底到9月下旬，斯诺到彭德怀率领的西征军进行前线采访，与毛泽东的谈话一度暂停）。9月底至10月上旬，应斯诺的一再要求，毛泽东与斯诺谈了他个人的生平。但是，正如斯诺后来所记述的那样，毛泽东谈着、谈着，就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斯诺记录下来的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生平，而主要是毛泽东所经历的中共党史，特别是对他刚刚领导的红军长

征的历史，叙述得尤其细致。后来出版的以“毛泽东自传”或“毛泽东自述”冠名的各种书籍，大多就是在斯诺根据这些谈话写作发表的书籍和文章的基础上，编译而成的。因此，其内容除了叙述毛泽东的自述的简要生平外，几乎都有对红军长征过程的描述。

事实上，这期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所涉及的问题是极其广泛的，讲述其个人生平只占很少的比例。更多的是介绍和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内外方针政策。其中，许多问题是第一次提出。比如：第一次全面地对外阐述了红色根据地的建设及其政策；第一次正面地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第一次声明欢迎蒋介石参加反日的抗战（7月18日讲，较9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早两个月）；第一次表示“在他（指蒋介石）愿意抵抗日本的那一天，把我们的军队放在他的指挥之下”；第一次宣布：如果各党各派的抗日联合政府成立，“中华苏维埃将变成他的一部”；第一次肯定，“假如南京的联合战线成立”，现行的苏维埃法律，尤其是关于土地问题的部分，将被废止。

.....

毛泽东通过斯诺向中国、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团结抗日的急切和赤诚，批驳了国内外反动派对中共和苏区以及红军的种种污蔑。其中，他特别通过斯诺传播了他关于日本必败和中国必胜的科学预言。要知道，当时抗日战争还没有全面爆发，一切预示抗战前途的征兆还不明显，在“亡国论”弥漫的情况下，毛泽东以他严谨的推理和缜密的分析，使人感到对他的结论不容置疑。毛泽东在后来发表的著名的《论持久战》（1938年5月）中，也不无自豪地写道：“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还在两年之前我们就一般地指出了。还在1936年7月16日，即西安事变前5个月，卢沟桥事变前12个

月，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毛泽东“持久战”的思想，为历史发展的进程所证明，是指导中国军民最终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战略思想。

毛泽东当时之所以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又那么专心致志地同斯诺交谈，其原因正像斯诺后来所写的：“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他被剥夺了合法地向中国报界发表意见的可能，但是，他知道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语发表出去，尽管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也会传回到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耳朵里。”因此，当1936年10月蒋介石平息“两广事变”后，再次把“围剿”的锋芒指向西北的红军时，毛泽东就一再催促斯诺抓紧离开苏区。为了保证斯诺路途的安全，毛泽东曾于10月5日、10月7日、10月10日的中午12时和晚上24时（零点），四次打电报给中共驻西安张学良部的代表刘鼎，要他请张学良安排其所部王以哲军长、刘多荃师长，派车来接斯诺。正是在毛泽东的亲自安排下，斯诺在10月12日离开苏区，经西安于10月底安全地返回北平。

## 二

斯诺没有辜负毛泽东和中共的期望，回到北平不久，他就驱车到美国领事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了他在苏区之行的重要消息。他随即就成为中外记者追逐的对象。斯诺在最短的时间里就写出了多篇的报道。在他回到北平不到两个星期的11月12日，当时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密勒氏评论报》就开始分期刊登斯诺写的《毛泽东访问记》。文章用问答的形式介绍了毛泽东对许多人们最关心问题的基本态度和见解。上海的英文报纸《大美晚

报》，在稍后些的日子予以转载。接着，1937年2月5日，《大美晚报》发表了斯诺1月21日在北平协和教会发表演讲的稿子《红党与西北》；4月15日创刊的英文刊物《民主》，发表了《苏维埃的台柱子》（即回来收入《西行漫记》中的《苏维埃掌权人物》一节）；美国的《亚洲》杂志发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毛泽东自传》以及关于长征的报道；《美亚》杂志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新共和》刊登了《中共为何要长征》；《星期六晚邮报》刊载了《我去红色中国——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秘史》。此外，《生活》杂志不仅刊载斯诺的有关报道，还以一千美元索购斯诺在苏区拍的照片75张。《每日先驱报》则在头版连载斯诺的报道，并配以大篇幅的照片和有关的社论。斯诺自己回忆，他单是为《纽约太阳报》就写了30篇报道。

除去撰写发表他在苏区访问的见闻、感受和采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谈话记录外，斯诺还参加和召集各种的报告会，报告他的苏区之行。当然，斯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活动还是在撰写上述相关文章的基础上，写作和出版他的不朽之作——《红星照耀中国》。

1937年7月，伴着卢沟桥上空隆隆的炮声，斯诺完成了他一生中最杰出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红星”一出，便立刻风行全球。10月，《红星照耀中国》英文本首先由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它一鸣惊人，短短的几周就发行10万册以上，一个月就加印了五次，被誉为“真正具有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著作”。1938年1月3日，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版。书出后，一个月就售出12000册，并连印数次，成为有关远东的非小说中的最畅销的书。此后，《红星照耀中国》在国外被一版再版，先后被翻译为法、德、俄、西、意、葡、日、蒙、荷、瑞典、

印地、哈萨克、希伯来、塞尔维亚等十余种文字出版，驰誉全球。

斯诺的文章和著作，首先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苏区及其领袖毛泽东等人的情况，以及他们所阐述的各项政策和外交原则，第一次客观地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所了解；接着这些消息又反馈到中国国内，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主要是涉外人员和懂英文的）也第一次比较客观全面地了解到中共及其领导的苏区和军队，特别是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所做的种种努力；通过中国的这批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关于合作抗战的诚意和政策，又为更多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和上层人士所知晓。尤其是斯诺当时所发表的那些文章，基本上发表在卢沟桥事变前，又主要地集中在西安事变前后发表，因而对推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但是，由于斯诺的这些著述都是用英文写成的，又主要发表在英文报刊或由国外的出版公司出版，因此，对中国广大群众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

### 三

着手把斯诺关于中国苏区和毛泽东的英文报道翻译成中文的，首先是中共方面的人士。中共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黄敬就曾设想组织人翻译。当时在燕京大学读书的龚澎（斯诺当时在燕京大学教授新闻课，龚是他的学生），曾经从斯诺那里借去一些手稿，翻译了若干章节，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员中传阅。

最早也是最系统地把斯诺的相关文章进行翻译并汇集成书的是北平的爱国青年学生王福时。他是东北大学代校长王卓然（校长由张学良兼任）的儿子，西安事变后他在北平秘密编印油印小报《公理报》，报道事件的真相。

由于其父亲代表张学良与斯诺有密切交往的关系，王福时也经常出入斯诺家，斯诺夫妇“把后来在欧美成为热门畅销书的书稿无偿又贴钱地提供给我”（王福时语）。1937年初春，王福时组织李华春、李放、郭达等对各篇书稿进行翻译，汇集成册，于3月初完成。他们给书稿起了很耐人寻味的名字《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随即由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印刷出版。全书共八篇，300页。

第一篇《毛施会见记》（1928年斯诺初到中国不久，在上海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施乐”），记述了毛泽东与斯诺1936年7月15日到9月23日的历次谈话（不包括稍后毛泽东与之谈生平的内容）；第二篇是斯诺的讲演稿《红党与西北》；第三篇是根据斯诺在《大美晚报》、《每日先驱报》、《太阳报》等报刊发表的十三篇稿子翻译的，题为《红旗下的中国》，后来构成《红星照耀中国》的主体部分；第四、五、六篇与斯诺无关，是根据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诺曼·韩威尔在《亚洲》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的三篇见闻翻译的，题为《中国红军》、《中国红军怎样建立苏区》、《在中国红区里》；第七篇《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是1937年3月1日毛泽东与同史沫特莱的谈话。此篇虽然不是毛泽东与斯诺谈的，但却是毛泽东在3月10日亲自托人给斯诺，请他收阅，“并为宣播”的；第八篇《随军西行见闻录》，是陈云为宣传红军长征化名“廉臣”写的，1936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办的《全民月刊》上连载，7月在莫斯科出单行本。此外，斯诺还为该书提供了包括“毛泽东在保安”那幅著名照片在内的32幅照片和10首在红军中流行的歌曲，以及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据查也是首次发表，且与现在流行的版本有个别字词不同）。

《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可以说是《红星照耀中国》的雏形本，它早

于《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版四个月，比1938年2月复社的中译本《西行漫记》早了差不多一年。它第一版印了50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此后出现了十几种翻印本，其中流传较广的是1937年4月上海丁丑编译社和1937年11月以“陕西人民出版社”名义印行的翻印本。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该书出版不久，1937年4月，该书的总编译王福时（当时叫王爱华）就陪同斯诺的夫人尼姆·威尔斯（又名海伦·斯诺）访问延安。5月15日，在毛泽东会见他们的时候，王将此书送给毛泽东。中央档案馆收藏的《毛泽东抗战言论全集》（民族解放社1938年1月印行）中《与美国记者史诺的谈话》一篇，就是据此刊印的。

在当时及以后一个时期影响最大的斯诺著作的中译本，是胡愈之主持、复社翻译出版的《西行漫记》。据胡愈之回忆，当他从斯诺那里拿到刚从伦敦寄来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样书，阅读后欣喜不已。为慎重起见，他曾找中共驻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刘少文，了解此书的写作背景。在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后，他便在上海“租界”的抗日救亡人士定期举行的“星期二座谈会”上，提出翻译出版此书。经讨论决定由王厂青、林淡秋、陈仲逸、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符等人分别承译，他本人统稿，以“复社”名义出版。出版资金是通过译者个人捐款及利用社会关系征集读者预约金等方式筹集的。由于大家齐心协力，1937年12月开始翻译，到1938年2月10日出书，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鉴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书名不是照英文本直译，而是用了一个隐晦含蓄的名字《西行漫记》。因为在此之前，《大公报》的著名记者范长江曾历时10个月、行程4千多里，在中国西北地区考察，写了大量的报道，后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内中透露了不少有关红军和长征

的消息，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明眼人一看书名《西行漫记》，就会自然地联想到这是一部与中共和西北苏区有关的书籍。该书一问世，顷刻售罄，接着印了二版、三版、四版……与此同时，各种翻印本、抽印本，形式上有手抄的、油印的、铅印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沦陷区和国统区，许多青年冒着生命危险争相传阅，辗转传抄，或像怀揣珍宝一样携带着《西行漫记》，历尽艰险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其影响力和感染力之大，超乎人们的想象。

在《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和复社的《西行漫记》出版之间，还有一种斯诺陕北之行著作的中译本曾经广泛流行，那就是根据斯诺在《亚洲》(Asia)杂志第37卷第7号至第10号连载的文章翻译的《毛泽东自传》。目前见到的最早印行的一个本子，是由翰青、黄峰合译，上海光明书局1937年11月3日出版。该书的正文分四章，第一章，少年时代；第二章，修学时代；第三章，红军怎样产生；第四章，从“围剿”到长征。全书共3万余字，记述了毛泽东从出生到1935年长征到陕北期间的经历。该书的附录部分收入了《毛泽东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论抗日联合战线》、《毛泽东论抗战必胜》，以及毛泽东、朱德等红军将领联名致蒋介石一致抗战的电文。该书的正文前印有毛泽东1937年7月13日的题词手迹：“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是今日对日作战的总方针。各方面的动员努力，这是达到此总方针的方法。一切动摇游移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另有毛泽东在红军大学演讲时的照片，以及与其夫人贺子珍的合影。

从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上可以看到，在这个译本的《毛泽东自传》出版前后，还有多种其他译者翻译和别的出版机构出版的《毛泽东自传》问

世。比如，汪衡翻译，由上海文摘社于1937年11月印行，当月就又印了第二版；张洛甫译，陕西延安书店1937年版；平凡译，战时文化书局1937年版；张宗汉译，延安文明书店1937年10月再版；以及李杜译，汉口抗敌出版社版；毕正译，新建出版社版；丁洛译，上海三友图书公司版等。此外，上海进步图书馆于1937年11月5日还出版了斯诺原著、白华编译的《毛泽东印象记》一书，收有斯诺写的印象记33则，其中若干有关毛泽东生平的史实，是前述的《毛泽东自传》和《西行漫记》中所没有的。总之，在共产党尚处于在野和非法地位的情况下，能有如此众多的《毛泽东自传》和斯诺记述其陕北之行的著作中译本出版，不仅热销一时，而且长久不衰，其积极意义自不待言。出版者的勇气和远识，也是极可敬佩的。

在复社版《西行漫记》问世的40年后，1979年12月，中国大陆又推出了两种有关斯诺陕北苏区之行的译著。一是由董乐山翻译，三联书店重新出版的《西行漫记》。这个译本，不仅补上了复社版所缺的第十一篇，文字流畅，富有文采，居然印行了165万册，是流行最广的一个译本。二是当年为毛泽东和斯诺谈话做翻译的吴黎平重新翻译整理的《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吴黎平鉴于“斯诺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叙述撰写的《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在《西行漫记》前后几种英文版本里，好些地方文字有出入”，而当年由黄华（当时叫王汝梅）翻译为中文，并经毛泽东仔细审阅的记录稿和他本人当时记的东西，“都找不到了”，或“荡然无存”这一情况，根据自己的记忆，重新翻译和校正了这部分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吴黎平先把译稿印了几百份征求相关人士的意见，特别是他还得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前身——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大力帮助。该机构指定由胡绳主持、黄允升、高风和叶志如等参加，

结合其他档案资料，对译稿中的人名、地点、时间和史实进行了认真的校订。虽然还不能说吴黎平的这本译著也“是毛泽东口述并亲笔修改的生平事迹的忠实记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重新出版汪衡译、原上海文摘社版《毛泽东自传》封底所载内容介绍），但不能不承认，它是同类译著中最准确、最权威的一个译本。

此后，关于斯诺1936年陕北之行有关著作的中译本，又出版了多种。主要是：董乐山译，1984年8月新华出版社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即《斯诺文集》第二卷）；李方准和梁民译，1992年1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是依据1977最新英文本翻译的）；1993年2月，人民出版社在吴黎平《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的基础上，又收录了1939年、1960年和1970年毛泽东与斯诺的三次谈话，出版的《毛泽东自述》；稍后，该社又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本；1999年9月，译林出版社在其出版的“播火者译丛”中的《胡愈之译文集》里，重新收录出版了复社版《西行漫记》的第五版；2001年9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了汪衡译、原上海文摘社出版的《毛泽东自传》。

1936年7月到10月，斯诺的陕北之行，他与毛泽东及其他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历史性碰撞，所产生的火花和光焰，是如此绚丽，又如此具有生命力。它穿越时空，70多年来照耀和温暖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追其原因，正如斯诺后来所言：从严格的意义来讲，这本书的大部分不是我写的，是中国革命青年所创造、所写下的。毛泽东、彭德怀等所作的长篇谈话，还有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读者从中“可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 9. 毛泽东外交生涯的开端：《毛泽东年谱》编写补记

毛泽东的外交生涯是从1936年7月在保安会见美国记者斯诺开始的。从1936年7月到七七事变前的一年间，毛泽东在陕北共接待并会见了六批外国友人，构成了这个时期毛泽东诸多革命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年谱》撷取其中四次有代表性的会见加以记述。<sup>①</sup>

### 一、会见斯诺

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的传奇性会见是人们所熟知的。但人们对这件事情一般都是通过《西行漫记》了解的。该书最初是用英文写成，1937年10月，伦敦维克多·戈兰茨首版发行。最早的中译本则出版于1938年2月。为了准确地记述这一历史性会见，我们努力查找原始记载，发现了斯诺在回到北平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就开始在《密勒氏评论报》分期刊出他的《毛泽东访问记》，并被上海的《大美晚报》转载。1937年2月5日，《大美晚报》还发表了斯诺的演讲稿《红党与西北》。4月15日创刊的英文刊物《民主》发表斯诺的《苏维埃的台柱子》（即后来收入《西行漫记》中的《苏维埃掌权人物》一节）。

中央档案馆提供的1938年1月民族解放社刊印的《毛泽东抗战言论全

集》，其中收有《与美国记者史诺的谈话》。这一中文本文集较“复社”1938年2月翻译出版的《西行漫记》，时间要早，内容上看更具有原始记录的特征。但据斯诺本人和当时为毛泽东和斯诺做翻译的吴亮平回忆，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没有做中文记录，只是斯诺根据吴亮平的翻译做了比较详细的英文笔记。那么，民族解放社刊印的这一文集又是依据什么呢？幸运的是在我们写这段《年谱》时，北京大学等单位为纪念《西行漫记》出版五十周年刚刚举行过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中有王福时的《西北印象记的“独家新闻”》一文。它使我们了解到早在1937年3月，在斯诺夫妇的直接帮助下，北平的进步青年王福时、李华春、李放、郭达等就翻译出版了斯诺无偿提供给他们的关于中国苏区情况的诸篇报道。随即，我们访问了王福时老人。他说，他们为这本书取了颇有趣味的书名——《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该书由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印刷出版，第一版5000册很快就销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该书出版的第二个月，即1937年4月，王福时就陪同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访问了延安。5月15日，毛泽东接见韦尔斯和王福时，王将此书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成为该书最早的读者之一。可惜的是王福时本人也不存有北平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他向我们出示的是1937年1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翻印本。回来后，《年谱》编辑组的一位副主编从中宣部图书馆借来1937年4月上海丁丑编译社翻印的此书。该书共八篇，300页，其中第一篇《毛施会见记》记述了毛泽东与斯诺1936年7月15日至9月23日的历次谈话（不包括9月底10月初毛泽东与斯诺谈自己生平的内容）。民族解放社的《与美国记者史诺的谈话》就是据此刊印的。这个最原始材料较民族解放社刊印本的珍贵之处在于它还记载了毛泽东与斯诺每次谈话的日期，这为撰写《年谱》提供了可靠依

据。根据《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并结合《红色中华》等多种文献的记载，我们在《毛泽东年谱》中记述了：（1936年）7月13日，毛泽东到斯诺和马海德住地看望当日到达保安的这两位美国客人；7月14日，毛泽东出席欢迎斯诺和马海德欢迎会，并即席讲话；7月15日，会见斯诺，回答他关于苏维埃政府对外政策的提问；7月16日，自晚上九时至次日凌晨二时，同斯诺谈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方针问题；7月18日、19日，同斯诺谈苏维埃政府的对内政策问题……这样，我们就在《毛泽东年谱》中比较准确地展示了毛泽东和斯诺1936年历史性会面的全过程。

## 二、会见史沫特莱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前夜，毛泽东同史沫特莱也有过一段很深的交往。大概是因为史沫特莱是在亲身经历了西安事变以后到延安的，1937年3月1日，毛泽东特别同她进行了题为《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的长谈。毛泽东对这次谈话非常重视，因为这是他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新形势下系统地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特别是就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社会各界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四项要求五项保证的种种误解做了有力辩驳。毛泽东除了将此次谈话记录的整理稿在1937年3月16日、19日、23日、26日、29日和4月3日的《新中华报》上分六期连载外，还于3月1日和3月29日分别致信斯诺和范长江，指出：“我同史沫得列（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斯诺收到毛泽东的信后，随即将这篇谈话交给王福时，作为《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第七篇，于当日在北平出版印行。《毛泽东年谱》是根据《新中华报》的刊载，概述了这篇重要谈话。

### 三、会见尼姆·韦尔斯（即海伦·福斯特）

韦尔斯是斯诺的夫人。受斯诺陕北之行的感染，也为进一步丰富斯诺采访苏区的材料，她于1937年4月动身去陕北，在西安遇阻，后经红军驻西安办事处请示毛泽东批准，于5月初抵达延安。当时，毛泽东正忙于主持全国苏区党的代表会议，但仍热情地接待并多次会见了她。特别是1937年5月14日夜至次日凌晨，毛泽东同她彻夜长谈。陪同尼姆·韦尔斯来陕的王福时（当时叫王爱华），将这次谈话记录成稿，后发表在北平地下党的刊物《人民之友》上。1937年8月20日，巴黎《救国时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谈话稿。我们根据访问王福时的录音和《救国时报》，撰写了该条年谱稿的初稿。

《年谱》副主编在审阅这一条目时曾产生疑问，因为《救国时报》上发表这篇谈话的题目为：《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毛泽东氏与北方青年的谈话》。那么，这篇谈话是对韦尔斯谈的，还是同来参加苏区党代会的北平地下党代表黄敬、李昌、杨学诚、林一山等人谈的呢？其时，《毛泽东文集》编辑组正准备把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抱着同样的疑问，《文集》编辑组的同志先后访问了健在的当事人林一山、李昌同志，并通过电话询问了当年在延安为韦尔斯和毛泽东谈话做翻译的黄华同志（王汝梅）。同时，他们还查阅了《“一二九”回忆录》、《新中华报》、《解放》月刊等报刊，排除了这篇谈话是毛泽东同北平学生谈话的可能性。《年谱》编辑组重新逐句整理了1988年9月7日访问王福时同志的录音带，并查阅了尼姆·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我在中国的岁月》、《红色中

国内幕》和《新西行漫记》等著作。最后确定，这篇谈话，是毛泽东接受尼姆·韦尔斯采访时谈的。于是，我们在《年谱》1937年5月15日条中写下：

“在延安与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回答她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阶级斗争、争取民主、准备抗战等问题”字样，并加了一条注释：“这个谈话，原载北平出版的《人民之友》，题为《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后转载于1937年8月20日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

#### 四、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托马斯·阿瑟·毕森、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欧文·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菲利普·贾菲等

关于这次会见，开始我们只是在几种涉及中美关系的书中看到间接的转述。进而从北京图书馆收藏的1937年10月《美亚》杂志上发现毕森《毛泽东就南京政府的剖析》一篇英文报道。非常感谢东北工学院出版社，他们出版的《抗日战争前夜的延安之行》（毕森著、张星星和薛鲁夏译），使我们得以了解了这次重要会见的全貌。毕森、拉铁摩尔和贾菲等一行5人是1937年6月21日抵达延安的，虽然他们只在延安逗留4天，毛泽东却两次会见他们。毕森在他的著作中以日记的形式完整地记录下6月22日和23日他们对毛泽东的采访。毛泽东在谈话中详细阐述和回顾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过程、领导权问题，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在谈话中，毛泽东即能谈论具有广泛意义的哲学概念——这是共产党制定的政策的基础，又能详细介绍实际执行中最具体的细节。没有草率应付，没有迟疑犹豫，也没有丝毫的混淆不清。他热情奔放，慷慨激昂，但又老成持重，让人看不出任何思想上的偏见”（拉铁摩尔）。这使客人们为之折服。

毕森、拉铁摩尔和贾菲等一行，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夜会见的最后一批外国客人。和前几批客人不同，毕森等不是单纯地作为新闻记者来进行新闻采访，他们同时还是第一次访问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国远东问题学者。因而他们的兴趣也并不只限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个人品德、性格、爱好和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他们更关心的是中共领袖对当时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看法和对这些问题的方针、政策。正如毕森所说：“延安的经历为我们在以后抗日战争和内战（指解放战争——引者）的岁月里正确地估计形势、作出判断，提供了一个基准线”。毕森等在离开延安以后，发表过大量的文章，对当时及以后一个时期的国共关系做出过许多客观的分析和判断。特别是欧文·拉铁摩尔，他在1941年6月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荐担任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1942年底，他又担任美国战争情报局的顾问；1944年，他再次由罗斯福总统推荐，担任华莱士副总统来华访问期间的顾问。可以说，毕森等人关于国共关系的评论直接影响到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年谱》中以比较大的篇幅记述了毛泽东同毕森等人的这次重要会见。

毛泽东在抗战前夜的这几次外事活动，无论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指导中国的抗日战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首先是，向世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而彻底打破了国民党蒋介石对苏区和中共的新闻封锁。如果说此前外界对中共还不大了解，甚至有许多偏见和误解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在许多国际友好人士心目中，中共已经成为完全可以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大党。

不仅如此，这几次重要的会见成为毛泽东外交生涯的开端。以此为契机，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又有几十批次的官方或非官方的国际友人来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毛泽东通过他们向世界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揭露国共摩擦的真相，介绍共产党的抗日武装所取得的辉煌战绩。这成为中共和毛泽东争取国际声援、动员全民族持久抗战的一条重要渠道。

第二，对促成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是当时摆在毛泽东议事日程上的首要任务。事实证明，抗战前夜毛泽东的这几次重要外事活动是取得了积极效果的。并且，毛泽东在努力促成国内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还比较早地注意到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问题。毛泽东在1936年7月15日同斯诺的第一次谈话时就明确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而且也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特别是英美法苏等在太平洋上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的敌人。”毛泽东认为：“除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一切援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以外，其他一切国家（反战的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社会主义的苏联），可以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争以及反法西斯的世界同盟。”<sup>(2)</sup>

第三，毛泽东在这几次会见中提出许多对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中国人民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战略指导意义的思想。例如他同斯诺谈争取抗战胜利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再如，他在回答毕森关于统一战线形成后，会不会由于南京政府威望的提高，而将共产党人淹没掉的问题时说：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并不完全取决于哪一个政党指挥的军队更多。反映领导

权本质的东西，是看你所宣传的纲领和为实现这一纲领所作出的努力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就英明地预见到行将爆发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光辉思想。尽管当时抗日战争还没有全面爆发，一切预示抗战前途的征兆还不明显，但是毛泽东严谨的推理和缜密的分析，却使斯诺感到他的结论不容置疑。毛泽东在后来发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1938年5月）也不无自豪地写道：“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还在两年之前我们就一般地指出了。还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即在西安事变前五个月，卢沟桥事变前12个月，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毛泽东“持久战”的思想，为历史发展的进程所证明，是指导中国军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基本战略思想。

## 注：

（1）另两次是接待《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维克多·基恩和合众国际社的厄尔·H·利夫。

（2）《毛施会见记》，参见《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上海丁丑编译社1937年4月版。

## 10. 毛泽东、共产国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泽东曾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高度概括为：“两头好，中间差”。所谓“两头”，一般是指1921到1927年和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到1943年。在这期间，共产国际曾经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为推动大革命的蓬勃发展、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给中共以积极的引导和帮助，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间一段，由于共产国际远离中国的盲目指挥，粗暴地干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曾给中国的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这是从总的方面看，大致如此。但如果具体地分析，在“好”的时期，双方也有不融洽甚至是对立的情况；在“差”的阶段，双方的分歧也不是绝对的，而是在总目标基本一致的前提下的分歧。毛泽东是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史上的焦点人物，本文试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过程这一个侧面，记述和分析一下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

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内对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孰重孰轻的认识是不清楚的。当时占据中央领导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根据苏联提出的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的对立是“国

际关系的核心”的论断，积极响应苏联所谓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是进攻苏联的序幕的观点，提出要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他们认为，只有首先推翻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能直接地毫无阻碍地与日本帝国主义主义作战。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关门主义，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坐失九一八后国内抗日民主运动高涨的良机，使自己陷入孤立，并在强敌的围攻下遭受严重损失。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最重要的内容是季米特洛夫所做《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大会根据这个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战胜法西斯，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为实现统一战线，共产党必须消灭自己队伍中自满自足的关门主义。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根据这一新方针，经集体讨论、由王明执笔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经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审阅通过后，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正式发表。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言指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军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呼吁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并提出抗日救国的十大方针。《八一宣言》于同年10月1日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办的《救国报》第10期上发表。先是在海外华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随后在国内的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知识分子中秘密传播，有

力地促进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爆发。与此同时，1935年11月中旬（一说是下旬），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回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的林育英（张浩），化装成小商贩经蒙古抵达瓦窑堡同张闻天等见面。12月13日，指挥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回到瓦窑堡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听取了张浩关于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精神的传达。以此为契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7日召开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正式确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任务。从这个过程看，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对中国共产党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八一宣言》虽然表明开始由关门主义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转变，但仍存在有两点明显的缺陷：一是宣言只是一般地说明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要求，而对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华北事变后，中国各阶级、各党派对抗日的态度缺少具体深入的分析，因而它提不出促进一切抗日阶级和党派团结合作的具体政策，流于一般性的号召；二是《八一宣言》在肯定国内某些阶级、阶层、党派、军队和政治力量具有抗日要求时，没有区别或者是无视他们同时还存在有程度不同的动摇性和反动性，使得宣言的某些口号和主张与国内的实际状况有一定程度的脱节，因而无法摆正并真正解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问题。

自遵义会议起逐渐确定了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毛泽东，也日夜思索着抗日救亡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早在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际，毛泽东针对张国焘关于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明确提出红军主力北上川陕甘、迎接革命新高潮的思想。毛泽东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方针，一个重要考虑是基于华北事变以来，由于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

深入所造成的空前民族危机。他在6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提出，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这最能动员群众。<sup>①</sup>稍后，他在同徐向前等的谈话中进一步明确，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就是为了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陕甘支队长征抵达陕北苏区时，他和他的战友们一方面不得不同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及其所发动的全面“围剿”进行殊死的阶级搏斗；另一方面还要为抵抗日寇侵略做全民动员和准备，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责任。如果不战胜国民党军的“围剿”，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生存还都是疑问，何谈抗日？但如果不正视中日间的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这一严重现实，就会失去民众的支持，不仅难以战胜以“政府”名义来“进剿”的国民党军，而且，即使是能够克服眼前的生存危机，也必然会失去领导神圣的民族抗战的资格。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既不是照搬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也不是泛泛地发号召，而是综合考察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归纳分析各阶级在外敌入侵时的态度和利害关系，因而他提出的主张显得更切实可行。12月1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sup>②</sup>这就初步明确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的关系，把民族大团结战争摆在了第一位。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首先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和蕴藏在中国各阶层人民中的巨大潜力与积极性，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迫切性。接着，报告分析了国民党阵营的分化，即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时刻的动摇和转变，阐明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

向党和全国人民切实地提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任务。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把持着中央政权，掌握最大多数的军队，对外代表着国家，因此，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是实现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和关键，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标志。对这个问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认识得比较早。1935年8月25日，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不久，中共代表团就开会讨论在中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王明在报告中认为，在中国的情况下，革命力量应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的斗争，但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只要蒋介石“真正停止反对红军的战争并掉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也不排除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sup>③</sup>王明的这种认识传回国内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肯定是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相对而言，一直在国内率领红军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的毛泽东，对此问题的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反共、“剿”共的立场，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是抗日反蒋并提。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虽然在行动上仍坚持抗日反蒋并重的方针，可他在理论分析中却得出：在半殖民地条件下，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触犯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时，中国地主买办阶级中的英美派“是有可能遵照其主子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接着，毛泽东在阐述“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时进一步指出：“这个政府的成分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

意，也可以参加。因此，这个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毛泽东告诫全党切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毛泽东依据中国的阶级关系在新形势下所发生变化的实际作出的理论分析，显然较单纯地贯彻或发挥上峰的指示，更切合实际。

1936年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发言，批评中国共产党过去在对待南京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政治方针是错误的。根据他的发言，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强调决不能同时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整个蒋介石的军队都是日本的同盟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据此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先后发出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这表明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中共进一步修正政策，促进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共产国际的指示之所以能够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所接受，并产生积极的效果，或者说能够引起共鸣，这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经独立自主地在国内探索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分不开。

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发表后，国共两党中央先后通过四条渠道探讨合作抗日的可能性。<sup>④</sup>除蒋介石派驻苏联使馆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外，其余三条渠道都在国内。1936年2月27日，受宋庆龄、宋子文委托前往陕北的董健吾，和受上海地下党委派来汇报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等谈判情况的张子华，一同抵达瓦窑堡，带来了蒋介石亦有和红军妥协共同抗日倾向的信息。这印证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

判断。他事后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2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sup>(5)</sup>3月4日，毛泽东更明确地转告董健吾：“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和明智的表现，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等五项具体意见。<sup>(6)</sup>4月9日，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又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张闻天，重申“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讨日令。”5月5日，毛泽东在著名的回师通电中正式放弃“反蒋”口号，提出“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此后，在接到共产国际最新指示以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提得更明确、更具体了。他“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和主要的对手”，<sup>(7)</sup>“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sup>(8)</sup>8月25日，他亲自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建议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

毛泽东不仅在共产国际关于改变“抗日反蒋”并提的指示下达之前，已经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对争取蒋介石集团合作抗日有认识和准备，而且在实践上也已经采取了一整套的措施和行动。他一方面在全党和全军中广泛地开展了统一战线思想的教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肃清了“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号召全党都去做统一战线工作；另一方面他也不是一味地、无条件地求和，他指挥红军坚决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打破了蒋介石消灭红军和用军事力量压迫中共同意其收编红军的幻想。与此同时，毛泽东既领导全党为广泛建立下层统一战线而积极努力，又以很大的精力亲自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他多次致信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宋庆龄、蔡元培等爱国领袖和国民党左派，表达对他们爱国行动的敬佩和

赞赏；他广泛联系地方实力派，如西北军的杨虎城，东北军的张学良，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西康的刘文辉，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华北的宋哲元，云南的龙云，以及失势的地方实力派首领冯玉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争取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给蒋介石以外部的压力。他还直接致信、电给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和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邵力子、宋子文、孙科、于右任、陈立夫、覃振和胡宗南、王均、汤恩伯、陈诚、贺耀祖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并通过他们影响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理论上的明确认识和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准备，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置十年血海深仇于不顾，毅然作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决策；冯玉祥、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和李宗仁、刘湘、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就不会声援西安事变；在南京的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和蒋介石的亲信大员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也不可能抵制亲日派讨伐西安的叫嚣；张学良和杨虎城也不会有西安兵谏的壮举；更不可能有以西安事变为转折点的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出现。

## 二

研究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自然离不开苏联。当时苏联是从其本身的利益出发考虑中日战争问题的。一方面，随着欧洲的局势的日趋紧张，希特勒从其反共本性出发，同时也为了同英、法等国讨价还价，不时表现出或者说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要发动对苏战争的姿态与行动；英国等西欧国家也希望能祸水东引，试图通过某些让步以换取德国向东发动对苏战争，防止其向西行动危害其自身利益。而日本在中国的侵略和扩张，也严重威

胁着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因为，苏联是列强中唯一与中国（日本因侵占朝鲜和中国东北）领土相邻的国家。中日战争的发展对于它的国家安全有着直接的影响。假如中国被征服，日本拥有中国的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将对他构成极大的威胁。因此，面临着东西线双向作战威胁的苏联，希望借重中国以牵制日本。所以，援助中国对日抗战便成为苏联远东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另一方面，苏联虽然与中国共产党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但他认为中共的微弱力量对于抗击日本强大侵略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把牵制日本的希望主要寄托于南京国民政府。这种认识和要求与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的政策是一致的。这与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愿望，尽管在出发点上不同，但恰好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

这种出发点的不同与总目标的一致的矛盾状况，在如何处理西安事变的细微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两次致电共产国际，介绍事变的情况和中共拟采取的措施。毛泽东在翌日凌晨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它们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它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蒋介石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围绕这一环，我们要想人民揭露蒋介石的罪恶，稳定黄埔系、CC派，推动元老派、欧美派以及其他杂派赞助西安事变。对英美应很好联络，使它们对西安事变在舆论上表示赞助。最后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前做结论时，又强调：现在处在一个

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sup>⑨</sup>会后，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除通报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拟采取的措施以外，还要求共产国际：（一）在世界舆论上赞助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抗日义举；（二）争取英、美、法三国赞助中国革命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苏联大力援助中国。

苏联虽然也是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但对西安事变性质的认识，却与毛泽东大相径庭。从12月14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和共产国际的《国际新闻通讯》等发表了大量的报道、评论，把西安事变说成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把张学良和杨虎城说成是“叛徒”、“强盗”。12月16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给苏联驻华代表打电报，要他转送如下声明给南京政府：“（一）苏联政府得悉发生西安事变后立即表示明确而肯定的立场，谴责张学良这一客观上只能有利于企图分裂和奴役中国人民的一切敌人的行为。（二）苏联政府……不仅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与自日军占领满洲之时起，从未与张学良保持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三）鉴于各种虚假和诽谤性报道仍不断出现，苏联政府……不能对中国红军的行动负任何责任。”<sup>⑩</sup>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针对中共中央对事变性质的分析指出：“张学良的行动，不管出自何种动机，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来电建议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在电文的最后强调：“我们建议不要提出与苏联联盟的口号。”可惜，这封电报因电码差错难以译出，中共中央只好于12月18日要求共产国际重发这封电报。直到20日，中共中央才终于再次收到并译出了这封来电。

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对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评价上与中国共产党有很大区别，但在和平解决西安变变的方针上与中共的主张基本相同。尽管他们是出自苏联利益的考虑，但是这坚定了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变变的决心，使中共中央的思想更加趋于统一，促使中共加快了和平解决变变的步伐。从这个角度讲，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事实上，在此之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妥善解决西安事变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

12月1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号召西安和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起义才能确定地发展其胜利”；

12月14日，毛泽东同朱德等红军将领联名致电张学良和杨虎城，建议由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

12月15日，毛泽东同朱德等红军将领致电南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诸位先生，呼吁他们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

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提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自速覆亡”，“敢乞周旋宁、陕之间，先停军事行动，再议时局善后”；

12月18日，在接周恩来关于西安情况和国内各派对西安事变态度情况的电报后，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呼吁国民党立即开放政治实行抗日救国；

12月1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结论时强调，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只有内战结束才能抗日。有六种力量可能使内战结束：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应把六种反内战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

争为抗日战争；

同日，毛泽东致电在外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

毛泽东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竭尽全力去争取西安事变能有一个最好的结果。比如12月19日这一天，他除了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处理日常工作外，共起草并发出的电报达十余份，其中给周恩来的就十一封。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由“审蒋”、“罢蒋”到确定和平解决，这一决策变化过程是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根据错综复杂的形势，审时度势独立自主作出的。12月21日，中共中央回复共产国际来电：“来电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上采取了这种方针。”

毛泽东虽然十分尊重共产国际的领导，但他在处理问题时从来都是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允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毛泽东语）。但由于蒋介石由其反共立场所然，长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如果不对他进行必要的斗争，联蒋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话，难以实现。12月26日，刚刚离开西安抵达洛阳的蒋介石果不其然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只字不提他在西安“以人格保证”作出的允诺。12月28日，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指出：“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做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

义和中国讨伐派。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坚决揭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汪精卫、何应钦等的阴谋，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这就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因为现在的内战是人民所痛恶的。”<sup>40</sup>他警告说，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毛泽东认为，中共在西安事变之前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和平；事变和平解决之后的任务是巩固和平，而要巩固和平，就必须发展民主。为此，他和中共中央做了一系列的努力。可见，他在争取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对蒋介石不是一味的让步，而是以“逼蒋”促“联蒋”。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十分担心来之不易的中国国内和平的局面，会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极力挑动内战的走狗在搞阴谋”以及中国共产党采取“错误的步骤”而不能持久。为此，共产国际于1937年1月19日和20日两次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不要就蒋介石在西安的许诺大发议论，不要提出立即对日宣战要求，不宜强调同苏联结盟口号。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中国共产党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变自己的方针：（一）将苏维埃政府改为人民革命政府；（二）将红军改为人民革命军；（三）仅在城市中心区保留苏维埃，并且不作为政权机构，而作为群众组织；（四）放弃普遍没收土地做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指示，虽然不尽赞同，但基本上是接受的。这见诸此后中共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等文件和行动中。

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等一系列事件中的态度和行动，并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和中共的意愿。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有些令人失望。在长

征后期毛泽东和中共有“打通国际线”的计划，希望能和苏联连接在一起，依托苏联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这个计划后来未能如愿，除去国民党强敌的封锁等原因外，得不到苏联的实际援助不能不是原因之一。西安事变前，中共同东北军、西北军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有可能得到苏联的支持是毛泽东在谈判中的重要砝码。但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与中共的期望是根本相反的。进而，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毛泽东和中共除了在政策上得到若干指导性意见外，在事实上也很难得到苏联方面实际的甚至是口头的声援或帮助。但是，一个强大的邻国——苏联的存在，特别是这个邻国与中共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由她实际主持的共产国际又和中国共产党有着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再加上苏联在世界人民面前一贯保持有爱好和平和进步的姿态，这对于在艰难困苦中不懈奋斗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来说，那里是希望和重要的精神支柱。因此，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始终把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看做是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第一位的外部条件。他在1937年7月23日，即中国的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次正式阐述中共的外交方针时，非常鲜明地提出：“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

### 三

毛泽东认为，中国夺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断巩固和发展。我们在前面已经比较多地叙述了毛泽东在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上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贡献。那么，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成分非常复杂。它既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

绅和地方实力派以及海外华侨中的广大爱国人士，更有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的各阶级和各阶层，既有合作抗日的共性，又有各自的个性，甚至是存在着根本的对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代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两翼，他们在抗战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即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直至鸭绿江边，还是只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前的局面？在实行什么样的抗战路线，即是全面的抗战路线，还是片面的抗战路线？在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即是持久战，还是速决战？是游击战、运动战，还是正规战、阵地战？以及在抗战的外交、抗战时期的政治改革和战时的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上述问题上的分歧及其实行后的结果将直接关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巩固与发展，决定着抗日战争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毛泽东当时就深刻地指出：“中国能否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sup>(12)</sup>他对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企图，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方向与分化等问题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在刚刚开始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就旗帜鲜明地向全党提出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任务。他说：“是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1924～1927年的大革命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这种历史不应当重复了。”<sup>(13)</sup>

他这个时期有一个鲜明的观点，即阶级投降主义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

备军。毛泽东首先是对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的阶级投降主义的倾向，进行了斗争。他针对中国共产党内在统一战线形成后产生的松口气的思想，以及表现在对国民党与中共合作抗日进步一面估计过高，对它动摇妥协一面认识不足，在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工作中无原则地迁就国民党等现象，告诫全党：在我们和资产阶级分裂的时候，容易发生“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和资产阶级合作的时候，容易发生右倾错误。他提醒全党注意在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影响的同时，防止右倾投降主义的蔓延。1937年3月12日，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时指出：“谈判的方针，无疑是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的方向，而不是无产阶级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如果这样，我们便要失去信仰。”同年5月，他在苏区党的代表会议上，又针对党内同志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把持全国政权，共产党的力量不居支配地位而产生的对争夺领导权问题的疑惑，进一步阐述了实现无产阶级政治领导任务的四条具体的原则，即：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奋斗目标；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成为实现奋斗目标的模范；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与同盟者建立联盟；共产党队伍的发展、坚强和思想统一。这样，就使保持和争取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目标具体化和理论化。卢沟桥事变后，毛泽东根据各阶级对抗战的态度，把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阶级和各阶层分为左、中、右三个集团。其中，他认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右翼集团，“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他们一方面害怕战争对他们财产的迫害，另一方面害怕民众起来。他们中间有些人暂时地加入民族统一战线，是被迫的、勉强的。“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sup>①</sup>

毛泽东为防止阶级投降主义倾向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在抗战初期遇到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及其政策的忠实执行者王明的严重挑战。

七七事变发生后，苏联《真理报》等报刊立即发表文章，报道事变是由日本军队挑起的，中国军队是被迫进行自卫。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也在8月1日的《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法西斯主义——就是侵略》，他强调，要保持国际和平，就首先要使法西斯强盗在西班牙和中国遭受失败。这和英美等国报刊在事变后的所谓“中立”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国内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问题。季米特洛夫在会上发言，他除了号召发动国际无产阶级采取各种措施援助中国人民之外，同时认为：中国共产党过去领导红军为建立苏维埃而斗争，现在同是这些人，却要实行另一种新的政策。如果我们详细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可以指出其中有使党迷失方向的因素，这些内容是必须纠正的。可是，从我们这里纠正错误的可能性是有限度的，必须有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去帮助中共中央。会后，王明根据会议精神写了《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一文，他说：“中国共产党现时大多数干部，是在国内战争中教育和锻炼出来的，其中许多人社会出身是农民……很多干部完全缺乏在没有苏维埃和红军的区域内进行群众工作的经验，甚至有些人连大城市中工人运动的一般概念也没有。因此，重新教育老干部，使他们能适应新的环境采用新的工作方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sup>⑤</sup>10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过了《关于援助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决议》，其中指出：“必须使保卫中国运动具有广泛性，无论如何这种运动不应带有狭隘的共产主义性质，不应主要靠共产党自己的力量来进行。必须利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后备力量，利用日寇在欧美国

家各居民阶层中特别不得人心这一情况来保卫中国。……在反日斗争中，必须利用那些从经济角度关心维持中国的秩序、安宁和正常经济生活条件的组织和个人。”<sup>(6)</sup>在这种情况下，1937年11月14日，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启程回国，于11月29日飞抵延安。回国前，王明等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并同季米特洛夫讨论过中国的局势和中共的政策问题。

王明的到来，受到毛泽东等的真诚欢迎。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9日至14日召开会议，讨论和总结党的工作。王明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出席，并做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发言。他自称代表国际路线，是传达斯大林对于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和新见解。他的发言认为：第一，中国抗日战争具有国际意义。中国如果能够给日本以有力抵抗，使日本无力进攻苏联，解除日本在东方对苏联的威胁，这将对世界革命大为有利。第二，中国共产党应该主动同国民党密切合作，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国防军，这是保障抗战胜利的最重要条件。第三，国共合作应是永久的，真诚的，彼此之间应是互谅、互让、互助，我们不应该谈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而应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第四，军队要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此外，王明还明确表示，在国共统一战线问题上他完全同意季米特洛夫所建议的在中国提出这样的口号：“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后，王明率中共代表团到武汉同国民党谈判，他依据他个人的理解公开发表一些过头的言论和文章。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王明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的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会后，他又发表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观点。王明无条

件地执行共产国际为缓解苏联因受东西方法西斯两面进攻的压力而制定的政策。为密切同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他否认统一战线中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抹杀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原则区别，反对毛泽东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有左、中、右三种不同政治集团的划分，认为只有抗日与降日的区分。因此，他不讲斗争，只讲联合。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反对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他把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完全对立起来，认为搞阶级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在军事上，由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认为只有打阵地战才能拖住日本人，所以王明也强调统一听命于国民党轻视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重视国民党的正规战，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的正规战。

王明的言行与毛泽东和中共的既定方针、政策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并很快在华中和华东地区的斗争实践中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和混乱。因此，三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立即起程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的情况和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加强相互了解。<sup>⑧</sup>4月14日，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递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他又专门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就书面报告做了说明和补充。这样，使共产国际方面对中国抗战以来的实际情况和中共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有了较全面的客观了解，从而部分地纠正了他们的一些错误认识 and 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政策。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经过讨论，做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和不能有限制参加统一战线各党派在政治上及组织上独立性之目的”，“共

产党的巩固，它的独立性及它的统一，正是继续向前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和继续同日寇作胜利的斗争的基本保证”。<sup>⑧</sup>7月，季米特洛夫约见任弼时和在苏联治病即将回国的王稼祥。他郑重地说：应该告诉全党，要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共产国际还拨出30万美元托付王稼祥带给中共中央。<sup>⑨</sup>9月14日，从苏联回到延安的王稼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季米特洛夫的重要谈话。这样，共产国际态度的转变，就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彻底纠正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在会上做了《国际指示报告》，毛泽东则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毛泽东着重从理论上阐明了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以及如何正确处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关系。他指出，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是一致的，不应当把它们对立起来。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但是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否认它的存在是错误的。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一致性表现在：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另一方面，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抗日的出发点。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关系，也是同样道理。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各党派的相对独立性，才有利于合作，才有所谓合作，否则，统一变为“混一”，统一战线就不存在了。在毛泽东的积极斗争和耐心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被很快克服了。全党上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保证无产阶级政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正确领导做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领导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实践中，同蒋介石集团操纵和控制统一战线的企图及其民族投降主义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努力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贯彻到抗日战争进程的每一个阶段和主要方面。

历史证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是坚持和捍卫无产阶级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如果不是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而是像共产国际和王明一度所主张的那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让蒋介石国民党去统一指挥，将仅存的三万多红军集中使用、打正规战，而不是分散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那么，就不会有人民军队的壮大和敌后根据地的开辟，全国的抗战就会因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而陷于失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会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动摇和日寇的诱降而瓦解，等待中国人民的将是“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

## 注：

(1) (2)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61、497 页。

(3)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325 页。

(4) 参见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16～223 页。

(5) 1936 年 9 月 8 日，毛泽东等致朱德等电。

(6) 1936 年 3 月 4 日，毛泽东致秦邦宪转董健吾电。

(7) 1936 年 8 月 12 日，毛泽东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

(8) 1936 年 8 月 25 日，毛泽东致潘汉年电。

(9)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 621 页。

- (10) 《苏联及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参见《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6期。
- (11)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47页。
- (12) (13)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64、362页。
- (14)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96页。
- (15) 巴黎《救国时报》第123、124期。
- (16) 马贵凡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援助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决议》。参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 (17) 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28页。
- (18) 《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 (19) 徐则浩，《王稼祥对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参见《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4期。

# 11. 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独特贡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和根本保证。这是一切爱国的中国人在日寇对华侵略的步步紧逼下，逐渐达成的共识。但是，如何创建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并使之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壮大，则是一个极其艰难复杂的过程。对此，毛泽东有独特的贡献。

—

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内对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孰重孰轻的认识是不清楚的。一度占据中央领导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还照搬苏联提出的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的对立是“国际关系的核心”的论断，认为日本侵略我东三省是进攻苏联的序幕，提出要武装保卫苏联，要首先推翻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能直接地毫无阻碍地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关门主义，使党和红军坐失九一八后国内抗日民主运动高涨的良机，使自己陷入孤立，并遭受严重损失。

共产国际“七大”，以及在其精神指导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开始转变方针，对中国共产党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八一宣言》缺乏对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因而使得一些很好的主张只能流于一般性的号召。

自遵义会议起逐渐确定了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毛泽东，也日夜思索着抗日救亡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他对这个问题思索不是一般地去发号召，而是综合考察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归纳分析各阶级在外敌入侵时的态度和利害关系，因而他提出的主张显得更切实可行。1935年12月17日，长征刚结束不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作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他提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这就初步明确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的关系，把民族战争摆在了第一位。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首先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和蕴藏在中国各阶层人民中的巨大潜力与积极性，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接着，报告分析了国民党阵营的分化，即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时刻的动摇和转变，阐明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切实地提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任务。

更为难能的是，毛泽东一开始就注意到在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一个必须正视的核心问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问题。毛泽东始终不认为地主买办营垒是铁板一块。他首先从理论推理中得出：在半殖民地条件下，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触犯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利益时，中国地

主买办阶级中的亲英美派“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接着，毛泽东在阐述“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时进一步指出：“这个政府的范围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因此，这个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毛泽东告诫全党切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

当时，毛泽东虽然还没有提出要改变对地主阶级的政策，也没有放弃反蒋的口号，但是他明确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分清了敌、我、友，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实际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

循着这样一条路线，毛泽东在领导全党广泛建立下层统一战线的同时。还以很大的精力亲自开展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多次致信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宋庆龄、蔡元培等爱国领袖和国民党左派，表达对他们爱国行动的敬佩和赞赏；他广泛联系地方实力派，如西北军的杨虎城，东北军的张学良，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西康的刘文辉，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华北的宋哲元，云南的龙云，以及失势的各政治势力代表冯玉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给蒋介石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外部压力。他还直接致信电给国民党政府的军政要员和蒋介石嫡系将领邵力子、宋子文、孙科、于右任、陈立夫、覃振和胡宗南、王均、汤恩值、陈诚、

贺耀祖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并通过他们影响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

对蒋介石的认识，毛泽东有一个变化过程。由于蒋介石坚持反共、“剿”共的立场，在瓦窑堡会议前后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是抗日反蒋并提。1936年2月，毛泽东开始改变这一看法。2月27日，受宋庆龄、宋子文委托前往陕北的董健吾，和受上海地下党委派来汇报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等谈判情况的张子华，抵达瓦窑堡，带来了蒋介石亦有和红军妥协共同反日倾向的信息。这印证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他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2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sup>①</sup>3月4日，毛泽东更明确地转告董健吾：“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和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等五项具体意见<sup>②</sup>。4月9日，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又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张闻天，重申“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讨日令”。5月5日，毛泽东在著名的回师通电中正式放弃“反蒋”口号，提出“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此后，毛泽东“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sup>③</sup>，“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sup>④</sup>。8月25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明确建议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

为实现与南京蒋介石政权的合作，在利用一切渠道表达中共合作抗日诚意的同时，毛泽东一方面指挥红军坚决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打破了蒋介石消灭红军和用军事力量压迫中共同意其收编红军的幻想；另一

方面，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中广泛地开展了统一战线思想的教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肃清了“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号召全党各级干部都去做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同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是实现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和关键，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标志。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阐明同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且在实践上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和气魄，领导全党通过艰苦不懈的努力，使势不两立的两大力量在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下统一起来，从而促成了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开明士绅、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中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结成的最广泛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使中华民族第一次空前地团结一致共御外侮，这是毛泽东的一大历史贡献。

## 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容空前广泛和强大。但其成分也十分复杂。和西班牙、法国的“人民阵线”不同，它是名副其实的“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和地方实力派以及海外华侨中的爱国人士，更有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的阶级和阶层，既有合作抗日的共性，又有各自的个性，甚至是存在着根本的对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代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两翼，他们对抗战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即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直至鸭绿江边，还是只恢复

到卢沟桥事变前的局面？在实行什么样的抗战路线，即是全面的抗战路线，还是片面的抗战路线？以及在抗战的外交、抗战时期的政治改革和战时的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上述问题上的分歧及其实行后的结果将直接关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巩固与发展，决定着抗日战争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毛泽东当时就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能否从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sup>⑤</sup>他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旗帜鲜明地向全党提出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任务。他说：“是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这种历史不应当重复了。”<sup>⑥</sup>

和大革命时期相比，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大大加重了。这是因为此时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主要的已不再是昔日一道联手反帝反封建、后背叛了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而是把持了全国的政权和军权，在形式上已经占据于领导地位的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后者无论在政治经验上，还是实力上，都大大地强于前者。特别是抗战之初，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表现出相当的抗战积极性，以及对其他抗战力量的相对宽容，这在很大程度上掩藏了他们动摇、妥协和反人民的本质，蒙蔽了不少人的视听。就中国共产党来说，她较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更加成熟、坚强，并且有了一支经过十年国内战争磨炼的人民武装。但是，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一些党员产生了松口气的思想，右的情绪开始滋长起来，表现在对国民党与我们合作抗日进步的一面估计过高，对

它动摇妥协的一面认识不足，在思想上、行动上放松了警惕，在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中无原则地迁就国民党。特别是从苏联和共产国际回来的王明，他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为缓解苏联因受东西方法西斯两面进攻的压力而制定的政策。为密切同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王明否认统一战线中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抹煞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原则区别，反对毛泽东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有左、中、右三种不同政治集团的提法，认为只有抗日与降日的区分。因此，他不讲斗争，只讲联合，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反对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完全对立起来，认为搞阶级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在军事上，他强调统一听命于国民党，轻视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重视国民党的正规战争，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的正规战。

毛泽东在领导建立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党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领导权的重要性。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指出：共产党和红军不但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要担负起“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1937年3月12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方针时又指出：谈判的方针，无疑是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的方向，而不是无产阶级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如果这样，我们便要失去信仰。毛泽东告诫全党，在我们党和资产阶级分裂的时候，容易发生“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在和资产阶级合作的时候，容易发生右倾错误。他提醒全党注意，在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影响的同时，防止右倾投降主义的蔓延。1937年5月，在苏区党的代表会议上，毛泽东针对

党内同志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把持全国政权，共产党力量不居支配地位而产生的对争夺领导权问题的疑惑，提出了实现无产阶级政治领导的任务，以及四条具体的原则。即：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奋斗目标；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成为实现奋斗目标的模范；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与同盟者建立联盟；共产党队伍的发展、坚强和思想的统一。这样，就使保持和争取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目标具体化和理论化。卢沟桥事变后，毛泽东根据各阶级对抗战的态度，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为左、中、右三个集团。其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右翼集团，“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他们一方面害怕战争对他们财产的破坏，另一方面，害怕民众起来，他们中间有些人之所以暂时地加入民族统一战线，是被迫的、勉强的。“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sup>⑦</sup>从1937年12月的会议到1938年9月至11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着重从理论上阐明了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以及如何正确处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关系。他指出，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是一致的，不应当把它们对立起来。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但是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否认它的存在是错误的；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一致性表现在：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另二方面，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抗日出发点。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关系，也是同样道理。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各党派的相对独立性，才有利于合作，才有所谓合作，否则，统一变成“混一”，统一战线也就不存在了。在毛泽东的积极斗争

和耐心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很快被克服了。全党上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保证无产阶级政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领导做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领导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实践中，同蒋介石集团操纵和控制统一战线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努力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贯彻到抗日战争进程的每一阶段和主要方面。

历史证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是坚持和捍卫无产阶级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如果不是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而是像王明那样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让蒋介石国民党去“统一指挥”，将三万红军集中使用、打正规战，而不是分散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那么，就不会有人民军队的壮大和敌后根据地的开辟，全国的抗战就会因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而陷于失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会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动摇和日寇的诱降而瓦解，等待中国人民的将是“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正确把握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挫败了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企图，从根本上捍卫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全民族抗战得以坚持和发展。这是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又一重要历史贡献。

### 三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以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操纵的国民党政权的参加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的主要危险，主要的也是来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叛卖。毛泽东对大地主、大资

产阶级对内反共、反人民，对外妥协、动摇的本质有透彻的认识。但同时，他更深晓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彻底驱除日本侵略军的重要意义，他始终为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而竭尽全力。

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由于这次国共合作是对立阶级的合作，所以国共之间的斗争是严重的、是不可避免的，但也不能因斗争而放弃统一。他说：“统一战线中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sup>⑧</sup>“统一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基本的原则。”<sup>⑨</sup>“一定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凡是可以多留一天的，我们就留他一天，能够争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饭再去也是好的。”<sup>⑩</sup>

在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之后，国民党军队开始向陕甘宁、晋西北、冀南等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共军队进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毛泽东领导全党坚决回击进犯之敌，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依然清醒地注意到中日间的民族矛盾仍是决定一切的主要矛盾这一基本现实，他不同意党内有些同志把国民党的这次反共战争比作马日事变和四一二政变的判断。因此，在给予来犯之敌沉重打击之后，毛泽东命令有关各部“适可而止”。1940年2月25日，毛泽东派肖劲光、王若飞带着他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去秋林，同指挥所部进攻新军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受挫的阎锡山谈判；主动作出一些让步，如送回被俘的阎军、划定防区等，希望阎锡山能一如既往、合作抗日。3月5日，毛泽东又致电蒋介石、程潜、胡宗南，重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为提高党内干部在反摩擦斗争中的政策策略水平，毛泽东还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的报告，并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论政策》，再次强调：“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sup>①</sup>

1941年初，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皖南事变，并把新四军视作“叛军”，下令取缔，将国共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内许多同志都认为，国共关系已经彻底破裂，要求全面发动军事攻势回击国民党。事实上，毛泽东在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前，已经从种种迹象判明国民党即将发动大规模的反共战争，且“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他当时提出“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和“政治与军事上同时进攻”两个反击方案，征询周恩来等同志的意见。<sup>②</sup>经过两天的深思熟虑，毛泽东比较明确地指示：“在此次反共高潮中，甚至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与蒋介石并不表示决裂。”“唯你们一切部署，应放在反共军必出动之判断上，放在最黑暗的局面，上，丝毫不能动摇，以免上蒋的当。”<sup>③</sup>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极其愤慨，他联电各地军政首长，要他们做好反击国民党军的准备，但他最终没有下全面发动军事攻势回击蒋介石的命令。毛泽东认为，在中日矛盾仍然存在的前提下，还应力争不使统一战线破裂的前途。1941年1月15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对于皖南事件，我们要实行全面的政治反攻。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不能实行这种政策。<sup>④</sup>毛泽东最后确定，以他在事变前提出的第一方案，即“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作为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的方针。在毛泽东的亲自带领下，中共中央及各分局利用各种方式揭露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卖国行为，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

在中国共产党强大政治攻势和海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下，蒋介石集团

成为众矢之的。再加上日军的进攻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严阵以待，他们未敢再发动进一步的反共战争。蒋介石被迫表示一切大小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次空前危机，得以缓解。

在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进行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还不得不以很大的精力和极大的耐心与克制，对统一战线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挑衅进行了坚决、适度的斗争，起到了保证中国抗战胜利前途的决定作用。这首先是保护了统一战线内的进步势力，使他们在顽固派的进攻下减免损失，并继续发展壮大，其次是促使中间阶级的觉醒和转化，加强了抗日进步力量，实际也就巩固了中共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更重要的是，有效地阻止了抗日阵营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倾向，挫败了日寇汉奸的诱降，捍卫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蒋介石集团始终留在抗日阵营之内。虽然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由国民党挑起的摩擦和反摩擦战争大小不断，但像十年内战时期那种大规模的内战终于得以避免，国共双方最主要的兵力始终是用于抵抗日本侵略的战场上。

这么讲，并不是要淡化国民党的摩擦战争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危害。相反，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又一历史贡献，恰恰就在于他通过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和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从而保证了国共两党绝大部分的军队在八年抗战中一直是投入在抗日的战场上。这在根本上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而奋斗。

## 四

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独特的贡献，就是他在创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个时期正确处理中共同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关系，从而使统一战线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发展，使中国人民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获得根本的保证。

在毛泽东最初倡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尽管他率领中央红军跨越万水千山刚刚突破蒋介石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立足未稳，尽管他不得不指挥疲惫的红军再同蜂拥而至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新的包围进行殊死的斗争，但是强烈的爱国心和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使毛泽东在领导自卫斗争的同时，发出为抗日救亡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时代最强音。毛泽东不仅最详尽地论述了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抗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且一开始就断言：即使是誓与人民为敌的大地方大资产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毛泽东在阐述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而改变的第一项决策——变工农苏维埃为人民共和国时，就极富远见地指出：“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sup>⑮</sup>毛泽东这种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共同对敌的思想，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如何最大限度地、最迅捷有效地把中国有限的兵力拧在一起投入抗日战场，是毛泽东日思夜虑的问题。毛泽东从1936年2月开始改变“抗日反蒋并重”的做法，以后又明确“蒋介石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

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sup>(6)</sup>，“是当前唯一正确方针”<sup>(7)</sup>。从此，毛泽东一直围绕着促成同国民党蒋介石联合战线这一中心环节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最终经过坚韧、灵活的斗争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并不是由毛泽东首倡。“联蒋抗日”的口号，也不是由毛泽东最早提出。早在1935年底，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就向国内发出“联蒋抗日”的指令。但是，王明提出“联蒋抗日”，并不是基于国内实际斗争的需要，而是秉承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当时，苏联面临着同时要与法西斯德国和法西斯日本在东西方两条战线作战的威胁。斯大林希望中国在东方拖住日本：他不相信只剩下二、三万红军的中国共产党有此能力，就把希望寄托于国民党政府。而现实是蒋介石正做着彻底“剿灭”或“收编”共产党武装的美梦，根本不容许你搞“联合”，除非你缴械投降。王明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尽管口号喊得震天响，其结果是形成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和王明不同，毛泽东提出建立包括蒋介石在内的统一战线主张，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社会纷纭复杂的各种矛盾进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毛泽东逐次分析了中国各阶级在国难当头时的态度，才论述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又从中日双方力量悬殊的对比中，阐述了联蒋抗日的必要性。对于蒋介石为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毛泽东有深刻的认识。因而在同他们联合抗日的全过程中，毛泽东始终不懈地提醒全党要保持我们的独立性，并领导全党同他们夺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种种企图，进行了坚决有效地斗争，从而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能够沿着健康胜利的轨道前进。

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毛泽东率领全党同国民党顽固派的一次次挑衅进行了持久的斗争，创造性地提出一整套的策略理论。毛泽东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极大损失的教训，在抗战发动之初就提出了对统一战线中的大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毛泽东认为：“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毛泽东全面总结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策略经验，制定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斗争原则。这些策略原则和方针，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如何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使之走向胜利的重大课题，是他坚持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是对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的重大发展，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运用这些原则和方针，既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和进攻，又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统一，使进步力量不断壮大，中间力量日益觉醒，顽固势力更加孤立。

## 注：

- (1) 1936年9月8日，致朱德等电。
- (2) 1936年3月4日，致秦邦宪转董健吾电。
- (3) 1936年8月12日，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
- (4) 1936年8月25日，致潘汉年电。
- (5)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64页。

- (6)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262 页。
- (7)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396 页。
- (8) 1938 年 9 月 24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 (9) 1939 年 2 月 5 日在中央党校关于《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
- (10) 1939 年 7 月 9 日在陕北公学的讲话。
- (1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762 页。
- (12) 1940 年 11 月 1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等电。
- (13) 1940 年 11 月 3 日，毛泽东致刘少奇电。
- (14) 1941 年 1 月 15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 (15)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156 页。
- (16) 1936 年 9 月 22 日毛泽东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信。
- (17) 1936 年 9 月 28 日毛泽东等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

## 12. 毛泽东抗战时期外交活动研究

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外交活动是他这个时期政治、军事活动的一个重要侧面，深入研究他在这个阶段的外交实践和思想，对于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过程，对于搞清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对于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外交思想及其一些基本方针的历史渊源，大有益处。

—

毛泽东能够作为外交家出现于国际的政治舞台，缘于三个条件。一是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后，他在实际上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二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合法的政党，具有了公开活动的可能性；三是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后来陆续爆发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基于上述条件，毛泽东在促进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正式登上了世界外交舞台。学术界的一些同志，对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外交活动的作用，估计不足，认为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活动，严格地讲只能算是一种民间外交。因为中国共产党还不是执政党，毛泽东的外事活动还被界定在政府行为之外；而且这个时期毛泽东直接交

往的对象，大多不具备官方身份。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够恰当的。毛泽东这个时期外交活动的意义和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

这首先是由于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中共是中国的两大政党之一，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情况下，作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重要参与者（实际是政治灵魂），其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不仅如此，和一般的在野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拥有一支按照无产阶级建军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这支军队抗击着60%以上的侵华日军，并在战斗中不断地发展壮大，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已达到120万；有若干块按照新民主主义建国原则建立起来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除陕甘宁边区以外，都是共产党人在日本占领区重新开辟的，到1945年大大小小已经有19块，人口达1亿。毛泽东作为这样一个大党的代表，他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活动和言谈，关系到中日战争的前途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还影响到战后的世界格局，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其次，这一时期同毛泽东有过当面会晤者的国籍的分布，十分广泛，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印度、瑞士、苏联、新西兰、加拿大、瑞典、越南等十几个国家；虽然他们大多不具有官方的身份（1944年以后，毛泽东比较多的是与官方的外交人士打交道，如美军观察组成员和他在重庆会见的美英苏等国的大使，以及美国政府的特使赫尔利、马歇尔等），但他们的活动能量大，社会影响面广，剪表性强。他们有的是作家和著名的新闻记者，有些是国际问题专家，有宗教界人士，有世界青联的代表，有志愿来华帮助中国抗战的国际主义战士，也有日本、朝鲜的反战人员，还有一些党派的领袖，如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和越南的胡志明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毛泽东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美国共产党主席福斯特、

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等世界政要，虽然没有直接见过面，但却有书信和电报来往。特别是他同斯大林有非常密切的电文来往，经常就一些重要的国际国内问题交换意见。至于间接受到毛泽东影响的国际人士就更多了。

第三，虽然居住在偏僻的西北山沟，又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党内、国内的棘手问题，但毛泽东仍然非常关心外部世界的情况，他总是把国际局势和中国国内的问题联系起来观察问题。为了及时了解和正确地分析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除了挤出时间向每一个从外国来的朋友（包括从苏联回来的党内同志）直接询问世界上的事情以外，他天天阅读情报部门搜集整理的专门刊登外国电讯的“参考消息”。据《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介绍，现在还保存有1942年11月至1943年1月，他为研究国际问题按16个国家分类，专门摘录的外国电讯稿。为了及时了解敌人最机密的情报，毛泽东早在1937年4月就指示军委二局设法破译日军密码，到1939年我们已经能够破译日军密码了。1941年6月17日，军委二局破译日本驻德国大使发回日本外务省的密电，侦知德国将进攻苏联。毛泽东立刻让通知了苏联。果然，6月22日，德军大举向苏联进攻。而当时苏联还正在痛斥这是英美企图挑拨苏德关系。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重视国际问题的程度。

毛泽东这个时期外交活动的作用，究其要者有四：其一，向世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诸多方面的政策，加强了世界各国和各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彻底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共和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闻封锁。其二，通过同外国友人的交往，阐述和宣传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揭露日本、德国对蒋介石集团的诱降，扼制英美等国的远东慕尼黑阴谋，从而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与巩

固，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三，准确地把握国际形势和有效地利用国际声援，还是毛泽东能够有理、有利、有节并且适时地打退蒋介石集团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正确地指挥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条件。其四，毛泽东在战前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分析，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的独到见解和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前途的准确预见，以及他对战后世界格局与和平事业的重要主张，通过新闻记者的报道和官方文电迅速传播开来，从而对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与发展、对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与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这个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活动，在争取外国政府和国际友好人士对中国抗战的声援与支持、在确定中国共产党关于外交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则和积累外交工作经验，以及培养中共的外事工作人才等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 二

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外交活动，是围绕着争取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这个中心目的展开的。具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36年7月至10月，毛泽东同斯诺的会晤，是他抗战时期外交活动的开始，也是他整个外交生涯的开端。需要指出的是，斯诺的陕北之行，所以能够成行，不是偶然的冒打冒撞，而是经过双方的精心组织和准备。斯诺去苏区的想法，首先是通过他所执教的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和地下党员的介绍，得到中共北方局的支持；而后他又到上海得到宋庆龄、董健吾等的帮助。1936年3月，斯诺和马海德曾经赶到西安，想通过在张学良处做地下工作的中共代表刘鼎的关系去陕北，但未果。7月，他们第二次又去，终于成行。在中共中央方面，对接待第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记者，也十分重视，

事先做了认真的准备。1936年4、5月间，中共中央曾收到过斯诺提出的一份问题单子，上面所列的11个问题，就是7月15日，毛泽东第一次同斯诺谈话时所回答的主要内容。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了“对外邦如何态度——外国新闻记者之答复”。中央常委张闻天、毛泽东和博古，以及王稼祥等参加了会议，并发了言。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记录下这次会议对斯诺所提问题的答复，其主要精神也可在7月15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得到充分的体现。<sup>①</sup>可见，双方事先都对这次后来显现出历史性意义的会见，做了充分的准备。正像斯诺后来所写的：“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他被剥夺了合法地向中国报界发表意见的可能，但是，他知道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语发表出去，尽管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也会传回到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耳朵里。”<sup>②</sup>

从1936年7月接待斯诺到1938年10月，为毛泽东抗战时期外交活动的第一阶段。这个时期，他广泛地同美、英等国的国际问题专家和新闻记者接触，一方面争取打破国民党对中共及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的新闻封锁，传播中共的政治主张，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同时，借他们向世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形势，一开始就提出一条不同于国民党的外交路线，即首先是对日绝交、宣战。他主张一方面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另一方面，争取英美法等民主国家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前提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毛泽东说：“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集团。”

1938年10月至1943年为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毛泽东比较多地对英、美企图牺牲中国与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阴谋进行了及时地揭露和坚决的斗争。1939年6月30日，在“有田—克莱琪协定”尚在酝酿之际，他就发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指出：国际投降主义者“纵容日本侵略中国，自己‘坐山观虎斗’，以待时机一到就策动所谓太平洋调停会议，藉收渔人之利”。

“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这时，毛泽东一度认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也是帝国主义之间的非正义战争和对弱小民族的侵略战争。但是在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正式成立之后，特别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及时地捕捉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并作出新的正确的判断。1941年7月12日，他在一份指示中非常明确地写道：“在目前条件下，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反对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在此标准下，对于英国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日反德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sup>③</sup>这段话，既是毛泽东在新形势下统一全党思想的指示，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政策和方针上的变化。

1944至1945年8月为第三阶段。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终于熬过了最艰苦的相持阶段。为了彻底打破蒋介石集团和日本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封锁，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毛泽东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他除了继续同苏联沟通情况、互相声援外，还加强了同英美等国的合作与交往。他认为：英美及太平洋各国的对日战

争是正义的解放战争，他们对日的胜利就是民主与自由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进了解，加强配合，并改进中国的抗战状况。与此同时，毛泽东指挥各解放区军民发动了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取得重大战果。这与1944年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部分美国在华官员对国民党感到失望，而将目光转向中国的解放区。于是，在1944年6月9日由21位中外记者组成的“西北参观团”抵达延安。接着，7月22日和8月7日，以包瑞德为团长的美军观察组（“迪克西使团”）分两批抵达延安。这是美国向中国解放区派出的第一个正式代表机构。中外记者和观察组成员通过实地考察，将解放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真实情况，源源不断地发往美国 and 世界各地，有力地冲击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等向美国政府建议对延安实行援助，以“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政策和目标”，“这对美国来说是有长期的重大关系的”。他们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认为“这是可以导致美国政策取得成功的唯一可能的安排”。戴维斯还认定：“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的胜利几乎是必然的”，美国“必须放弃它对蒋介石公开承担的义务”，“在即将到来的争取中国的斗争中‘倾向’共产党人”，“支持共产党人是‘使我们自己同中国最团结、最进步、最伟大的势力站在一起’的最好办法”。他们还将毛泽东同他们多次重要谈话的内容向美国政府报告，给美国的对华政策以一定的影响。

如果说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的会晤，拉开了他抗战时期外交活动的序幕的话，那么，1945年8月至1946年8月，毛泽东为争取中国的国内和平，同美国等方面进行的交涉谈判，则是其抗战时期外交活动的尾声。在这一阶段，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

逐步调整其外交政策，其中一项举措就是派极端反共的共和党人赫尔利，接替所谓“亲共”的史迪威为其驻华的全权代表，开始全面推行一条亲蒋反共的政策。毛泽东预见到抗战胜利后中国所面临的光明和黑暗这两个前途，他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就正告美国政府：“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为了揭露美蒋制造的假和谈阴谋，也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内战，并争取世界舆论的同情，毛泽东先后同美国政府的特使赫尔利、马歇尔等进行了认真的谈判，期间，他还亲赴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但是，蒋介石集团无视毛泽东和中共的正告，无视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呼声，而是迷信自己的武力，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叫嚣在三到六个月内全部消灭共产党。和平的大门被关闭了，战争的阴云笼罩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中国人民的头上，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发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接着他开始踏上艰苦转战的征途。

### 三

1936年至1946年的外交活动，毛泽东尽管是初涉外交舞台，但仍显露出影响他整个外交生涯的一些特点。

第一，毛泽东是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双重身份登上世界外交舞台的，尽管各种问题错综复杂，但他不为具体的外交事务所陷，而总是能从宏观上和战略上考察问题，一开始就显露出非凡的战略眼光。如1936年7月15日他同第一位到苏区的外国人斯诺的第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人民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日本的侵略不仅威胁了中国的和平，而且威胁了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

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而且也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特别是美英法苏等与太平洋地区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的敌人。”<sup>(4)</sup>根据这样一个基本点，他鲜明地提出，除了日本和帮助日本的国家以外，所有的国家，包括苏联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乃至英美等在太平洋地区有重要利益的国家，可以组成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他没有计较这些国家历史上与中国的恩怨如何，也没有计较这些国家在现实中的矛盾和差别，而是从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这一个共同点上，提出建立世界联盟的战略思想，反映出毛泽东战略家的深邃眼光。

第二，毛泽东把“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的思想，作为他外交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他说，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虽然当时中国人民正在为从日本殖民地化的黑暗统治中摆脱出来而苦苦挣扎，但他却深信：“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国，是和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离的。”<sup>(5)</sup>正因为树立了这样一种思想，所以他特别关心国际形势的变换，总是习惯于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观察问题、解决问题。他对国际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影响他对国内形势的判断；反过来，毛泽东对国内问题的综合归纳，也是他对国际问题作出判断的重要条件。虽然这一时期他对一些国际问题的分析和判断，并不都是十分准确，但已经在外交领域展示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家的高超智慧和博大胸怀。

第三，毛泽东是为了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援，把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日寇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才开始接触外交问题的。和1840年以来中国历朝历代的反动统治者（包括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相比，毛泽东在外交问题上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以全中国的人民为后盾，以维护中华民族

最大多数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为目的，把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始终作为其外交活动的第一要义。虽然他十分注意策略，非常讲求团结多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但他和过去那些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以夷制夷”不同，他运用灵活机动的外交策略的先决条件，是坚持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的原则。他强调“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虽然他一再为争取欧美国家的同情和支持而努力，但他始终把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和觉悟视作夺取抗战胜利的最终力量。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明确地告诫全党：“我们必须看到国际和平阵线各国各有其各不相同的情况。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助我，政府则取某种程度的中立态度，其资产阶级则利用战争做生意，还在大量输送军火和军火原料给日本。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在援华问题上已经具体的表现出来；然而国际形势目前还不容许它作超过现时程度的援助。因此，我们对国际援助暂时决不应作过大希望。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主要地寄其希望于外援，无疑是十分错误的。十五个月经验证明：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sup>(6)</sup>他在向斯诺表示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投资时，也曾郑重声明：我们欢迎用于建设目的的外债，但是，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对影响中国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sup>(7)</sup>由于坚持了以我为主的原则，这就和那种“从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倒向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屈辱外交彻底划清了界限。

第四，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活动中还系统阐述了许多宝贵的思想，除了前面讲到的内容外，比较集中的是对外开放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应该对世界有伟大的贡献，可现实的中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但他坚信：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把他们巨大的潜在的生产力用在

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够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世界文化水准，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对世界将有伟大的贡献。<sup>⑧</sup>为了这个目的，他提出要全面地向外国学习和对外开放的思想。在政治上，他有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主张；在军事上，他希望能得到外援，更新和补充武器装备，并同反法西斯国家合作对敌；在文化上，他认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sup>⑨</sup>尤为难能的是，毛泽东当时就详细地构想了在经济上对外合作或对外开放的问题。这主要是：（一）开展大规模的对外贸易。他说，中国人民一旦真正获得国家的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因为“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sup>⑩</sup>因此，他主张“对外和平通商，订立互利的协定”。<sup>⑪</sup>（二）“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毛泽东深知，中国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个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sup>⑫</sup>（三）战后中国最适宜与之进行经济合作的国家是美国。毛泽东虽然一直认定社会主义的苏联是中国最可靠的政治盟国，但在选择经济合作国家这个问题上，他却能不受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束缚，而是依据具体的国际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互补等因素，认为“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合宜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sup>⑬</sup>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当年思想的开放程度。尽管由于受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国共之间

阶级矛盾的制约，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和主张当时基本上未能实现。但在那样艰苦激烈的战争环境中，他还能想到这些问题，而且勾画得那么具体，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给我们后人许多的启示。

#### 四

研究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活动，有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那就是毛泽东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有的论者认为，毛泽东和中共在这个时期还谈不上什么独立的外交，他们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苏联外交政策的翻版。持这种观点的人，特别对毛泽东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为斯大林和苏联的辩护，微词颇多。对这些问题，应该具体地分析。

苏联是从其本身的利益出发考虑中日战争问题的。一方面，随着欧洲的局势的日趋紧张，希特勒从其反共本性出发，同时也为了同英、法等国讨价还价，不时表现出或者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要发动对苏战争的姿态与行动；英国等西欧国家也希望能祸水东引，试图通过某些让步以换取德国向东发动对苏战争，防止其向西行动危害自身利益。而中日战争的发展对于苏联的国家安全也有着直接的影响。假如中国被征服，日本拥有中国的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这样，苏联就面临着东西线双向作战的威胁。所以，苏联希望借重中国以牵制日本。因此，援助中国对日抗战便成为苏联远东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另一方面，苏联虽然与中国共产党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但它却认为中共的微弱力量对于抗击日本的强大侵略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它把牵制日本的希望主要寄托于南京国民政府。这种认识和要求与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的政策是一致的，与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愿望，虽然在出发点上不同，但恰好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

这是造成这个时期毛泽东与苏联在外交政策上，既有相同又有分歧的原因之一。

就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来说，共产国际曾经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推动大革命的蓬勃发展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由于它远离中国的盲目指挥，粗暴地干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曾给中国的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毛泽东作为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和正确路线的代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几次受到执行“国际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打击和排挤，他对无条件执行共产国际指示而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但是毛泽东并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他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客观地看待二者的关系。在他实际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后，仍然非常尊重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领导。因为，一个强大的邻国——苏联的存在，特别是这个邻国与中共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由他实际主持的共产国际又和中国共产党有着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再加上苏联在世界人民面前一贯保持有爱好和平和进步的姿态，这对于在艰难困苦中不懈奋斗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来说，那里是希望和重要的精神支柱。因此，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始终把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看做是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第一位的外部条件。他在1937年7月23日，即中国的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次正式阐述中共的外交方针时，非常鲜明地提出：“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

而共产国际自1935年7月确立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路线以来，政策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工作方法上也较过去更注意尊重和发挥各国党的自身作用。因此，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前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这一

时期里，中共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一直比较融洽，特别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和抗日战争的前期，共产国际对促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的情况。

另一方面，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等一系列事件中的态度和行动，并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和中共的意愿。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有些令人失望。在长征后期毛泽东和中共有“打通国际线”的计划，希望能和苏联连接在一起，依托苏联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这个计划后来未能如愿，除去国民党强敌的封锁等原因外，得不到苏联的实际援助不能不是原因之一。西安事变前，中共在同东北军、西北军建立统一战线关系的过程中，有可能得到苏联的支持是毛泽东在谈判中的重要砝码。但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对东北军、张学良的斥责，以及他们要竭力洗清自己与事变干系的态度，与中共的期望是根本相反的。进而，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毛泽东和中共除了在政策上得到若干指导性意见外，在事实上也很难得到苏联方面实际的甚至是口头的声援或帮助。特别是王明在1937年10月回国后，贯彻共产国际“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指示，所造成的危害，以及毛泽东的坚决抵制和斗争。这些都反映了双方在政策上的分歧。

在对外政策上，如前所述，毛泽东是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一基本事实出发，把世界各国划分为支持中国反抗侵略者的、中立的或有可能支持中国的和支持日本的德、意法西斯国家这三类，以此来确定中共和中国的战时外交政策，而不是根据苏联的外交政策如何。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在1939年有过变化，主要的是把原来作为争取对象的英法美不加区别地看做是与德意日一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并对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的行为进行了辩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整个的历史发展进程看，我们不能说毛泽东的这个判断是确切的。但如果希特勒当年不是首先向西同英法开战，如果日本不是南进同英美作战，而是首先分别从两个方向占领苏联，然后再与英美法争夺世界，我们能说毛泽东的判断不正确吗？历史不能假设，我们还是讨论一下毛泽东的判断是依据苏联的需要作出的，还是根据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独立制定的。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毛泽东受到苏联外交政策变化的影响，但从历史发展过程看，当共产国际尚在强调必须依赖英美支持的国民党蒋介石、“必须利用那些从经济角度关心维持中国的秩序、安宁和正常经济生活条件的组织和个人”的时候，毛泽东就不是无条件地执行这些指示，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sup>⑩</sup>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做出新的判断，是在苏联放弃争取英法而改同德国打交道之前。1938年10月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毛泽东在外交方针和对外政策上逐渐发生变化。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做《论新阶段》的报告，和以前的提法相比，就已经有所变化。他强调：“我们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第三更加不可忘记现时与将来的区别，我们对前者不应寄以过高的希望。应该努力争取前一切可能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事实，但过高希望则不适宜。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应该放在这种基点之上。”<sup>⑪</sup>1939年2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发言中，进一步对国际形势做出新的判断：现在国际上和平阵线尚未形成，民主国家与法西斯谋妥协，这是很大的国

际形势变动。他告诫党内同志，要有应付各种形势的思想准备。<sup>(16)</sup>而苏联是在1939年3月10日以后才逐渐改变政策的。<sup>(17)</sup>

导致毛泽东重新判断国际形势的原因，一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政权的政策开始逆转。1939年1月2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阐述外交方针与国策时说，“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是日本亡了或者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界说”。“在卢沟桥事变前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恢复以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这是发出了对日妥协的信号。这次会议还决定强化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加强蒋介石个人的权势，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会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确定了对日实行“有限度”作战的方针。与此相反，为对付共产党，国民党先后制定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文件，并调动大批军队对中共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制造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摩擦事件。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根据地的形势骤然严峻起来。骤然严峻的形势迫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把国内和国际的局势联系起来，重新审视自己内外政策。二是德国的“调停”和英美主持的远东慕尼黑阴谋。

1939年6月10日和1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做反对投降的报告，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指出：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是从抗战开始就存在的，但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险，则是目前政局中的现象。其原因有三：一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二是日本的诱降政策。武汉失守后，侵华日军也改变战略，对国民党统治区由过去的军事进攻为主，变成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而把主力逐步地用以对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毛泽东强调，日本“灭亡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基本方针（总路线）是坚定不会自己动摇的，但是他执行此基本方针的方法（或

策略)是软硬兼施的,有伸缩性的,并且作出某些暂时的局部的表面的让步,以求达其根本目的”;三是英、美、法的压力。他在一一列举了所谓民主国家英法美等,自中国抗战以来冷眼旁观和乘机大做军火生意等所作所为之后,指出:“一切这些,其中心目的,在于消耗战争双方,等到精疲力竭时,他们就以‘健全的身体’出来喝令双方停战,使双方都听他们的话。”毛泽东提醒全党,“英美法策动的远东慕尼黑,现在接近了一个紧要时节。他们似正在作这种想法:希望中国再打半年,双方都更疲弊一点,那时就到了远东慕尼黑开幕之时了。”<sup>⑧</sup>

当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中国的处境,同苏联和斯大林在国际上所面临的处境非常相近。正因为如此,当斯大林不再把“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加以区分,而把他们都看做是“帝国主义国家”时,很自然就得到了早存此念的毛泽东的共鸣。也正因为有相同的处境和感受,或者说是有相同的立场,所以,当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国际上一片谩骂声时,毛泽东却独持异议,对之表示赞许。我们不能因为有上述背景,就说毛泽东当时改变对外政策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确定为帝国主义之间的非正义战争的判断是正确的;同样,我们也不应该抛开历史条件不顾,对毛泽东支持苏联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举动横加指责。

对这个时期中共与共产国际、苏联关系的最权威的诠释者,应该是毛泽东本人。1936年7月23日,在保安的窑洞里,当斯诺问,外界说“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工具”您怎样看待时,毛泽东郑重地说:“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对全民族负责。绝不是为了俄国人民和第三国际的统治。为的仅仅是中国大众的利益,只有与中国大

众的利益完全共同的地方，才可以说是‘服从’莫斯科的‘意志’。当然，一旦中国的大众像他们的俄国兄弟一样，获得了民主权及社会的经济解放以后，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将惊人地扩大了。当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然后苏维埃国际联合的问题才会产生，……但是今天我们不能提供什么方式，这是一个尚未解决，不能提前解决的问题。还有最后一点显然是最重要的，即这个世界联盟要成功的话，必须各国依其民众意志有加入或退出的权利，必须各国主权完整，绝非‘听命’于莫斯科。共产主义者从未有别的想头，‘莫斯科统治世界’的神话，只是法西斯和反革命者的发明罢了。”<sup>(19)</sup>

这里我们就把毛泽东当年的这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 注：

(1) 程中原，《有关斯诺访问陕北的史实补充和说明》。参见《党史文汇》1998年第4期。

(2) 斯诺：《复始之旅》，《斯诺文集》第一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页。

(3) 转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57页。

(4) 斯诺：《毛施会见记》，《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37年11月版。

(5) 《为永久和平而战》（1938年5月），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

(6) (15) 毛泽东：《论新阶段》，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67、640 页。

(7) (8) (10) 吴亮平：《毛泽东 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9 页。

(9)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06 ~ 707 页。

(11) 毛泽东，《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参见《解放》周刊第 45 期。

(1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参见《解放日报》1945 年 5 月 2 日。

(13)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谢伟思的六次谈话》，参见《党史通讯》1983 年第 20、21 期合刊。

(14) 马贵凡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援助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决议》（1937 年 10 月 3 日）。参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

(16)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 ~ 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3 页。

(17) 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05 页。

(18) 毛泽东，《反投降提纲》。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第 82 ~ 96 页。

(19) 毛泽东，《特殊问题》。参见《文献与研究》1986 年第 5 期，第 33 页。



# 13. “一边倒”的政治决策与新中国 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

□ 内外有关新中国外交问题的论著大都把“一边倒”作为新中国基本的外交方针。由此而来，有的论者认为，由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采取倒向苏联一边的方针，就使得新中国丧失了与欧美国家交往的可能，以至长期处于封闭的状态；也有的论者认为，“一边倒”使中国只能搬用苏联僵化的经济模式，给后来的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与此相关，对建国前夕制定的外交政策，学术界还有一种情况是把当时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与“一边倒”不分顺序地并列，都笼统地作为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不够确切的，想结合史实谈谈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 一、“一边倒”的首要意义是建国的政治方针

对“一边倒”方针的第一次正式表述，是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写道：“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显然，毛泽东这里主要是针对当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而言的。他所强调的“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其本质不是指倒向苏联，而是讲在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由于世界上实际存在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严重对立，“一边倒”很容易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单纯的外交方针。

撇开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建立一个什么样国家的政治形势不谈，我们首先看“一边倒”的理论渊源。

“一边倒”的方针渊源于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理论。即在帝国主义阶段，殖民地半殖民地发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近代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列宁斯大林的这一理论。早在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上就制定出自己的最低革命纲领和最高革命纲领。1940年1月，毛泽东进一步论证了中国现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毛泽东指出：“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绝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可见，“一边倒”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既定的政治方针。

其二，值得注意的是，抗战中期在中国共产党把“一边倒”方针的基

本内涵——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革命纲领提出的时候，世界还没有形成两大阵营对垒的政治格局。也就是说，当时还不存在作为外交方针进行取舍的意义。相反，毛泽东倒是曾设想过去要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与美国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合作。他甚至认为，在战后，“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最适当的国家，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仅有的国家”。

其三，如果说“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方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年代，是为了维护同盟国的联合战线共同对敌，其外交意义不甚突出的话，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5 年之后，即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一边倒”方针的外交意义也已不再存在。但是它作为政治方针，在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则一直没有改变。

可见，“一边倒”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国的政治方针，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 1949 年夏毛泽东做进一步阐述的时候，乃至今天，都是完全成立的，并且始终居于第一位的支配地位。

那么，能不能说在建国前后“一边倒”方针没有任何外交意义呢？不能。

## 二、“一边倒”方针的外交意义

外交方针是政治路线的一部分，是为贯彻政治路线服务的。在通常情况下，政治路线决定外交方针。因此，“一边倒”作为新中国的建国方针在开国前被重申的时候，当然具有重要的外交意义。否认或低估这一点都是不对的。但是如果夸大了，把它作为新中国基本的外交方针也是不正确的。我们认为，至少毛泽东在把“一边倒”作为政治方针论述时的论断——“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不能简

单地套用于“一边倒”的外交意义。“一边倒”是作为一种外交策略提出的。

第一，如前所述，“一边倒”的外交意义不是从来就有的。新中国的大门是向世界上所有以平等待我之国家敞开的。尽管美国奉行扶蒋反共的政策，尽管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敌视乃至企图扼杀新中国的反动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在制定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时，从来没有关闭过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大门，而是一再表示自己这种博大的胸怀和诚意。这样的事例无论是在内部最机密的文电中，还是公开的正式文告里，比比皆是。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为中革军委起草的致邓小平、饶漱石、陈毅、刘伯承的电报中即明确指示：“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5月10日，毛泽东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黄华与美国驻国民党政府大使司徒雷登谈话给中共南京市委的复电仍然指示：“对于傅泾波（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引者注）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更是郑重地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这里并没有提多么苛刻的前提条件，仅只是要求建交国必须断绝同旧政权——国民党反动派的关系，而这是任何一个新政府若要国际承认时都必然会提出的一个最起码的条件。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一原则条件也不是

只针对美国等一直支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打内战的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所有的国家，包括社会主义的苏联，都不例外。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的态度是“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毛泽东曾在一则关于外交问题的党内指示中特别加写道：我们现在和苏联及新民主国家，“尚和其他外国一样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他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来往”。

只是在美国等彻底地关闭了同新中国合作的大门并转而对其进行封锁，甚至企图武装干涉之后，具体说是6月25日，在美英等国军舰的直接参与下，国民党海空军开始全面封锁已解放的各口岸，企图以封锁禁运造成经济上的压力使中共屈服的情况下，毛泽东于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他在论述新中国在政治上必须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同时，还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第二，对于这种外交上的“一边倒”决策，是年7月19日，邓小平在给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同志传达毛泽东口头指示的一封信中曾作过精辟的解释。他写道：“打破封锁之道，毛主席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是被动的倒）；内部政策强调认真的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毛主席说，更主要的从长远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着眼来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这两条很好，与中央精神一致。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外交上的“一边倒”方

针是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封锁的一种策略；同时它还有力地证明“一边倒”绝不是后来导致中国在上世界上处于相对孤立状态的根源，恰恰相反，外交上的“一边倒”方针是为打破敌对势力的封锁而进行的积极努力，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要使新中国走向世界的迫切愿望。

第三，新中国对苏联和东欧新民主国家实行“一边倒”的政策，是基于兄弟般的友谊，是因为“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因此是真诚的、积极的。但也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是一定时期的政策，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基础之上的，是实行平等互利原则的。因为“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在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上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要是认为同这些国家之间毫无问题，那就是盲目的乐观。”

第四，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倒”，并不排斥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或进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坚持既定原则的前提下，非常重视同非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即使是对那些暂时无法达成建交协议的国家，也促进与他们的经济贸易往来。1949年12月22日，正在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毛泽东，就曾电告中共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1950年1月7日，毛泽东再次由苏联致电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关于出入口贸易问题，务请注意统筹苏波捷德匈及英法荷比印缅越罗澳加日美各国在一九五〇年全年出入口的种类及数量，否则将陷入被动。”这些举措既是出于国内经济建设的考虑，也充分表现了新中国领导者们的眼光胸怀。

尽管“一边倒”方针在外交上是作为一种策略提出的，但由于美英等对新中国的敌视和相当国家因被蒙蔽而附和，新中国的其他外交政策，除睦邻友好政策外，在实行中大多受到制约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在一个时期里成效最大的就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其主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带动了一批国家迅速与新中国建交。正如毛泽东对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所预期的那样：“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就有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波兰、蒙古、德意志、阿尔巴尼亚、缅甸、印度、越南、丹麦、瑞典、瑞士、印尼十七个国家与我们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同时还有南斯拉夫、巴基斯坦、英国、锡兰、挪威、以色列、阿富汗、芬兰、荷兰九个国家也已经表示愿与我国建立邦交。这样，新生的共和国迅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二是中苏同盟的形成，大大地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也就是增强了世界和平民主的力量，同时也使得刚刚诞生的新中国避免了像当年苏俄那样遭受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三是在经济上帮助我们克服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和禁运所造成的困难。当时苏联援建了156项重点建设工程，提供了相当数量的贷款帮助培养了大批的工程技术人才，还无偿转让了大量的技术资料。这一切对巩固新生政权，对恢复和发展经济，对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有的论者提出“一边倒”方针在外交上的负作用，说是：“致使

中国丧失了与欧美各国交往的机会，陷于孤立”和“只能片面搬用苏联僵化的经济模式，给后来的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我们认为这种说法过于武断。充其量只能说，在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在理解上有偏颇或运作中有过分依赖的倾向，以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问题。但那毕竟不是“一边倒”政策本身的缘故。

### 三、独立自主——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问题的权威著作——《当代中国外交》，把“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作为建国前夕在外交上的三大决策。这一概括是很有见地的。但也有一些论著把这三大决策不分顺序地笼统并列，并且都称作新中国基本的外交方针，我们认为这是不确切的。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是独立自主。为了说明此问题，我们有必要首先搞清楚三大外交决策提出的背景和顺序，及其各自的作用和相互的关系。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们最先提出的一项外交决策。师哲回忆，毛泽东 1949 年 2 月在西柏坡会见米高扬时就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思想。一个月后，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旧中国是一个长期被帝国主义奴役、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掌握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控制权，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帝国主义的各种控制权随之被逐渐剥夺。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仍然存在，一百多年间帝国主义在中国形成的势力和影响，也不可能一下子自行消失。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要想真正地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就必须采取步骤，“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

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监护和管制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

旧中国在政权更迭时，新的执政者为了获得帝国主义的支持，无一例外地都表示要“外崇国信”。实际是无条件地承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侵略特权，把前政权所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所以只有执政者的升迁与更迭，中国人民的屈辱地位丝毫也没有改变。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实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政策，正是为了同旧中国的一切屈辱外交彻底地划清界限，使中国人民不仅从国内反动阶级的统治下获得解放，而且还要永远地砸碎和摆脱帝国主义一百多年的殖民奴役和压迫，以树立和维护中华民族的伟大尊严。

如果说“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政策的着重点在于对内如何肃清帝国主义势力，那么，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制定的第二项外交政策——“另起炉灶”，则主要是阐明对外的建交原则。

在建国前后毛泽东正式发表的文章中，我们没有发现“另起炉灶”这一形象的表述。但是周恩来在1952年4月的一次讲话中曾经明确地说：“一九四九年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胜利渡过长江。23日，南京解放。这标志着国民党政府对中国的统治的彻底结束。但是在胜负分明的情况下，苏联大使馆却随南逃的国民党政府移

至广州办公，反而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倒留在南京观望。各国政府都握着“外交承认”的王牌，想看看中国共产党人会怎么办。毛泽东的回答就是“另起炉灶”。4月25日，中革军委特就外交问题致电渡江战役总前委刘伯承、邓小平等，指示对驻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也不要文字上和口头上做任何承认他们为大使或公使的表示。”4月30日，毛泽东就紫石英号事件为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声明，郑重宣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另起炉灶”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的延续和发展，充分体现了独立自主的精神，表明中国人民在主权和国家尊严面前不向任何势力低头的决心。正如周恩来所说：“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1949年5月30日，苏联政府终于从广州召回了驻国民党政府的大使罗申。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失去了他们的耐心，撕去其“亲善”的面孔，“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在这种形势下，在外交上也实行“一边倒”，成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必然选择。

总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和“一边倒”是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形势的发展相继制定的三项重要外交决策。虽然它们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但在实行中却是并行不悖的；虽然它们在表述上都是用形象生动的比喻，但其内容却是关于新中国尊严和主权的大问题，不

容有丝毫的含混；虽然它们分别对新中国的外交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但还都不能被视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一项阶段性的外交政策。随着全国大陆的解放和帝国主义势力的被驱逐，随着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权益及其企业和机关的被收回，随着帝国主义殖民思想的被批判及其文化机构和教会组织的被整顿和接收，这项针对性很强的外交政策，在建国后不久就圆满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另起炉灶”是一项建交原则，只是外交事务中的一个方面的一项原则。外交不仅分为官方的和民间的，而且有经济的交往，还有军事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等多方面的交往。

如前所述，“一边倒”是作为外交策略提出的，是有条件的，并且不排它。在建国初的外交实践中，新中国主要针对三个方面开展了外交工作，即分别对苏东国家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周边国家实行睦邻友好的政策；对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反封锁、反禁运的斗争，同时开展民间友好交往。“一边倒”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外交是双向的，在中苏关系破裂后，外交上的“一边倒”，实际上也不存在了。

对新中国的一切外交政策都具有指导作用的，也就是新中国的基本外交方针，是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得出的一个创造性的结论。其实质是“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在外交上，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人制定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另一面又与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即维

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完全一致。更由于中国有一个世纪以来受帝国主义侵略、奴役和掠夺的惨痛历史，饱尝外族压迫的中国人民深切地渴望赢得彻底的独立和解放。犹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所以，独立自主在新中国的外交事务中具有特别突出的意义，是一切外交政策的灵魂。

建国前夕提出的三大外交决策，正是秉承了独立自主的精神。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针对世界上两大阵营对垒的国际形势，针对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一基本现实，同时考虑到整个世界的和平与进步，考虑到中国人民要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一强烈愿望，顶住各方面的强大压力，独立自主地制定了三大外交决策。三大外交决策充分体现了独立自主的精神。它们的提出和实行，对内彻底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和其盘根错节的影响，对外树立了严格的建交规范，彻底划清了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界限。同时解决了当时最急迫的现实问题，即打破敌对势力的封锁和禁运，防止可能遭受的外国干涉，并为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样，就使得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于世界政治舞台。因此，我们说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是贯穿于三大外交决策的核心。

## 14. 毛泽东：社会主义中国的奠基人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与领导者之一。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长期斗争实践中，他和他的战友们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并以此指引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他因此而当之无愧地被誉新中国的缔造者。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领导全国人民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和恢复发展经济的基础上，适时地提出和实施向社会主义进军的伟大战略，用非暴力的和平手段，顺利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在中国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他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奠基人。

### 一、适时开展三大改造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早有明确的论述。他最初设想，民主革命胜利后经过 15 年或更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待条件成熟后，再一举实行国有化和集体化，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他 3 年后就改变了这种设想。这主要是基于：第一，没收官僚资本归国有和对帝国主义在华资产的清理，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并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工业经济的主体。第二，

战争创伤迅速得到医治，长期在帝、官、封统治下受到严重摧残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1952年全国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不仅较1949年增长近1.5倍，而且超过战前最高水平1936年的22.3%。农业总产值较1949年增加48.8%，比战前最高年份1936年增长18.5%。<sup>①</sup>第三，经过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使几亿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被彻底清除。第四，在党的利用和限制政策下，经过调整工商业与民主改革，特别是经过“三反”、“五反”，原来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特性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成为被纳入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管理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的、工人群众监督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第五，朝鲜战局已经稳定在三八线，美帝国主义直接对华进行武装侵略的威胁已经解除；国内则通过镇压反革命与剿匪反霸，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得到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成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强大推动力和基本的政治保证。此外，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的鼓动和全国上下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与憧憬，以及国际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两大阵营的严重对垒形势，都对新中国的发展走向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这样在1953年6月，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适时地提出：“党的任务是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sup>②</sup>这就意味着从原来的先建设、后改造，转变到建设与改造同时并举。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学术界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结论，产生疑义。特别是鉴于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在党和国家的积极引导与大力扶持下，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增长很快，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就有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议论。那么，当年的转变是人为的拔苗助长，还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正确决策呢？产生这种疑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忽略了中国原生态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生存的环境与其本身的特点。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胚胎上滋生的，或是在其夹缝中生长的。虽然相对于封建的生产方式，它是先进的，但其本身除去雇佣剥削的固有特征之外，还具有许多先天不足。如规模小、技术落后、家族行会式管理、寄生性等。这些不足，不仅严重制约其自身的发展，也阻碍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953年开始对它们的社会主义改造，不只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改造，而且是对其所具有的封建因素与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的改造。而我们的一些论者则只强调民族资本主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对它的严重缺陷却视而不见，把它们同发达国家的现代企业简单地类同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坚持《共同纲领》确定的限制与利用政策，曾两次调整工商业，在此基础上开始实行公私合营。据陈云在一个报告中指出：全国私营工厂约有13万户，到1955年上半年只有1900多户实行了公私合营，其余的12万多户大都是小厂、落后的厂。由于技术设备差、管理落后、产品成本高并且不合规格，如果国家让出生产任务给它们，就等于把先进工厂的任务让给落后工厂，这在经济上是很不合理的。“因此，改组非常必要，不改组就不能安排。”<sup>③</sup>于是，国家实行了按行业改组并逐步公私合营的办法，把一些很小的落后工厂并入大厂、先进厂，或者把若干个小厂合并为一个大厂，再就是干脆淘汰一些没有改组必要的厂，把工人和职员安排到其他厂去。在这个过程中，除去努力使各个企业原有的生产要素得到较为优化的配置和合理使用之外，还改变其管理方式，保留有经验的资方人员继续参加管理，同时融入公方

人员，再加上工人的监督，从而提高其生产规模，改善管理方式，最终达到提高生产力的目的。

事实上，在这场涉及几亿人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中，社会生产力不仅没有出现倒退或停滞，而是持续高速增长。以公私合营工业的产值为例，本年度与前一年比较（剔除当年新增合营企业的产值），1950年增加17.3%，1951年增加31.4%，1952年增加32.3%，1953年增加28.3%，1954年增加25.1%，1955年增加29.1%。1956年全国公私合营工业总产值达191.1亿元，比1955年增加了32%。1956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55年增加16.5%，1957年又比1956年增长7.8%。<sup>(4)</sup>到1956年底，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一年完成。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一经确立，亿万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就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政治热情，社会主义制度立刻展现出巨大的优越性。195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创纪录的1388亿元，其中工业784亿元，农业为604亿元，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产值，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破天荒的事情，可以说是在比较低级的水平上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领导这场社会大变革中，不仅摸索出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农业集体化道路，而且创造了从低级到高级的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利用、限制和改造的过程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逐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产阶级实行逐步的和平赎买。从而解决了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问题，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及其关于和平赎买与国家资本主义学说的丰富与发展，奠定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基石。对此，邓小平曾予以充分肯定：“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用了和平改造的办法。

实践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我们的生产不仅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得到了发展，既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教育了资产阶级。”<sup>⑤</sup>

## 二、确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它彻底改变了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和社会化生产的主人，并决定了与其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即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以及与之配套的上层建筑。生产资料公有制不仅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也就是说，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立与否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是否建立。新中国刚诞生时，国营工业的总产值占到全部工业总产值的 34.2%，到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 1952 年已经进一步增加到 52.8%。这时，国营经济在整个工业经济中，不仅起到领导作用，而且已经居于主体地位。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在 1952 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只占 43.1%，其中现代工业总产值仅占 26.7%。公有制经济还远没有居于主体地位。正是由于 1956 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特别是个体农业走上集体化道路），才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在中国的绝对主体地位，才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是保证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在新时期我们党能够顺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纠正过去曾经有一个时期片面地追求单一公有制形式和僵化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条件。目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公有制经济。有材料统计，它在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总产值与总资产也已经超过公有制经济（统计口径不一，尚未见到国家权威部门的准确统计）。但是，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是因为，第一，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是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引导扶持下发展起来的，受国家宏观政策和现行法律规定的调控与引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现在我国广大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性质没有变，只是把家庭经营方式引进集体经济实行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分散经营的有机结合。邓小平认为，农业要有两个飞跃，一是要长期坚持废除人民公社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个飞跃，“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sup>(6)</sup>因此，目前在经济总量上仍是公有制经济居于主体地位。第三，在非公有制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公有制经济并没有停滞，而是同样有了快速的增长。以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为例，1978年是0.72万亿元，2007年增加到35.5万亿元。第四，随着混合经济的发展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增长，以及集体经济性质的各种新型专业合作社在全国城乡的大量涌现，公有制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正如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所明确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sup>(7)</sup>这说明，我们实行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管理体制，并没有改变公有制在中国的主体地位。

### 三、夯实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

在上层建筑方面，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将新中国的国体定性为“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对国体的这一表述，60年来始终没有改变。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却发生过实质性的重大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权的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进入过渡时期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之后，工人阶级成为彻底摆脱雇佣剥削的工人，农民由个体劳动者变成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农民，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结成更加牢固的联盟；与此同时，小资产阶级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化，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民族资产阶级则因为丧失了自己的经济基础，作为阶级已经不存在。这样，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拥护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的阶级基础。这说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上层建筑的阶级基础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仅如此，在政权形式上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新中国成立时是通过协商制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开国大典后，仍是在协商的基础上，通过召开各地各级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成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在全国普选的基础上，于1954年9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开始正式实行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一政体形式既保证和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管理国家的民主权利，又能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议行分离和三权分立的政体彻底划清了界限。在那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还讨论通过了新中

国的第一部宪法，毛泽东当时在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解释这部宪法草案时，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sup>⑧</sup>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又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在广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成为社会各界普遍的共识之后，改革开放中涌现出亿万农民工，他们也加入了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尽管他们的户籍还是农民，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与传统的工人毫无两样，他们当然也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工人阶级队伍空前壮大，他们不仅仍然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而且与先进的科学技术密切相连，呈现知识化和年轻化的特点。特别是亿万农民工的加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密切了工农联盟，从而夯实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与此同时，因为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利益关系，事实上，也形成了新的利益群体。但他们与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一起，被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sup>⑨</sup>，同属于新时期人民的范畴。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断得到巩固与扩大。

此外，毛泽东还为新中国确定并实施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在少数民族集聚较多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当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国家因民族问题四分五裂时，人们无不深感毛泽东关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切民族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的思想和他为新中国确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英明与伟大。这些政治制度对新中国政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 四、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指导地位

在创立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新中国国体、政体等基本政治制度的过程中，毛泽东十分注重用马克思主义教育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努力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新中国各项事业，尤其是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评论美国政府“白皮书”时，他就号召少数对帝国主义尚存幻想企图走中间路线的知识分子，“丢掉幻想”，“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1950年6月，他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明确指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sup>①</sup>；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号召广大知识分子克服“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激发反美爱国热情，投身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春，毛泽东根据电影《武训传》放映后所反映出的一些社会倾向，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发起一场思想批判运动。他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武训的行乞兴学摆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环境中来重新考察，并提出新见解，以宣传历史唯物主义，促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随后，毛泽东又领导兴起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他认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sup>②</sup>并强调要实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针，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通过组织各界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社会实践，以及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促进其世界观

发生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领导开展的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思想的普及教育，顺应了意识形态必须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相适应的客观要求，得到全国人民和广大知识分子的自觉拥护和响应。全国上下的思想觉悟普遍提高，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根本的转变。各界群众在衷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同时，开始自觉自愿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庄严地宣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sup>⑩</sup>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对新中国各项事业和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在内的各个方面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

## 五、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伊始，毛泽东就率先开始探寻与苏联不完全相同的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对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中国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经济状况做出正确的分析与判断，最早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他独创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认为可以把社会主义社会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他提出并阐明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这样一条有别于苏东国家的，实际是工农业并举的工业化道路；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主要矛盾、基本矛盾），特别是创立了关于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他提出要对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兼顾国家、集体和生产者个人三方面的积极性，要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办法等；他系统地论述了“自力更生

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并响亮地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sup>⑬</sup>

尽管毛泽东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从微观到宏观，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但是，在领导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过程中，诚如他自己所言：“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sup>⑭</sup>他认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sup>⑮</sup>因此，他在实践中比较注重追求单一的公有制和公有制的高级形式，而这种做法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严重脱节的。与此相关，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有某种程度的教条化理解。加上对中国所面临的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和由之而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使得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一些偏差，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过程中，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秉承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优良传统，打破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僵化理解及其相应的思想禁锢，摆脱了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排除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干扰，重新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基本路线：从中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从根本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坚持和巩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前提下，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吸收和借鉴国外一切有益的经验、技术、资金，鼓励和支持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调动了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等各项事业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从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抚今追昔，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sup>①②</sup>

## 注：

(1)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8 ~ 109 页。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51 页。

(3) 《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5 页。

(4)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02 ~ 303 页。

(5)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59 页。

(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55 页。

(7) 《人民日报》1997 年 9 月 22 日。

(8)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26 页。

(9)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86 页。

(10)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4 页。

(11)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84 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50 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1 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03 页。

(15)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14 ~ 215 页。

(16) 《人民日报》2007 年 10 月 25 日。



# 15. 毛泽东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统一战线理论的历史贡献

对 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的顺利完成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崭新的社会形态是建立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是在彻底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之后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全新的社会形态。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变了，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相应，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也有了根本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赖以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其性质、作用、形式等又该是如何呢？对此，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伊始，就进行了认真的理论探索。

## 一、对新的社会形态及其阶级关系的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逐步掀起，国内各种阶级力量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已露端倪。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原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下的那部分雇佣工人，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始和完成，摆脱了旧的雇佣地位，与国营和集体企业的工人一样，不仅成为国家的主人，而且也成为企业的主人，这样，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

领导力量，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得到大大地加强；其二，广大个体农民经过农业合作化已经成为集体化的农民，他们与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的工农联盟，更加牢不可破；其三，广大知识分子的服务对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建国七年来，他们的思想面貌也有了质的转变，他们绝大多数人已经是国家或公有制企业的工作人员，因此，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四，各少数民族地区大都进行了民主改革，有一些还走上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关系更加亲密。

毛泽东比较早地感受到了这些深刻的变化，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sup>①</sup>等讲话、著作中，对上述变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阐述了一系列精辟的观点。

毛泽东首先是从经济关系入手，分析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他指出：三大改造完成后，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只是刚刚建立，并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毛泽东认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在各经济部门的生产和交换关系之间，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积累与消费的分配等方面都存在有许多问题，有待完善和解决；此外，资产阶级意识形

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毛泽东把当时刚刚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这种状况，作为分析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及一切其他问题的基本依据。接着，毛泽东进一步具体地分析了在新的社会形态下各阶级、各阶层和各群体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

关于工人阶级，毛泽东指出，“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也得到大大地加强；同时，他又指出：“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关于农民，毛泽东认为：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之间的大矛盾。他说，占农村人口70%以上的贫农和下中农是积极拥护合作社的，其余的大多数人也对合作社寄予希望，真正不满意的只是极少数；由于实行合作化的时间还很短，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与合作社之间，都有一些矛盾要解决。“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上述矛盾”，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毛泽东特别强调：国家与工厂、工人，国家与合作社、农民，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于工商业者和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指出，通过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

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工商业者是愿意学习的，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因此，还有一个继续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他们应该在自愿的基础上经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关于知识分子，毛泽东指出，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的问题；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的七年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在这里，毛泽东既充分肯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发生的根本性进步，同时也充分估计到了历史的惯性运动，特别是充分估计到了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他指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有鉴于此，毛泽东指出：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这就使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他还认为，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

基于上述分析，毛泽东得出了四点重要的结论：

一是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形势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即“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

二是对完成三大改造后党和国家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即“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他进而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提出了“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伟大任务。

三是确定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指出：“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

四是正确解决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敌、我、友的问题，并确定了具体的策略。毛泽东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具体来说，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

毛泽东对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的阶级和阶级关系的科学分析及其所得出的重要结论，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基础，明确了这个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方向和任务，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又一个新的贡献。

## 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

1956年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再存在，小资产阶级也已经接受了改造，其成员都已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知识分子从总体上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各民主党派的阶级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了适应新形势，各民主党派在1956年先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党章党纲，都分别提出了“为将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行动纲领，提出了“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总方针，走上了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新道路。各民主党派的性质也转变为继续联系并代表原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以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为主体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认为，民主党派失去了阶级基础，完成了历史使命，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毛泽东认真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和各民主党派的历史性变化，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经验，他们从“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个总任务出发，提出并确定了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战略方针。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正式提出了这一方针。

毛泽东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我国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sup>(2)</sup>讲话中，毛泽东还提出了“两个万岁”的思想：“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随后，毛泽东在《正处》一文中，对这八字方做了更全面的阐述，他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的提出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他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sup>(3)</sup>

可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时共产党提出的处理党际关系的方针。这一方针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的客观实际，既符合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也符合我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和需要。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势必使整个社会的政治力量发生新变化，党派之间的关系也会面临着如何适应形势变化的问题。八字方针的提出，解决了如何调整和发展新形势下党派关系的问题。长期共存，是指民主党派在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共产党存在多久，民主党派也存在多久，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长期合作中共存，同呼吸，共命运，只要共产党存在，就要坚持党与非党的合作，坚持统一战线。互相监督，是指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互为监督，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制定这样的方针，是基于对当时客观事实的正确分析。共产党与民主党派

长期共存，除了历史上的原因外，他们有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那就是真正为人民做好事；他们有长期共存的客观依据，那就是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着不同的阶层。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互相监督，是共产党避免发生错误或少发生错误的需要，是保证民主党派始终站在人民一边的政治需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明确地回答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即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这种体制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也不同于当时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单一政党执政的政治体制。“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不仅进一步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理论，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澄清了人们对各民主党派作用的模糊认识，扩大了人民民主，鼓舞并调动了广大民主党派成员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热情，从而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处理与民主党派关系的政策基础，后来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又在这八字的基础上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

### 三、两类矛盾学说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指导意义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毛泽东最重要的理论创造之一是科学地提出并论证了关于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思想。这一理论创造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辩证法，为我们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制定各项行之有效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其中，它对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指导意义尤为突出。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会有什么性质的矛盾，对此问题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由于受社会实践的局限，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直接探讨不多。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分析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论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等问题，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同农民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和官僚主义的矛盾等作过一些具体的分析和研究，他指出：“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结束，矛盾仍将存在。”<sup>(4)</sup>列宁的这一重要观点，可以说是后来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出发点，可惜，列宁本人没有机会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对苏联当时存在的矛盾也做过分析。他说：“我国有两种矛盾。一种矛盾是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种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sup>(5)</sup>但是，他在这里讲的两种矛盾还只是从国家的内外来分的。1936年苏联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以后，斯大林就否认内部还有矛盾，如果有矛盾，根子也在帝国主义。他认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一致，各族人民的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他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状况“完全一致”的观点，更为其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的认识提供了哲学依据。基于上述认识，当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歧异和争论时，斯大林往往是从外部环境中找根源，在许多问题上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犯了肃反扩大化等严重错误。

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是十分敏锐和审慎的。随着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逐渐为全面开展起来的经济建设高潮所替代，显现在毛泽

东和他的战友们面前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新中国成立前夜，毛泽东就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和随后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地指出：要分清人民和反动派的界限，对反动派要实行专政，对人民内部要实行民主。我们不能说从那个时候起，毛泽东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已经从理论上有了明确的认识，应该说当时他主要是从政策方面提出这个问题的。毛泽东真正在理论上认真探讨这个问题，是从1955年逐步展开的。

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的逐步完成，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也把党和国家及其各级机构摆在了一个新的位置上。过去发生学生游行和工人罢工，那是由旧的经济关系造成的，处置起来游刃有余；现在不同了，党和国家本身成为矛盾的一个方面，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矛盾，就成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在1956年国际共运中也发生了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这使毛泽东等进一步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也同样会激化，从而使他们感到了解决好这一问题的急迫性。

毛泽东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着矛盾。他在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亲笔加写了这样一段话：“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有矛盾存在了。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也不同，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技术革命和社会制度革新的现象，都将是必然要继续发生的，否则，社会的发展就将停止下来，社会就不可能再

前进了。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远得多少倍。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一切都还将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与斗争学说的提出，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与斗争的形而上学观点，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不过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它依然存在着各种矛盾与斗争，并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前进。这一观点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它不仅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找到了一把钥匙，而且也是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几乎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的同时，4月25日，毛泽东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更深入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的各种矛盾与斗争。他指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毛泽东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普遍意义的十大矛盾，提出了许多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并为全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问题带了一个好头。12月4日，毛泽东在致黄炎培的信中进一步指出：“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sup>⑥</sup>他在信中提出了两种解决矛盾的方法：一种是对敌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这里，毛泽东开始涉及矛盾的性质问题。接着，他又在《人民日报》12月29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再论无产

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增写了这样一段话：“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的意见和错误的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团结。”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同时也指出了由于矛盾的性质不同，处理方式也不同。它解决了十月革命胜利后四十年间苏联仍没有解决的问题，对于防止和纠正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从“左”和右两个方面无视或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弊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毛泽东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尚未充分展开，比如尚未谈到两类矛盾的地位与主次关系等。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学说创立的，是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长篇报告，这篇报告于同年6月19日正式发表。

《正处》一文在科学地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处理敌我矛盾和革命队伍内部关系的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在生产

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状况，以及所面临的总任务出发，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全面、系统、深刻地阐发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社会基本矛盾，以及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可以说，它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一把总钥匙。它对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指导意义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第一，明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目标与战略方针。毛泽东认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他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也就是发展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指出：“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新国家的战略任务和统筹兼顾的战略方针，从根本上扩大了人们的眼界，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

第二，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并作出了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的判断，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对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中国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正确的估量。一方面，他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少国家的共产党出现的不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讲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丑化党的领导，

从而导致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等情况，实事求是地作出“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的判断；同时，他又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一基本情况，得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正确结论。基于上述判断，毛泽东进而提出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重要命题，并指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这样就从理论上划清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为防止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防止犯“左”倾或右倾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毛泽东还根据中国的实际，对人民内部矛盾作了具体的分析和限定。他指出：“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认为，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尤为宝贵的是，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问题。他认为，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非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不当，比如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如果“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么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

线指明了方向。

第三，提出了统一战线内部处理各项矛盾的根本原则和方法。毛泽东认为，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对前者我们实行专政的方法；对后者则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解决。毛泽东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鉴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在《正处》中还提出了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判别人们言论和行动的是非的六条标准。他说：“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1）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2）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3）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4）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5）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6）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在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上述六条标准实际上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政治基础，也就是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在《正处》中，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许多根本性的指导思想，明确了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方向、任务、方针和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理论，也丰

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对中国的统一战线事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 注：

(1) 这一节的引文，凡是未再注明出处的，均引自《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所载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文。

(2)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 年 4 月 25 日。

(3)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 年 2 月 27 日。

(4)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 1976 版，第 12 页。

(5) 《斯大林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 1955 版，第 91 页。

(6)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14 页。

## 16. 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及其历史局限

开放，是人类广泛存在的社会联系的客观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最本质精神的体现。马克思主义认为，客观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和不断发展的，这就要求人的主观认识对客观世界的开放也必须是彻底的开放，即向客观世界无限发展的空间和时间开放。因此，我们说彻底的开放观是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必须具有的基本素质。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也具有彻底的开放观。抽象地说，他的开放观主要表现在向新事物开放和向现实开放（即理论联系实际）两个方面。具体来说，则体现在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伟大实践的全过程。本文简要叙述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及其历史局限。

—

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是坚决主张独立自主的，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对外开放思想。偶尔有一些有关的言论，也是零碎的，不成系统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事实上，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已经有了中国和世界密不可分的观点，从而立志“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目的”。以后，他多次论述对外开放问题，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作

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曾经集中地阐述过对外开放的思想。这主要是：

第一，关于对外开放的必要性。毛泽东从两个方面提出这个问题。一是他认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当时中国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而要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需要三个必要条件，即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和全世界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国家的联盟以及日本本国人民的觉悟。毛泽东在1936年7月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指出：日本的侵略矛头不仅指向中国，而且危及一切在太平洋地区有利害关系的国家，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他主张同美、英、法、苏及一切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国家建立世界联盟。二是毛泽东认为中国应该对全世界有伟大的贡献。可现实的中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他指出：中国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但“她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之低，不能再进一步压低来提供所需的资本”。因此，“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sup>①</sup>他多次表示欢迎外国投资。毛泽东坚信：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把他们巨大的潜在的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够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世界文化水准，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对全世界将有伟大的贡献。<sup>②</sup>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认识，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sup>③</sup>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从基本出发点的高度论述了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必要性。

第二，关于吸收和学习外来文化的方针。毛泽东认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做得很不够。

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sup>(4)</sup>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吸收古今中外一切进步文化的重要思想。但同时，毛泽东还强调这种吸收必须是有批判、有分析的吸收，要去其糟粕，收其精华。他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主张和那种形式主义的只学其皮毛的“吸收”。毛泽东对待外来文化的这种观点，在他稍后一个时期的整风报告和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谈话中又曾反复阐述过，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问题上的一个基本方针。

第三，关于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的原则。毛泽东认为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他在强调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需要有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和日本本国人民的觉悟的同时，特别指出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决定抗日战争胜负的关键。他在向斯诺表示苏维埃欢迎外国投资的谈话中也曾郑重声明：我们欢迎用于建设目的的外债。但是，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对影响中国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sup>(5)</sup>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是贯穿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各个方面的一个基本原则。

第四，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这包括政治上，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思想；军事上，关于更新和补充武器装备，同反战国家合作抗日的思想；文化上，关于吸收外国进步文化的思想等等。就其在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思想来说，其一，毛泽东主张开展大规模的对外贸易。他认为中国人民一旦真正获得国家的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因为“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sup>(6)</sup>因此，毛泽东主动“对外和平通商，订立互利的协

定”。<sup>(7)</sup>其二，“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就明确了要引进“大量外资”以“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的思想。他主张对于来华、在华的外国私人资本，“一定要给予自由的广泛发展的机会。”<sup>(8)</sup>因为毛泽东深知，中国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个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sup>(9)</sup>所以，应允许外国人来华经商、开矿和办厂。1946年6月3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中曾经明确地规定：在避免受垄断控制和政治攻击的前提下，“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合作来经营厂矿。”<sup>(10)</sup>

可见，这个时期毛泽东关于对外开放的思想并非是一时的偶发奇想，而是从抗日战争爆发前夜到抗战胜利后这十多年间反复论述的，是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这些思想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既有关于对外开放的必要性、方针、原则等的宏观论述，又有就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合作办厂等具体政策的探讨。毛泽东甚至还对战后中国最适宜与之进行经济合作的国家做了选择。十分难能的是，毛泽东虽然一直认定社会主义苏联是中国最可靠的政治盟邦，但在选择经济合作国家这个问题上却能不受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束缚，而是依据具体的国际环境，认为“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合宜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sup>(11)</sup>这也从侧面体现了毛泽东当时思想的开放程度。尽管由于受当时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共阶级矛盾的制约，毛泽东的上述对外开放思想，特别是关于对外实行经济开放的那些主张，基本上未能实行。但是，这些光辉思想反映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和博大胸怀。这些思想在党的“七大”上得到了全党的认同。

## 二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只限于建国前，新中国建立后他在这方面不仅没有发展，反而连解放前的一些很宝贵的思想也都抛弃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也是不确切的。事实上，建国后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在新形下有了大大的发展，并部分地付诸实践。且不论那些属于具体政策性的诸多主张，单从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著作中阐述的向外国学习的思想中，我们就可窥略他的这一思想发展的轨迹。

首先，毛泽东从调动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一切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方针着眼，郑重地提出向外国学习的问题。他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这就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理论上深化了向外国学习的必要性。

其次，关于向外国学习的对象和学习的内容。毛泽东针对建国初期存在的只注意向苏联学习建设经验的偏向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他认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

进我们的工作。”毛泽东这种“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的方针，是他抗战时期“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要吸收”的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并且更加全面和准确。

再次，关于向外国学习的长期性。虽然在抗战前夜和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就曾展望过战后中国的对外开放问题，但非常明确地提出向外国学习的长期性，则是1956年。他说：“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

此外，关于向外国学习的方法。毛泽东把他一贯倡导的理论向现实开放的观点运用于向外国学习问题。提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认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入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因此，要求我们在“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收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学习和引进外国的东西，要注重发展和创新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因为“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如果我们学习和引进外国的东西，不加以发展和创新，就会永远落在别人的后面，所以，他提出：“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

总之，毛泽东在我国进入开始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条件下，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出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一切长处的重要思想，并在新的起点上予以深入的阐述。这些思想不仅发展了他在抗战时期论述的对外开放思想，而且为当时刚刚迈进社会主义大门的亿万中国人民指明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尽管在以后的

历史发展中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曲折与失误，但是，中国人民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率领下，再一次进入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以后，正是以毛泽东上述思想的基本点为指导，揭开了古老的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序幕的。

### 三

无须讳言，毛泽东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毛泽东虽然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又比较系统地提出对外开放思想的领导人，但在新中国建立后，具备了实行对外开放战略的可能性时，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我国对外开放的步子并没有真正迈开。如果说在建国初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毛泽东领导实行了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开放的话，那么，在那以后，中国的大门不仅对西方国家，而且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封闭着的。

二是理论本身也不完善。毛泽东关于对外开放理论的阐述，有一个特点，即一般性的理论论述多而针对性的具体政策少。由于缺乏实践，造成其微观政策与宏观理论不配套，有些甚至是不谐调或相矛盾。此外，还有一些应该涉及的重大问题，没有论述或语焉不详。

三是毛泽东虽然比较充分地阐明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辩证关系，但在实际操作中则强调独立自主强于实行对外开放。似乎有些把“自力更生为主”绝对化，而视“争取外援为辅”为可有可无。

所以出现上述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条件的限制，又有毛泽东主观认识上的问题。但第一位的起主要作用的，则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长期经济封锁、政治和军事敌视。加上 50 年代末中

苏关系的破裂，就进一步使得中国被迫与世界隔离开来。正如邓小平所说：

“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sup>⑫</sup>

但是在另一方面，邓小平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还有一些‘左’的政策，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灾难，特别文化大革命。”<sup>⑬</sup>单就毛泽东个人的主观原因分析，我们觉得有以下几点：

其一，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是在长期的战乱、割离和封锁中顽强地表现出来的。这一方面反映出毛泽东那种打破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封锁，走向世界的百折不挠精神，因而使我们愈加感到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之难能可贵。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特殊的历史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毛泽东的视野，影响了他对对外开放思想的深入。毛泽东虽然也十分关注国际问题，但他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上，对经济问题、科技问题则缺乏深入周密的考察。

其二，一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的毛泽东，深知胜利的来之不易，也更晓得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任务之严峻和艰巨。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顶住巨大的压力，坚决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但是，有时他却把国际间一些平等互利的正常经济文化往来也不适当地同主权问题联系在一起而加以反对。与此相联系，毛泽东针对帝国主义及其他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封锁和轻蔑态度，领导中国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伟大成就。这使毛泽东产生了“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的豪迈感。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虽然是有的放矢，并

永远是激励我们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但与此相关的另一种倾向，则导致毛泽东减弱了对对外开放问题的重视程度。

其三，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毛泽东虽然力主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但仍不能完全避免对马列经典著作中某些观点的教条化理解。以至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过程中，把一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方法、手段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拒绝。而将经典作家的某些构想（以后实践证明是一些不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和手段）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加以固守，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发展，从而束缚了新中国对外开放的手脚。

其四，还必须看到毛泽东晚年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错误，给对外开放事业带来的严重障碍。因为在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看来，之所以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不外是由于国内被打倒的剥削阶级人还在、心不死和国外的各种敌对势力时刻企图颠覆我们。以这种观点为指导，是不可能正常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是造成毛泽东 1957 年后在对外开放问题上停滞不前的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尽管毛泽东在对外开放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首倡者作用，也不能不看到毛泽东对此问题的许多有益的理论创造及其现实意义。特别是我们必须正视毛泽东为使新中国冲破外界的封锁，为世界所接纳而进行的一次次顽强努力。邓小平曾多次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在这方面的伟大功勋。他说：“毛泽东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

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sup>(4)</sup>“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sup>(5)</sup>

## 注：

(1) 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年版，第 327、260 页。

(2) (5) (6) 《毛泽东 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9 页。

(3)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战士出版社 1981 年 12 月版，第 190～191 页。

(4)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706～707 页。

(7) 毛泽东，《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1938 年 7 月 2 日），参见《解放》周刊第 45 期。

(8) 1944 年 7 月 14 日毛泽东与根·斯坦因的谈话，参见《毛泽东印象记》，东北书店 1947 年版，第 26 页。

(9)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参见《解放日报》1945 年 5 月 2 日。

(10) 《党的文献》1991 年第 2 期。

(11)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谢伟思的六次谈话》，参见《党史通讯》1983 年第 20、21 期合刊。

(12) (14) (1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7、160、172 页。

(13)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第 2 版，第 54 页。

## 17. 口述史料：毛泽东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

众所周知，毛泽东仍然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着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但是，他毕竟已经成为历史人物。研究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和思想，当然需要方法论性质的理论指导，以及相应的历史背景知识和相关的专业知识。而更重要的则是档案性质的历史文献，如被研究对象的文章、著作，记录或反映其言行与思想的原始文献、电报、会议记录、日记（包括录音和影像资料）等。此外，在不同阶段不同程度地亲历或目睹被研究对象生活经历者的相关回忆与访谈，也是研究历史人物的第一手材料。

关于毛泽东的回忆录和回忆文章，首推他本人在1936年9月底至10月上旬，应斯诺的一再要求，与斯诺谈的他个人的生平，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他1936年以前的生活经历。后来出版的以“毛泽东自传”或“毛泽东自述”冠名的各种书籍，大多就是在斯诺根据这些谈话写作发表的书籍和文章的基础上，编译而成的。这是所有关于毛泽东的访谈和回忆中最权威也最具影响力的口述史料。据当时为毛泽东和斯诺做翻译的吴亮平后来说，毛泽东当时曾亲自审读过斯诺英文记录的中文译稿。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将其归入档案文献一类。事实上，也正如斯诺所记述的那样，毛泽东谈着、谈着，就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

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斯诺记录下来的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生平，而主要是毛泽东所经历的中共党史，特别是对他刚刚领导的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得尤其细致。

第二者对毛泽东生平的回忆，最早的是陈云化名“廉臣”于1935年秋写成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其中记述毛泽东在长征中若干活动的片段。该文首先发表于中国共产党1936年在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同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1937年7月30日的巴黎《救国时报》再次发表此文。目前所知，国内最早印行此文的是1937年3月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印行的《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一书，全文收入了此稿。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关于毛泽东生平的回忆性文章逐渐增多。1940年7月延安出版的《中国青年》第2卷第9期开辟“记毛泽东同志”专栏，发表了谢觉哉的《几个片段》、谭政的《三湾改编》、徐特立的《毛主席的实际精神》等文章。1941年12月14日，萧三在《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同志的少年时代》一文。此后，他又陆续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毛泽东同志在大革命时代》、《毛泽东同志的儿童时代》、《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和《毛泽东略传》，并于1949年8月由新华书店出版其《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一书（该书在建国后又几次以相近的书名增订、再版）。萧三是毛泽东在东山学堂和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他的文章和书籍，既有他对毛泽东青少年时代活动的回忆，又融入有他对毛泽东生平的研究。萧三后来在其书稿的序言中写道：他在延安曾遍访同毛泽东有过交往的老同

志，将他们所知记录下来，“笔之于书”。此外，还有一些曾经到延安访问过毛泽东的中外记者和各界人士，他们离开后撰写发表的毛泽东访谈录。如1945年10月，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在国讯书店出版的《延安归来》，记述了毛泽东关于用“民主”解决历朝历代兴亡周期率问题的“窑洞对”。

新中国建立后到“文革”前，回忆毛泽东的文章和著作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毛泽东的老同学周世钊、萧三等回忆青少年时期毛泽东的文章与书稿。如周世钊在《新观察》1951年第2卷第2期发表的《第一师范时代的毛主席》、在《新体育》上发表的《毛主席锻炼身体的故事》、在1959年8月12日《工人日报》上发表的《毛泽东青年时期刻苦学习二三事》、在1959年4月16日《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湘江的怒吼——五四前后毛泽东在湖南的革命活动》等，他后来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写成《毛主席青年时期的故事》一书，由中国少儿出版社出版。二是《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书刊中发表的一批反映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回忆文章，如刘伯承的《回顾长征》、徐海东的《“奠基礼”》、曹丹辉的《伟大的历程——跟毛主席从江西到陕北》和方强的《毛主席到南线的一件史实》等等。三是毛泽东的警卫员、医生等写的回忆录和回忆文章。如翟作军的《在毛主席身边》（湖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6月版）、蒋泰峰的《在毛主席周围》（解放军出版社1958年4月版，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7月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5月版）、傅连璋的《在毛主席教导下》（作家出版社1959年4月版）、陈昌奉的《跟随毛主席长征》（作家出版社1958年9月版）等。此外，各出版社在这一时期还编辑出版了几十种反映建国后毛泽东在各地视察情况的书籍（相关文章就更多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在群众中》（一、二），分别出版于1958年4月和7月。虽然从严格

的意义讲，这类书籍属于通讯、报道之类，但可以作为回忆性史料使用。

“文革”时期有大量歌颂、回忆性文章和书籍涌现。透过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的溢美之词（甚至是不乏夸大毛泽东作用的不实之词），这些文稿仍给研究者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和史实，供后人去研究、考订。

毛泽东逝世之后的30多年来，在解放思想和真理标准讨论的推动下，特别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之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出现空前的繁荣。与之相应，各种缅怀回忆毛泽东的文章和书稿如井喷一样涌现。单以在各个时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员为例（有些后来曾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发表单篇文章不计，粗略估算下来出版过回忆录的就不下三十人，如吴吉清、阎长林、贺清华、龙飞虎、叶子龙、汪东兴、逢先知、李银桥、韩桂馨、张耀祠、高智、邬吉成、齐吉树、武象廷、蒋泽民、高富有、李家骥、沈同、李树槐、王鹤滨、林克、徐涛、吴旭君、李越然、师哲、陈长江、阎明复、王海容、孟锦云、杜修贤、章含之、周福明等等。最近听说曾经任毛泽东的副卫士长，以后长期在邓小平身边工作，担任过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孙勇也撰写了回忆录，即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而他过去是坚持不接受任何采访，连中央文献研究室为工作事采访他也都拒绝了。这一时期相关回忆性作品的出版情况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从毛泽东逝世到1983年12月毛泽东诞辰90周年），主要是纪念性的回忆录或怀念文集，当时几乎每个省的人民出版社都出版有专门的纪念文集。最有代表性的是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出版的《伟大的历程》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9月出版的《回忆毛主席》等。此后十年间（即第二阶段，1983～1993年），以《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为代表，出版了一批关于毛泽东的纪实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依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

参考了相关历史背景，融入了作者的文学创作。虽然史料价值不高，但迎合了广大群众学习毛泽东、了解毛泽东的强烈愿望，推动了口述史学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领导干部终身制的被废除，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干部退居二线，或者离休，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入撰写和出版回忆录，这是新时期口述史学出现空前繁荣的基本条件。他们的回忆录虽然不一定是专门回忆毛泽东的，但因为毛泽东是这批老革命家的领军人物，自然成为他们主要的回忆对象。第三阶段，1993～1999年建国五十周年。这是回忆毛泽东出版物的高峰期。称这一段为高峰期，一则是因为数量多，二则是因为相对于前两个阶段普遍的档次要高（回忆录作者的身份、参与事件的重要性、写作水平），相应的其史料价值也比较高。第四阶段是2000年至今。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回忆毛泽东的原创性作品逐渐减少，代之而起的是根据已出版的回忆录或回忆文章，重新编纂组合的东西。这些作品虽然有可读性，但价值不大。

毛泽东逝世后三十多年来出版和发表的回忆性作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全方位系统地回忆毛泽东人生阅历的方方面面，既有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的活动情况，又有毛泽东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建树，以及过去很少提及的他个人生活起居、禀性、家庭、亲友交往等方面情况的记述。二是回忆的内容不再只是歌颂性的记述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从本时期的第二阶段开始，在继续以正面赞颂的内容为主的同时，在一些回忆文章和回忆录中逐渐出现一些客观记述毛泽东在某些决策或事件中失误的内容，甚至在个别回忆中还有对毛泽东的指责。三是融研究于回忆。不少回忆录的作者通过撰写回忆录来研究亲身经历的历史，他们大多查阅了档案和历史文献，在还原历史的基础上加入自己对历史的记忆。因此，

他们的作品更为准确可靠，而且富于理性分析，既保持了回忆录生动传神的特点，又兼具史学著作的严谨。如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汪东兴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吴冷西的《回忆毛主席》、师哲的《在历史巨人身边》、逢先知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和《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以及由徐涛、吴旭君、林克署名的《历史的真实》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时期的回忆录，有不少是在作者原工作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或是在一些文史工作者的热情帮助下完成的。这对于推动回忆录的撰写与出版、对于抢救口述历史、对于提高回忆录的质量，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之下，也有一些文史工作者在帮助老同志整理回忆录的过程中，过多地加入自己的创作和对一般历史背景冗长的描述，致使一些作品的水分太多，良莠不齐，甚至是使一些回忆录的内容让人真伪难辨。在这种情况下，加上书价昂贵和工作节奏紧凑，有不少读者，特别是搞研究的同志，宁愿去看一些有价值的单篇的回忆文章。这三十多年间公开发表的纪念或回忆毛泽东的单篇文章多不胜数。这里想介绍两种回忆文集。

在新时期诸多回忆毛泽东文集中，最有权威性和史料价值的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组织编写的《缅怀毛泽东》。这件工作是从 1990 年开始立项启动的，当时向 200 多位与毛泽东有过较多交往的老同志发函约稿，有些重点稿件是由文献研究室派人登门采访后根据录音整理并经本人审定。最后从 100 多篇稿件中，精选出 88 篇 95 万字的文章，分别于 1993 年 7 月和 12 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分上、下册出版。这些文章的作者大多曾在党政军部门担任过省部级以上领导职务（有几位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除外），绝大多数的文章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些文章洗尽了个人崇拜的铅华，凝聚着老人们深邃的理性思考，也透露出他们对

毛泽东的浓浓深情，真实地记述了与毛泽东在重大历史时刻的重要交往。其中有不少文章是老人们的封笔之作，可以说是回忆毛泽东的世纪绝唱。

另一项重要的抢救性行动是1992年7月，由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和《博览群书》杂志等单位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联合发起的全国性的“毛泽东与我”征文活动。自发参加征文的既有张爱萍、韩光、李德生、赛福鼎、陈士榘、孙毅、廖志高、袁宝华、张承先、刘道生、方志纯、李立、曾志、欧阳平、钱江、袁血卒、铁瑛、戴镜元、贺晋年等几十位老一辈革命家，又有臧克家、侯宝林、华君武、金善宝（时年98岁，小麦专家、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董加耕、竹内实（日本毛泽东研究专家）等各界知名人士，还有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和社会各界与毛泽东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的同志。征文组委会和评委会从数以千计的应征文章中精选出306篇文章共140万字编辑为《毛泽东与我》丛书，分六册，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11月出版。这六册书分别是：《我与毛泽东的交往》收入的是与毛泽东有过较多交往的老同志的文章；《在毛泽东身边》则是用历年来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人员的文章编成的；《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是曾经陪同毛泽东外出视察或是在当地参与接待毛泽东的同志写的文章；《我见到了毛主席》记述的是普通群众偶然有机会见到毛泽东时的场景和感受；《毛泽东人际交往侧记》是第三者记录他的亲友、领导等与毛泽东交往的情况；《毛主席的光辉》收录的是一组劳模、知青等在毛泽东人格魅力和思想感召下扎根边疆基层艰苦奋斗的生动故事。由这次征文活动的民间性质所决定，这套丛书既有研究毛泽东的史料价值，又具社会心理调查报告的功能。所有文章都朴实无华，亲切感人，如同一幅幅农民画，把读者带回了那个时代，带到了毛泽东的身边。

毛泽东逝世已经三十多年了。自他去世之日起，毛泽东的文档资料已经结稿。这些档案由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分类整理保存（其中一部分仍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保管），只是什么时间解密和用什么形式公布的问题了（事实上，除会议记录和少量文稿外，绝大多数的文稿，包括毛泽东手书的讲话提纲都已经公开发表，即使是用内部发表名义印行的，研究者也不难找到）。现在，和毛泽东一同打天下或是建国后能够和毛泽东共商国是的老同志，健在者已是凤毛麟角；即使是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也大多已步入高龄。亲历者回忆毛泽东的工作事实上已进入尾声。但是，研究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事业，方兴未艾。对于众多的学者和一般的研究单位而言，在整理搜集关于毛泽东的文献资料工作方面，目前可以做的也是应该着手做的，就是将1935年至今所有关于毛泽东的口述史料汇总起来，删除重复的（大量存在着同一作者对同一事件在多篇文章中提及，或是一篇文章发表多次的情况），对其中涉及的人物、时间、地点和事件经过等逐一进行认真的考订（用加注释的办法，把不同的考证结果标注在相关材料之后），然后根据毛泽东的生平，按时间、分类编成资料长篇，公开出版（同时出版电子文本）。这样，将会对深化毛泽东生平、著作和思想的研究产生积极而深远的推动作用。

## 18. 毛泽东最后的日子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毛泽东，也无法背离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78岁高龄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领导了对林彪集团的揭批查工作。精神上的打击和极度的劳累，使毛泽东的身体骤然衰老。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只在睡衣外套了件大衣就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结果着凉感冒引起了肺炎。就在那次追悼会结束时，在场的一位医生注意到，毛泽东在上汽车时几次想抬腿都未能蹬上汽车，最后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上了车。同年2月12日凌晨，毛泽东由于肺心病加重和严重缺氧，突然休克，心脏也已经停止跳动。得亏大夫胡旭东、吴洁立和护士长吴旭君、俞雅菊等及时抢救，才缓了过来。闻讯从西花厅驱车赶到毛泽东住所的周恩来，却许久迈不开要下车的腿：如果抢救失败，后果不堪设想。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毛泽东重病脱险后的第九天。他的脚肿得很厉害，过去的鞋已经穿不进去了。为了准备会见尼克松，工作人员事先特地画了脚样，定做了两双肥大的圆口黑布鞋。尼克松抵京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就在住地会见了尼克松、基辛格等人。当客人进门时，工作人员搀扶着身体虚弱的毛泽东站起来，向客人们致以问候。毛泽东为自己已不能用十分清晰的语言流利地表达意思向客人表示道歉。周恩来向客人解释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

而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却判断：“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尼克松有所不知的是，毛泽东的病情实际比他的判断还要严重得多，书房的屏风后放置的就是应急抢救的医疗设备，医护人员正在隔壁的房间内待命。原定这次会见只是礼节性的15分钟，实际却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延长到了一个小时零五分钟。在会谈中毛泽东是那样的机敏，但会谈一结束，疲惫的他却不得不在沙发上静坐了30分钟，随后即卧床休息。也许有心人会注意到有关这次会见的报道中没有出现“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一类的用词。在这以后，毛泽东讲话越来越困难，到最后一年时间里，只有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才能听懂（有时是根据口形猜测）。他在与人谈话时需要工作人员逐句“翻译”。

1973年8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十大”。帷幕拉开之前，他是由工作人员搀扶到主席台的座位上。会议结束时，他是等全体代表退席后才让工作人员扶走的。所以，在“十大”的新闻纪录片中，既没有毛泽东入场的镜头，也没有他退场的镜头。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自1974年初开始，毛泽东的视力严重下降，看东西模糊吃力。他不得不借助工作人员帮助他读书、读报、读文件。这对一生都手不释卷的毛泽东，无疑是件很痛苦的事。同年8月，医生为毛泽东检查眼睛，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这种病没有快速治疗的办法，需要经过几个病理时期才能采取手术措施。这一情况，除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外，只有负责领导毛泽东医疗组工作的周恩来、汪东兴等几个人知道。在长达600多个昼夜的漫长时间里，毛泽东默默地承受着几乎完全失明的煎熬。但他从不给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以沉闷的表情，相反，在与人接触时，他总是以幽默风趣的谈话来解除别人的担忧、紧张和顾虑。1975年春节前后，几位眼科专家到杭州毛泽东的

住所，为他会诊。当他与其中一位专家握手并询问得知他的名字叫唐由之时，立即说道：“这个名字好，你的父亲一定是位读书人，他可能读了鲁迅先生的诗，为你取了个‘由之’的名字。”接着，他便背诵起鲁迅悼杨杏佛的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此时，毛泽东已82岁，虽然双目失明，讲话费力，但吟咏起诗来却依然富有感情，并且一字不差，令在场的专家惊讶再三。同年秋，唐由之主刀，为毛泽东的左眼作拨除白内障手术。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找来弹词《满江红》的录音带，静听着激昂的乐曲由医生做了手术。手术只用了7分钟，非常成功。周恩来、汪东兴等一直在手术室外的大厅守候。毛泽东在左眼复明后，不顾医生让他少看书的劝告，除批阅大量的文件外，还看了大量的书籍，如二十四史中的有些篇目、鲁迅的杂文，以及《考古学报》、《历史研究》、《自然辩证法》等报刊。他甚至还提出为他印大字本的《化石》杂志和《动物学》杂志的要求。

眼睛的复明并不能阻止毛泽东健康状况的继续恶化。但如同克服失明的困难一样，毛泽东顽强地同疾病做斗争。一方面，他竭力忍受治疗中的痛苦，配合医生治疗，特别是以极大的毅力，在年过八旬的时候戒了抽了一辈子的纸烟；另一方面，始终保持着乐观主义的情绪，进行力所能及的运动。1975年，他在长沙期间，还先后五次到湖南省游泳馆游泳，每次达半个小时。三〇一医院的专家姜泗长曾感慨地讲：“我行医40年，给成千上万的人看过病，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在和疾病的折磨作斗争中，有谁像主席这样有着如此坚强的毅力和乐观主义的精神。”

1976年1月8日，毛泽东闻知周恩来逝世的噩耗，许久一言未发。周恩来的病况，毛泽东是十分清楚的，离别是不可避免的。疾病的缠绕使两

位伟人没有能够见上最后一面，毛泽东无力再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他吃力地拍着腿对身边工作人员张玉凤说：“我也走不动了。”他只能无奈地在中共中央关于周恩来的治丧报告上重重地画了个圈。

1976年春节，工作人员一勺一勺地给毛泽东喂年夜饭。这时，他连“饭来张口”也很艰难了，他只吃了几口米饭和一点武昌鱼肉。春节期间他看了电影《难忘的战斗》。据吴旭君回忆，当银幕出现人民群众热烈欢庆解放、迎接解放军进城的镜头时，毛泽东禁不住老泪纵横，电影也看不下去了。虽然毛泽东生活已经不能自理，甚至说话也很费劲了，但他的头脑依然十分清楚，依然全身心地为国事操劳。由于长期卧床，为了侧卧时看书批阅文件方便，工作人员为他配了单腿的眼镜。后来连举文件的力气也没有了，他就让工作人员帮他举着书和文件来阅读。5月27日，他坚持在书房里会见了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6月初，毛泽东的心脏病再度发作。经过全力抢救，才又平缓下来。这时他已完全不能自己进食，就是流食也难咽下去。医护人员为他下了鼻饲。毛泽东躺在床上动不了了，鼻子上同时插着氧气和鼻饲两根管。但他仍然没有停止过工作。从1959年起开始为他作内勤和卫士的周福明回忆：“我时常看到在疾病的折磨下，主席是那樣的痛苦。肺心病常常导致他在严重地缺氧，嘴唇发紫，浑身全是汗淋淋地，举书的手时间长了也抖个不停。”

7月28日，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北京也受到波及。病中的毛泽东被担架搬进了游泳池边上的新居“二〇二”。当时毛泽东已服用了安眠药，醒来后他执意要求搬回游泳池的旧居去。最后由华国锋亲自做工作说，等地震平稳下来，主席身体好些再回去。毛泽东十分关心震情和灾区人民。送来的震情汇报，他都亲自过问。当他听说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

损失时，止不住热泪涌流。8月4日，毛泽东派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赶赴灾区。《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抗震救灾的通报》是他生前批发的最后一份文件。不久，毛泽东的心脏病又一次发作。8月26日，危病中的毛泽东似乎不知道生命的终结将要到来，又向工作人员索要了南宋洪迈撰写的《容斋随笔》。这是他比较喜欢读的一本书，也是他向工作人员要的最后一本书。

9月2日，毛泽东的病情恶化。9月5日，病危。9月8日，毛泽东进入弥留状态。即使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仍以超人的毅力，顽强地同死神抗争。由林克、徐涛和吴旭君署名的《历史的真实》一书，披露了毛泽东临终前一天的护理记录：

1976年9月8日

零时零分体温 36.9℃，脉搏 103 次 / 分，呼吸 21 次 / 分，血压 170/80 (mmHg)。看文件 14 分。按摩双下肢，腹部人工辅助呼吸，有些微汗，生理盐水喷口腔六下。

零时 50 分呼吸 24 次 / 分。看文件 10 分 30 秒。辅助人工呼吸，按摩下肢。

1 时 10 分看文件 15 分 30 秒。

1 时 29 分血压 150 / 70 (mmHg)，T 波倒置，ST 段压低 0.15mV。(注：表示心肌缺血。)

1 时 40 分主席自己使劲。马上去看，发现尿床约 200mL。

1 时 45 分血压 180 / 80 (mmHg)。看文件 10 分。

2 时零 5 分脉搏 116 次 / 分。看文件 9 分。爽身粉擦大腿。

5 时 16 分有轻度紫绀（注：表示缺氧），尿床 200CC。

5 时 10 分换枕头及耳枕。看书 7 分。

据徐涛、吴旭君统计，毛泽东在9月8日这一天，先后看文件、看书11次，共两小时50分钟。而这一切是在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图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和氧气管的情况下，由别人用手托着书和文件来读的。周福明回忆：“那天主席一觉醒来，向守候在旁的医务人员说什么。医务人员半天都没有听出来，就马上跑到值班室找身边的工作人员。我闻讯赶到，主席从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声音，几乎听不清。我连忙从床边抓起纸和笔，把笔塞到主席手中。主席艰难地握着铅笔，在我举着的纸上费了很大的气力，半天才划了三个道，就再也写不动了。过了一会儿，他又用握着铅笔的手慢慢地抬起，非常吃力地在木床头上点了三下。我们立刻反应到，主席说的话是和‘三木’有关。‘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息。’我轻声地问。主席默默地点点头。”入夜了，政治局委员们排着队走到毛泽东病榻前，同他做最后诀别。这时，毛泽东的神志仍然清醒。见到叶剑英时他曾吃力地用手招呼示意，但最终什么也没能说出来。

几个小时后，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既有过革命高潮时在风头浪尖上的搏击奋进，也经历了挫折时在低谷中的一次次努力。但无论是成功与失败，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们没有理由说那时毛泽东并不知道死之将至，但他的行动却表现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也许毛泽东用最后的力气读那些书和文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但这却充分反映了毛泽东一息尚存，奋斗不已的顽强精神。这何尝不是又一次到中流击水呀，这是面对着死神的挑战，用生命进行的最后一搏。

毛泽东，是20世纪的大变革年代改变中国面貌的一代历史伟人。

# 19. 毛泽东的开放观与邓小平的创造性发展

## ——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之一

对 外开放问题，在中国是一个急迫而复杂的难题。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有着长期闭关锁国、落后挨打的惨痛历史；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受到几千年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顽强抵抗，加之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半殖民地化，在中国人民心理上产生某种逆反情绪，使得对外开放问题成为近代中国突出而敏感的问题。本文想着重探讨一下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及其相互关系。

—

毛泽东关于对外开放问题的论述，相对来说，不如他对毛泽东思想其他部分阐述得那么充分。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比较早地注意到这个问题，也有几次比较集中的论述。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曾集中地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过对外开放的思想。

第一，阐述了中国不能离开世界的观点。毛泽东认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是当时中国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而要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需要三个条件，即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和全世界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国家的联盟以及日本本国人民的觉悟。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决定中

国战胜日本的关键。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比较透彻地提出了中国和世界密不可分观点。

第二，制定了学习外来文化的方针。毛泽东认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同时毛泽东又强调，这种吸收必须是有批判、有分析地吸收，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他既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主张，也反对那种只取其皮毛的形式的“吸收”。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吸收和学习外来文化问题上的一个基本方针。

第三，明确了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的关系。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关于结成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吸收外来文化、欢迎外来投资等诸方面的论述中，都有充分的反映，是贯穿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各个方面的一个基本原则。

第四，提出了实行对外经济开放的一些具体主张。毛泽东主张开展大规模的对外贸易。他认为中国人民一旦真正获得国家的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因为，“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因此，要“对外和平通商，订立互利的协定”。毛泽东曾表示要引进“大量外资”，以“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他深知，中国是一

个非常落后的国家，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其来源“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在不损害中国主权的前提下，“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合作来经营厂矿”。

毛泽东的上述观点是从抗日战争爆发前夜到全面内战爆发前（1936～1946年）的10年间反复论述的。这些观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毛泽东甚至还对战后中国最适宜与之进行经济合作的国家做了比较，认定“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合宜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当时思想的开放程度。当然，由于受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共间阶级矛盾的制约，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基本上未能实行。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比较集中地体现在1956年他的《论十大关系》和《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著作中。

毛泽东首先从调动党内外和国内外一切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方针着眼，郑重地提出向外国学习的问题。他针对建国初期存在的只注意学习苏联建设经验的偏向，阐明了向外国学习的对象和学习的内容。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技、文艺等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毛泽东特别强调向外国学习的方法，“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学习和引进外国的东西，

要注重发展和创新。他认为“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因为“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他强调：“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

毛泽东在我国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阐述的向外国学习的思想，较他在抗战时期的有关思想更加深入、系统，也更加理论化。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为刚刚跨入社会主义新天地的亿万人民提出了向外国学习、加速社会主义祖国建设的新要求，而且，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二

无须讳言，毛泽东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上述许多好的思想未能完全付诸实施。毛泽东虽然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又比较系统地提出过对外开放思想的领导人，但在新中国建立后，具备了实行对外开放战略的可能性时，在较长的时期里，我国对外开放的步子并没有真正迈出。如果说在建国初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毛泽东领导实行了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局部性开放的话，那么在1957年后，特别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大门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即使有一些为数不多的开放活动，也呈现出单一性、偶然性和策略性的特点。

二是他的对外开放思想本身不完善。考察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可以发现，一般性的理论论述多而有针对性的具体政策少，显得微观方面与宏观方面不配套，有些甚至是不协调或相矛盾的。而对一些应该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却没有论述或语焉不详。例如对现代资本主义就缺少客观分析。

三是毛泽东虽然比较充分地阐明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辩证统一关

系，但在建国后的实施过程中则往往忽视了对对外开放，似乎有些把“自力更生为主”绝对化，而视“争取外援为辅”为可有可无。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条件的限制，又有毛泽东主观上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建国初期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长期的经济封锁、政治敌视和军事威胁；加上50年代末中苏关系的破裂，就进一步使得中国与世界被隔离开来。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但另一方面，邓小平也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还有一些‘左’的政策，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灾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个人的主观原因分析，似有以下几点：

其一，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是在长期的战乱、与世隔绝和被封锁中顽强地表现出来的。这一方面反映出毛泽东勇敢地打破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封锁、面向世界的百折不挠精神，因而使我们愈加感到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之难能可贵。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特定的历史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毛泽东的视野，影响了他的对外开放思想向广度和深度的拓展。毛泽东虽然也十分关注国际问题，但他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上，对经济问题、科技问题则缺乏深入的考察。

其二，毛泽东一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深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任务之艰巨，但另一方面有时把国际间一些平等互利的正常的经济文化往来，也不适当地同主权问题联系在一起而加以反对。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针对帝国主义及其他敌对势力对

新中国的封锁和轻蔑态度，领导中国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伟大成就。这使毛泽东产生了“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的豪迈感。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虽然是有的放矢，并永远是激励我们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但与此相关的另一种倾向，则导致毛泽东减弱对外开放问题的重视程度。

其三，还必须看到毛泽东晚年存在的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给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障碍。

尽管毛泽东在对外开放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但我们应该看到他在这个问题上曾进行过的探索，特别是他为使新中国冲破外界的封锁，登上世界舞台而进行的一次次顽强努力。邓小平曾多次高度评价毛泽东在这方面的功勋。他说：“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 三

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拨乱反正的同时，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使中国的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那么，邓小平的指导新时期对外开放的理论 with 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概括地讲还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但这种继承和发展关系不同于那种认为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只是对毛泽东有关思想的简单继承或稍

有发展的所谓“古已有之”的观点。我们认为，所谓“继承”，是指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中一些基本的方面，如关于中国和世界不可分；关于学习外国的目的是为了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于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关于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等等。所谓“发展”，则绝不只是一般地在规模上的发展，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发展。这种创造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准确地观察和把握国际形势。邓小平清醒地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局势，认为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仍在扩张，而世界上的和平力量也在发展，并且超过了霸权主义的扩张。因而，世界大战不再是不可避免的，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和交流更为密切，对外开放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邓小平的这一分析，改变了我们过去对世界形势的判断，为我国实行全面的对外开放抓住了有利时机。

第二，邓小平以中国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严重现实为切入点，论证了对外开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他说，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现在中国仍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农业和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长期以来的闭关自守。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要改变落后状态，要发展生产力，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开放不行”。只有实行对外开放，才能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吸收过来作为中国发展的起点。邓小平把对外开放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发展生产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新时期的对外开放政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邓小平反对那种把对外开放视为权宜之计的看法，认为对外开

放不是一种策略，也不只是一般的战略方针，而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他多次强调：“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根据他的思想，党的十三大把坚持改革开放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列，作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提出，并写进了党章，后来又作为基本国策载入宪法。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这项基本国策是长期持久的。“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么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将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置于同等重要地位，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邓小平的一项重要理论创造。

第四，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始终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这是中国经济建设的“第一条经验”。但邓小平认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对外开放可以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因此，“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依据上述思想，并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问题、新情况，邓小平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对外开放的辩证关系，指出了那种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僵化、封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危害。邓小平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实行对内搞活（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他认为改革开放是一次新的革命，虽然不是要改变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但也是触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一场根本性变革。简单地说，对外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这就是“吸收和借鉴人

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样可以纠正过去的一些糊涂观念和僵化思想，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充满生机和活力，使四项基本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实践，获得不断的充实和发展。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邓小平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对外开放的基础和重要保证。他说：“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他认为，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不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对外开放，也就没有中国当今的地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外开放还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因为只有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来打击各种违法乱纪活动，才能保证对外开放的顺利进行。对外开放也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特别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邓小平强调，对外开放的关键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这是“四个坚持的核心”。“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总之，邓小平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实质，“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实践中，邓小平特别注重将坚持改革开放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机地统一起来，多次强调要防止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认为二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阐述的这两个基本点精辟地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

第五，邓小平不但从宏观上深刻阐述了对外开放的理论，而且亲自部署和领导了这一伟大实践，并制定了一整套具体全面的对外开放战略。这主要有：

一是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邓小平针对 80 年代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提出抓住机遇全面开放的重要思想。他主张中国的对外开放要面向三个方位，即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对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放。邓小平认为，世界上的国家无论大小，也不论先进与落后，都各有所长。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既能取各方所长，补己之短，也能够使中国的经济避免对某一方面或少数国家的依赖，从而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使独立自主的原则得以保证。

二是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经济开放。长期以来，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多局限于对外贸易一种形式。邓小平认为这是很不够的，还应该向技术转让、资金往来、人才交流等各个领域拓展。针对有些人存在的引进外资会不会危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忧虑，邓小平肯定地说：“我看不会的。因为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

三是全国性的、多层次的对外开放。邓小平认为我国土地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的资源、资金、技术水平等也不一样，全国都要对外开放，这是没问题的。但必须是有步骤、有秩序、分层次地进行。从 1979 年 4 月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首倡创办经济特区，到中共十四大召开的 15 年间，先后在广东、福建开办了 4 个特区，开放了 14 个沿海城市，创办了最大的海南经济特区及 3 个沿海经济开发区；由进一步开放沿江、沿边城市到开放

涉及 12 个省、自治区，横跨中国中西部两大经济带的 11 个内陆省会，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开放城市—沿海开发区—广大内地”的“点、线、片、面”的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战略格局。这一方面彻底解决了毛泽东对外开放理论同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同时，邓小平也得以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使他的对外开放理论从宏观到微观，更具有实效性，更加丰富，并日臻完善。

分析和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实践及其差别，并不是为了单纯比较两位伟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优劣高低，而是为了搞清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过程，总结经验教训，进而促进我国当前和今后的对外开放事业。我们说，推开百余年尘封网结的窗门，去延揽五洲八面来风，这是近百年来无数先进的中国人想做而没有达到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的两代领袖——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高举“实事求是”的旗帜，率领亿万中国人民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终于使中国走向了世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将永远铭记他们谱写的光辉篇章。



## 20. 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力量源泉：“三个代表”思想的历史考察

——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之二

“**三**个代表”的思想，作为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它是在科学地分析世纪之交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提出的，同时也是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全面深刻总结。在建党 80 周年之际，历史地考察中国共产党人如何与时俱进，始终保持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的先进性，始终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挥着坚强领导核心作用，对于我们深入领会和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带入 21 世纪，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在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榨下，中国逐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在救亡图强的时代主题下，几代仁人志士为捍卫民族尊严和争取国家独立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但是，无论是地主阶级中开眼望世界的爱国有识之士，还是领导太平天国运动，使之达到了中国历代农民运动的最高峰的洪秀全；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变法图强”的奔走呼号，还是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

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敲响了丧钟的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80年不懈的反抗，80年接踵的失败。究其原因，正是因为缺少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阶级力量，缺少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科学思想的指导，因而导致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这一根本要求无法得到实现、在凄风苦雨中挣扎的古老中国，正在酝酿着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高举民主和科学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正是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预兆和前奏。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其影响下，1919年爆发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场斗争的最关键时刻，6月3日，上海等地的工人阶级举行大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与中国工人运动日益结合，很快就诞生了一个崭新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

只有几十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林立的一百多个各式各样的政党中，其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由于她是与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由于她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武装，所以，她能够在成立的第二年就透过层层叠叠的纱窗晓雾，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与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结合起来，科学地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为亿万中国人民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与此同时，她架设了马克思主义通向中国工人运动的桥梁，将不到三百万人的中国工人阶级团结发动起来，迅速掀起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显示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如果说在创始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体现自己

的先进性和与其他政党的本质区别的话，那么到了抗战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则开始自觉地从理论上阐述“三个代表”的思想内涵及其重要性。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最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将最终决定社会总体面貌和历史发展这一原理，有着深刻的认识。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曾鲜明地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sup>①</sup>但是，他们没有机械地照搬，而是根据当时中国的情况，认为在夺取政权之前，应该把推翻帝、官、封的反动统治，从旧的生产关系下解放生产力，作为第一位的任务。这一时期，毛泽东还系统地阐述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其中关于文化纲领，他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至于毛泽东当时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意思一致的相关论述，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就更为充分了。

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进步力量与统治中国的黑暗势力相比，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革命遭受了一次次失败与挫折。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失败中奋起，愈战愈强。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陷于低潮。党及时地总结了经验，开始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左派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从而胜利进行了北伐战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高潮，党员人数发展到5万多。1927年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的白色恐怖的镇压下，大革命归于失败，党员人数一下锐减至一万。不屈不挠的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站立起来，陆续发动了南昌

起义、秋收起义等大小几十次起义，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镇压，并独立自主地开辟出适合中国实际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进而，建立了十几块红色根据地，在鼎盛时组成了三十万人的强大红军。后来，由于一度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领导，党和红军未能打破帝国主义与蒋介石集团联合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多重“围剿”，使党的力量在白区几乎丧失了百分之百，在苏区丧失了百分之九十，十几块根据地只剩下了陕北一隅。在危机中，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统治和来自共产国际的瞎指挥。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步步深入，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团结全国人民浴血奋战，开辟了达到一亿人口的十九块解放区，建立了120万人的人民军队，并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随后，在国民党蒋介石挑起的内战中，党率领全国各族人民，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经过大反攻和战略大决战，彻底消灭了由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八百万国民党军队，夺取了政权，建立起崭新的人民共和国，使中华民族在经过一个世纪的艰苦奋斗之后，终于赢得了独立和解放。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在强大的中外反动派的一波又一波的进攻面前，愈挫愈强，并取得最后的胜利。究其原因，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日起就忠实地坚持和贯彻了“三个代表”思想的实质，保持和发扬了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所以才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学地分析错综复杂的形势，制定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才能够逐步团结和凝聚起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势力做坚决的斗争。

## 二

新中国的建立，不仅彻底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使中华民族一扫百年耻辱，更主要是通过砸碎旧的上层建筑，通过彻底地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空前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即进一步破除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放生产力。这主要是：没收帝国主义在华资产，收回海关和航运等管理权，剿匪反霸稳定社会秩序，实行民主选举建立基层政权，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土地改革，彻底废除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另一方面，在带领全国人民稳定物价，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努力实现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提出的“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奋斗目标。这样，到1952年全国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不仅较1949年增长近一倍半，而且超过战前最高水平1936年的22.3%。农业总产值较1949年增加了48.8%，比战前最高年份1936年年增长18.5%。与此同时，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17%增长至26.7%。<sup>(2)</sup>到1956年，则提前一年完成了“一五”计划。到1957年，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388亿元，其中工业784亿元，农业是604亿元，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了农业，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尽管当时工业化的水平，特别是技术含量还很低，但毕竟是一件了不起的标志性事件。

在经济逐步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把

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适时地制定并开始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领导全国人民经过四年多的努力，成功地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破天荒地确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改造，是对生产关系的又一次根本性的变革，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这实际是党的第一代领导群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推进社会进步的划时代举措。这一历史过程代表了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对社会主义的热切向往和彻底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

近年来对三大改造的评价不一。有的论者简单地把1957年以后的2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归结为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过早，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从而影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观点是建立在主观假设之上的，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上，在这场涉及几亿人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中，社会生产力在总体上保持持续高速增长。以公私合营工业的产值为例，本年度与前一年比较（剔除当年新增、合营企业的产值），1950年增加17.3%，1951年增加31.4%，1952年增加32.3%，1953年增加28.3%，1954年增加25.1%，1955年增加29.1%。

1956年全国公私合营工业总产值达191.1亿元，比1955年增加了32%。1956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55年增加16.5%，1957年又比1956年增长7.8%。<sup>③</sup>到1956年底，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一年完成。这些充分说明，党和国家当年适时实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英明之举，在三大改造中所选择的道路和采用的基本步骤与基本方法是正确的。作为领导这场伟大社会变革的主要参与者之一的邓小平，是这

样评价对资改造的，他说，“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用了和平改造的办法。实践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我们的生产不仅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得到了发展，既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教育了资产阶级。”<sup>(4)</sup>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她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根本性作用，是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从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1952年到1978年间，尽管社会主义的中国受到了国际上反华势力的敌视、封锁和干扰，尽管我们自己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出过这样或那样的差错，特别是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造成了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左”的错误和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认识上的某些偏差，以及发展速度问题上的急躁情绪造成的一些管理体制上的弊病和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尽管这一切的主客观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克服缺点和困难的过程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仍然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从一片战争废墟中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据国家统计局1989年编写的《奋进的四十年》统计，这期间，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1.4%能在这么长的时期内，保持这样高的平均增长速度，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

### 三

毛泽东对夺取政权前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在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上的差别，是有清醒认识的。三大改造刚刚完成，他就及时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

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他率先提出要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领导制定了《农业发展纲要》，并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陈云则提出了以国家和集体经营的工商业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以计划生产为工农业生产的主体，以自由生产为补充；以国家市场为主体，以自由市场为补充。在此前后，毛泽东和刘少奇还提出可以允许发展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的思想。但是由于党的主要领袖在思想观念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社会主义的有关论述，存在有一定程度的教条化理解，由于在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和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客观冷静深入调查研究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这主要表现在过于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过于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由于在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和由之而来的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加上那个时期严峻的国际形势的影响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与干扰。不仅使上述有益的探索无法深入和继续，而且还造成在很长时间里全国经济发展的相对缓慢，经济成分和经济结构单一，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僵化，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不到充分的体现。究其根本，在于片面强调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改革上层建筑，以期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而逐渐淡化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这一中心任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拨乱反正，首先是从思想上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精辟地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sup>⑤</sup>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实事求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思想路线。但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搞得很乱，真所谓形而上学猖獗，教条

主义盛行。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又搞“两个凡是”，鼓吹本本主义，实行思想禁锢，继续制造新的个人崇拜和思想僵化。

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枷锁，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这样，就从根本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先进社会文化和整个政治经济生活的指导地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恢复，实现了党在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并推动了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重大历史是非问题上的拨乱反正，使全国上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经验，加深了对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基本上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从而制定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的基本路线。他认定我国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阶段要持续很长时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sup>⑥</sup>他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sup>⑦</sup>基于此，他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提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该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进一步深化了对生产力标准问题的认识，他在视察南方讲话中又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

作为判断是非功过的标准。生产力标准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发展社会生产力，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保持无产阶级执政党先进性的核心问题。根据这一思想，邓小平认为建国以来所犯错误的主要经验教训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三中全会以来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就是实现了三个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在这三个转变中，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关键。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对三大改造以来片面追求大而纯的公有制带来的问题，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从而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虽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仍有两重性，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仍有积极的一面，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只要对它加以正确的领导、管理，它可以活跃经济，增加税收，扩大就业，方便生活。因此在所有制上，确定了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扶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发展的方针。党的十五大又进一步确定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此相应，在分配体制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制度，一改过去那种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一大二公”的分配制度。对这个问题，江泽民同志1998年7月17日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十分中肯的论述，他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主体必须是公有制，这要坚定不移。同时，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必须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这也要坚定不移。如果不把这两个坚定不移统一起来，只讲一面，就会脱

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就建不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在率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全面总结和借鉴了中国与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及教训，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邓小平理论，制定并贯彻了一整套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方针政策和体制，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国民经济连续十几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目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一万亿美元，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七位，许多重要的工农业产品，如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水果和钢、煤、水泥、化肥、电视机等，已经居世界第一位。从而彻底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贫困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广大人民群众从切身的体验中，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增强了对党的向心力，提高了坚持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行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 四

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产生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在成功抵御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严重冲击之后，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确立和完善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性的措施，如：深化实现以国企整体脱困为目标的国企改革、完善现代金融运行机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科教兴国、开发中西部和实行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等，以推进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从而提前五年达到了20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为实现中国经济在新世纪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与此同时，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坚决贯彻邓小平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示，在积极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91年在纪念建党7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接着，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专门讨论了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的问题，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又全面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他强调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强调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强调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强调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江泽民特别针对“依法治国”的战略，提出“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和发展。

在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着眼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继承历史，立足现实，前瞻未来，在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80年的历史经验和深入思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江泽民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一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新问题，具体、全面、准确地概括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先进性质，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做出新的发展，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纲领。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世纪之交、千年更替的重要历史时刻，基于对国内外形势、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自身建设实际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从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做出的战略性思考，为中国共产党面向新世纪进一步巩固、加强、提高自己，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指明了前进方向。

## 注：

- (1)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79 页。
- (2)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8 ~ 109 页。
- (3) 《当代中国》丛书对资改造卷，第 32 ~ 33 页。
- (4)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59 页。
- (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14 页。
- (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73 页。
- (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70 页。



## 21. 创造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境界：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理论的发展历程——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之三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长时期以来为解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进行了矢志不移的奋斗和努力。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创造了生产力理论的新境界。按照江泽民“要始终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思想，回顾和总结建国以来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的过程，对于我们深入地学习党的领袖人物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于我们深入领会和贯彻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教育作用。

—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她与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着天然的联系，正如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所指出，她是适应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最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将最终决定社会总体面貌和历史发展的原理，对

于自身所具备的先进性及其肩负的历史使命，早就有着深刻的认识。她从创立之日起就忠实地坚持和贯彻了“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思想的精神实质，努力保持和发扬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这主要表现在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正确地分析中国社会在不同阶段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确定党在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党根据当时中国的情况，把推翻帝、官、封的反动统治，从旧的生产关系下解放生产力，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新中国的建立，不仅彻底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使中华民族一扫百年耻辱，更主要的是通过砸碎旧的上层建筑，通过彻底地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空前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此后，党所面临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同时也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适时适度地调整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这双重任务，时而同步，时而交替。在三年恢复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即进一步破除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放生产力；另一方面，带领全国人民稳定物价，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在此基础上，党开始领导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努力实现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提出的“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为先进的工业国”的奋斗目标。到1956年底，提前一年完成了“一五”计划。到1957年，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388亿元，其中工业784亿元，农业是604亿元，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了农业，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尽管当时工业化的水平，特别是技术含量还很低，但毕竟是一件了不起的标志性事件。在实施“一五”计划的同时，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把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适时地制定并开始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领导全国人民经过四年多的努力，成功地进行了对农

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破天荒地确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改造，是对生产关系的又一次根本性的变革，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毛泽东就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他具体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的各种矛盾，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重要思想。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基本矛盾的性质，他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他认为，其中相适应的是主要方面，不适应的是次要方面。因此，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这种对抗性和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就决定了这种矛盾可以而且应当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调节解决。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思想，是苏联十月革命后四十年，都一直回避而无从解决的问题。这一重要理论观点的提出，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途径，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进一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解决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此认识基础上，毛泽东率先提出要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就。

## 二

由于受缺少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历史局限，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的探索后来逐渐出现偏差。他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解决了生产关系的问题，但是单有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还必须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于这种考虑，他提出要继续革命，后来又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试图通过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来解决旧制度、旧思想和旧作风残余的影响，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结果，不仅淡化和偏离了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而且还造成在很长时间里全国经济发展的相对缓慢，经济成分和经济结构单一，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僵化，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不到充分的体现。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在生产力问题上的主要贡献：一是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拨乱反正，从思想上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他指出，建国以来在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问题上所犯错误的主要经验教训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三中全会以来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就是实现了三个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从而确立了“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该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的重要思想。二是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的重要命题。<sup>①</sup>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sup>②</sup>，“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sup>③</sup>这就改变了过去那种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就只有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而不存在解放生产力问题的观念。三是充分论证和肯定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在生产力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和毛泽东比较侧重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反作用的做法有所不同，邓小平更重视的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尤其注重生产力发展的生长点和突破口。他在新时期提出并阐述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要素组成。其中，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按照一般的理解，科学技术是生产手段，应归为生产工具，属于劳动资料范畴。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似乎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事实上，生产力三要素本身的内涵是发展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更看重生产力三要素中的物质性因素的话，那么，随着现代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管理和科学技术等精神性因素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邓小平抓住这一时代发展的变化和特征，具体地分析了精神性因素在三要素中的作用。他明确指出：“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我们常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sup>④</sup>这就精辟地揭示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各要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对推动生产力发展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将生产力三要素中的物质

性因素与精神性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的  
重要发展。并对中国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

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全面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进一步阐述了他关于生产力问题的理论创见。首先，他强化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思想，重申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提出“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是非功过的根本性标准。即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生产力标准的提出，一则是使人们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有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如何这一最基本的衡量尺度；二则改变了过去那种片面追求生产发展、忽视人民生活的倾向，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衡量我们工作的标准，实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与党的群众路线的统一；三则是大大地深化了全党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的认识，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为全党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次，邓小平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高度，阐述了生产力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往在论及社会形态问题时，虽然也强调要以相应的生产力为物质基础，但他们主要是以生产关系的总和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为直接的判断依据，而不是生产力。因此他们在讲社会主义的特征时，多是从社会关系方面进行概括，没有把生产力提到社会特征地位。而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共同富裕是以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前提的。这样，就阐明了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基础地位，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最终的发展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

再者，邓小平不仅看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并且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经济上还有相联系和为我所用的一面。继倡导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战略之后，他在南方谈话中针对当时有些人陷入姓“资”姓“社”的争论，在涉及一些改革的具体政策与措施上产生的犹豫、观望，坐失发展良机等情况，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要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办法。”从而奏响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号角，从理论和实践上开辟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新天地。

### 三

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他立足于新世纪、新千年的时代发展趋势，着眼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在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经验和深入思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三个代表”的思想中，第一位的是要做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代表。江泽民在纪念建党八十周年的讲话中特别对此做了进一步的系统阐述。他一方面根据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三要素”以新的时代内容；同时，又从党的建设、人的全面发展和理论创新的角度，论述了生产力问题。形成了一整套的新思想和新观点。

第一，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

首先，江泽民重申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生产力三要素中的“第一要素”的思想。他指出：“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我国工人阶级，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我国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同工人阶级紧密团结，是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而且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实际状况，澄清了社会上的一些糊涂认识，明确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在当前社会经济成分日益多样化情况下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始终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第一要务。”这就从根本上坚持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性质，指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依靠力量。

其次，江泽民进一步强调了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并指明科学技术还“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在这个问题上，他不仅提出运用科学技术“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这一奋斗目标，还具体指出了实现这种跨越的方法和途径，即：要始终注意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要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要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

再者，江泽民反对那种脱离开生产关系片面谈生产力发展的观点，他在坚持“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同时，也充分肯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发展

生产力的反作用，主张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针对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实际，他强调要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指引下，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对于仍然存在的不适应先进生产力和时代发展要求的一些落后的生产方式，既不能脱离实际地简单化地加以排斥，也不能采取安于现状、保护落后的态度，而要立足实际，创造条件加以改造、改进和提高，通过长期努力，逐步使它们向先进适用的生产方式转变。江泽民的这一论断，旨在防止那种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左”的错误和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右的错误。所谓代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当然是指代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就是必须适应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客观要求。

第二，江泽民把党的先进性同社会主义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结合起来，把党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结合起来，把党的根本任务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结合起来。他在“七一”讲话中强调，“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江泽民要求全党同志，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经常加以检查和总结，看看是不是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不符合的就实事求是地纠正。这样，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指明了努力方向。

第三，江泽民系统地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有两种。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二是人类自身的生产。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看，这两种生产都是决定性因素。江泽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人类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的思想，指出，“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他认为，这是“两个互为前提和基础的”、“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包括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生活水平，也包括人的身体素质、文化科技水平、思想意识的提高和性格、爱好的取舍等，其最终目标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要达到的人的彻底解放。江泽民通过揭示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将我们当前的各项工作同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指明了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远大理想的现实之路。

第四，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还提出了一个事关生产力理论创新的重大命题，那就是劳动和劳动价值论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江泽民虽然没有进一步对这个问题做详细的结论性阐述，但是问题提出的本身，特别是强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特别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区别，就给人以重要的启示，实际是为我们指出了当前和今后生产力理论研究的重点与方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就一定会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实事求是的重要创新与突破。那将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还势必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

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对生产力理论的阐述，虽然着重是从党的建设的角度提出的，但却非常系统和全面。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对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永远保持其先进性的根本要求，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大发展，也反映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和新要求，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境界。这一思想同江泽民关于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从根本上回答了面向新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以及如何继续发挥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坚强领导核心作用的重大历史课题。对于指导我们不断争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的新胜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注

-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13 页。
- (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50 页。
-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70 页。
- (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8 页。



## 22. 实现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 ——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之四

刚闭幕的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明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本质，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也就是所谓理论要联系实际。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要想把理论联系实际贯彻始终，并取得切实的成效，需要有一些基本的素质。比如，必须精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基本理论；同时还必须掌握和熟悉实际情况。但是，单有这两点还不够，要真正把理论与实际在实践中有机地统一起来，达到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还必须具备两种素质。这主要是指有别于党的指导思想那种具有根本方法论性质之外的各门具体学问，以及人们在各种实践活动中积累起的感性认识与相应的劳动技能。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近代工人运动发展的产物，而且是在对所有人类先进文化思想的继承批判中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更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与总结。反过来说，学习和掌握人类一切的先进文化思想，学习和掌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多的研究成果，是帮助我们领会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精髓的重要捷径。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各个学科

的根本性指导作用，强调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革命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其间还必须有一个中介。我们只有借助于各门具体的科学知识，只有凭借着在长期实践活动中摸索出的实践经验，才能够更好地领会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只有首先和我们已经掌握的各门具体的学科知识相结合，只有首先和人们在各方面的实践中初步产生的感性认识相结合，才能够为人们所接受和掌握，才能够推动理论与客观实际的结合，真正发挥其根本指导作用。这是我们实现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

按照科学发展观五位一体总布局的要求实现科学发展，不是一句简单的空话，而是由无数个具体的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的实践活动组成的实践过程。我们说能否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是能否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的关键。这首先就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中，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以及中央的现行方针政策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正因为它是具体的，因此，我们不仅要一般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理，不仅要一般地了解各自所面临的实际情况，还必须相应地具有多方面、多学科的科学知识和具体的实践经验。这一点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信息化突飞猛进和经济全球化日趋发展的今天，尤为重要。十八大报告号召全党：一定要勇于实践、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把握时代发展要求，顺应人民共同意愿，不懈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这种创新和探索，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离不开积极的学术争鸣和宽松的民主环境，离不开大胆探索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实践活动。同时，还必须有各学科知识的辅助和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个别中发现一般，从一般中总结出规律，达到理论的创新，并在实践中经受新的检验。

我们党的几代领袖，都一贯重视这个问题。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从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的高度，号召全党“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他带头研究国际国内的形势，总结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历史经验，全面分析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具体国情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从而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并具体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最终按照这一理论体系及其具体的方针政策的指引，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不仅身体力行，并且继续倡导全党上下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他研究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研究中国当时的经济结构和各阶级力量对比，总结各地创造的新鲜经验，从而在制定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同时，还领导全党摸索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具体的过渡办法，如在农村实行由临时互助组到常年互助组、由低级社到高级社的互助合作化道路，成功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用不流血的方式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顺利过渡。毛泽东在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上也有过严重的失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他虽然认识到今后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解放生产力而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生产力，他虽然适应党的

工作重心转移的要求，带领全党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他虽然仍强调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并希望探索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实际结果却与他的愿望相背离。不仅是经济建设遭受严重挫折，甚至使党的八大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也逐渐发生了偏离。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这一基本国情缺乏充分的认识，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违背了诸多的科学常识，过高地估计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后来深刻总结了其中的沉痛教训，他认为，单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的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于是，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按照他的要求，中共中央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全面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相继制定出“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高教六十条”、“科研十四条”、“文艺八条”等工作条例，大大地丰富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形成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从而使“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得到认真的贯彻，使遭受严重困难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尽管毛泽东等的探索后来又经历了严重曲折，但正如十八大报告所言，那一代人所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领导全党实现了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他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

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理论联系实际”的最杰出之作。在这个过程中，适应改革开放大局的需要，他从干部队伍建设的角度阐述了实现理论联系实际的中间环节问题。他指出：“只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真才实学，还是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目前，我们的干部有一千八百万（1979年的数字），绝对数不少，但是“万金油”干部太多了。“缺少的是专业干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各种专业人员。”邓小平把知识化、专业化和年轻化、革命化并提，作为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方针，殷切地期望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宏大的干部队伍。他号召全党要努力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努力学习和借鉴现代的经济管理经验。邓小平还特别注重和强调要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中，吸取新鲜的改革经验。他认为在改革实践中，有许多好的方案、意见、办法，都是来自人民群众之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发明的，乡镇企业是农民发明的。他说：“近十年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

江泽民同志在率领全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过程中，也特别强调“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他指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宏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各方面的工作必须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因此，我们的各级干部既要有把握全局的能力，又要努力成为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为此，他一再要求各级干部一定要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不

仅要认真学习理论，还要学习现代经济、科技、法律、管理、历史等方面的知识，这样才能做好工作”。他把对各种现代科学知识的学习，视为我们党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条件。江泽民认为，人不是生而知之的，知识、才干和经验都要在工作实践和刻苦学习中获得。学习，不仅要从书本上学，而且要在实践中学；不仅要在总结成功的经验中获得提高，而且要在汲取失败的教训中获得进步。“这是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要求的，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所要求的。”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针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强调指出，世界在变化，形势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深入，不断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号召全党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在全党营造崇尚学习的浓厚氛围，积极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优化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质，增强创新能力。正是在这种氛围和要求下，我们党奋力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提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重要理念，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取得了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新的巨大成就，成功地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可见，掌握各学科的知识 and 具备各自领域的基本工作技能，不仅是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提高自身素质和胜任各自本职工作的基本要求，而且是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能否真正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必要条件。抓好

了这个环节，不仅有助于实际工作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并将大大地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解，更好地推进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使我们的各项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勇于实践，从我们的日常工作着手，脚踏实地地真抓实干，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以接受各种挑战。



## 附录：“毛泽东与我”征文总结

由 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和中共井冈山市委、《人物》杂志、《博览群书》杂志、《中华老年报》、《发展导报》、山西人民出版社、北京手表厂、福建南靖水泥厂等单位发起和主办的“毛泽东与我”大型征文活动，自1992年7月酝酿，到1993年10月30日，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现已圆满结束。

征文活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首先是应征稿件多。据有关新闻单位介绍，近几年各类的征文等活动很多，但响应者并不十分广泛。征文活动一般可收到百十篇到五六百余篇。而这次“毛泽东与我”征文活动则收到一千五百多篇应征稿，应征稿件有相当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这1500多篇稿件分别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也有稿件应征。投稿者中，年龄最大的98岁，年龄最小的仅有10岁左右。投稿者的经历和职业各不相同，应征稿件的体裁也多样、多彩。更重要的是应征稿件大多有充实的内容和相当的思想性。这些稿件，有的深切怀念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丰功伟绩；有的

真实记述毛泽东的一言一行对自己、对某一家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有的则用诗的语言热情讴歌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独立富强而牺牲一切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特别是张爱萍、李德生、赛福鼎、陈士榘、韩光、方志纯、贺晋年、刘道生、孙毅、戴镜元、欧阳平、钱江、袁血卒、张承先、周里、李立、廖志高、袁宝华、曾志、铁瑛、金善宝、冰心、臧克家、侯宝林、华君武等一大批长期追随毛泽东投身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老同志、老前辈，他们不顾年迈、体弱和工作繁忙，寄来了感人至深的稿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珍贵材料。根据征文活动组委会的要求，征文办公室对这些稿件进行了分类编辑，陆续向《人物》、《博览群书》、《中华老年报》和《发展导报》等报刊提供，择优发表。《作家文摘》、《北京青年报》、《中华英才画报》、《北京广播电视报》、《农民日报》等报刊也向征文办公室索稿或转载有关文章。截至1993年12月底，各类报刊共发表“毛泽东与我”征文94篇次。在此基础上，征文办公室按照征文组委会制定的标准与要求，编辑成《毛泽东与我》丛书一套，共6册，140万字，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第一版印刷5000套，不到两个月即被订购一空。征文组委会还和北京电视台联合摄制九集电视系列片《情系毛泽东》，该片除在北京电视台黄金时间两次播映外，全国有21家省级电视台购置了播映权，中央电化教育馆音像出版社还向全国出版发行该片的录像带。此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晚八点半”节目分十次选播优秀征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则邀请征文办公室同志参加“我们向毛泽东学什么百人热线大讨论”。

“毛泽东与我”征文活动在全国造成了积极的影响，得到圆满的结果。我们觉得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主要是由于：

## 一、主题吸引人，宗旨明确，老同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这次“毛泽东与我”征文活动是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而举办的，又是在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的形势下举行的。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老中青干部、群众，都深深地爱戴和怀念着毛泽东同志，我们的征文活动，给他们提供了抒发感情的机会。中共中央关于“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努力推进我们当前的各项事业”的 1993 年 2 号文件给我们指明了的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的总方针。征文组委会主任李力安同志，1992 年 12 月 15 日在征文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的征文活动宗旨：“就是要继承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努力推进我们当前的改革开放事业”。组委会在活动全过程中，始终注意按照《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严格把关，注意防止神化毛泽东的倾向和曲解、歪曲以至否定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征文组委会的领导同志对征文工作，大到文章的客观性和思想性，小到奖品的选择要突出纪念意义，都一抓到底，使征文活动在国家有关社团活动规定的范围内，得以健康顺利开展。尤其是老一辈革命家刘澜涛、杨得志、叶飞、孙毅等同志欣然出任征文活动顾问，张爱萍同志除赐稿参加活动外，还亲笔为征文组委会与北京电视台联合录制的电视系列片题写片名“情系毛泽东”。前辈们的关怀和勉励是这次征文活动能够克服困难，获得圆满成功的重要条件。

## 二、各参加单位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

这次征文活动是由学会发起，有关单位参加的群众性社团活动。因此，它没有国家拨款，所需经费全靠自己筹措。坐落在革命老区的福建南靖水泥厂，厂长简天祥和全厂职工把老区人民对毛泽东的热爱倾注到这项活动中，承担了主要的经费。北京手表厂职工精心特制了“毛泽东与我”征文纪念手表，无偿作为给获奖征文作者的奖品，并特意把001号纪念手表送交毛主席纪念堂收藏。其它各参加单位也都在人力或物力上给予这项活动以大力支持。特别是这些单位的主要领导，虽然本职工作繁忙，但他们作为征文组委会成员参加了活动的全过程，积极为征文活动出谋划策，尽心尽力。像山西省出版局局长贾宏鸣同志，把“毛泽东与我丛书”列入他们省1993年度的第一号重点书；《博览群书》主编韩嗣义同志在活动开始时，主动承办新闻发布会；《中华老年报》主编邢雁同志在征文活动举行颁奖会时，正在外地出差，但仍几次打回长途电话帮助安排颁奖会事宜；《发展导报》主编李丁同志还亲自参与约稿和电视片的摄制工作；北京生活书店的同志不仅为征文办公室提供活动场所，还为征文组委会管理帐务，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并用部分丛书发行费弥补了活动经费的不足。特别是由王琪、彭明、方孔木、肖超然、陈志凌、阎景堂、赵福亭、李俊臣、黄允升、阎晓宏等国内著名的党史、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们组成的征文评审委员会，他们不计名不计利，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认真审阅应征文稿，平均每人审阅的文字量达40万字以上，正是由于他们的艰辛劳动，应征文章的发表和丛书的出版才有了质量保证，获奖征文的评选工作才能得以如期完成。

### 三、广泛的宣传和扎实的组稿工作

为了最大范围和最大量的征集到有质量的征文，征文组委会先后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每周文摘》等多家报刊 24 次刊载征文启事，还专门举办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等曾郑重地报导，新华通讯社发了通稿。征文组委会把通过新闻媒介的宣传和有组织的约稿结合起来，责成征文办公室向同毛泽东有过较多直接接触的老同志和国际友人两次发出约稿信四百多封，向革命老区的有关纪念馆、党史办发出请求帮助约稿的信件 43 件，向全国各综合性高等院校和文科院校的研究生会、学生会（团委）发出约稿信 168 件。征文办公室还应一些年老有病的革命老人之邀，为九位老人整理文章 11 篇。此外，在拍摄电视系列片《情系毛泽东》的过程中，征文办公室人员随摄制组采访了 60 多位知情人，整理录音 48 盒。这些采访录音虽然没有作为征文编入《毛泽东与我》丛书，但对电视片《情系毛泽东》的摄制起了重要作用。

### 四、《毛泽东与我》征文活动作为一项群众性的社团活动

它既不是行政布置，国家拨款；也不是个体经营，无组织领导。而是由在国家注册的学会发起组织和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由下而上搞起来的一项大型纪念活动。这种比较新颖的组织形式，只要选题正确，领导得力，实践证明其效果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和传统教育方面，每一位应征撰稿者都是活动的主动参与者，热情高，写了很好的文章，教

育了读者，同时自己也从中受到教育。应征的优秀文章出版和发表以后，特别是通过电视和广播电台播出以后，其他群众也愿意看、愿意读、愿意听。因为这些文章的作者来自全国各地和社会各界，年龄也各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他们的经历和观点容易在群众中产生共鸣。另一方面，这些来自群众的作品，对学术研究人员和宣传工作者，也是一种重要的信息反馈。这次征文活动处在毛泽东 100 周年诞辰之际，不仅抢救了一批有研究价值的史料，搞了一次纪念活动，更重要的是这项征文活动本身，实际又是一次广泛的社会调查。一千多位作者撰稿参加说明各界群众对这项活动的关注；95%以上的应征文章基本观点都是歌颂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说明广大群众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优良传统的热爱和拥护；投稿者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大约 40 岁以下的中青年，反映出年轻一代对革命前辈及其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的敬仰。在征文中既有和毛泽东有过直接接触的老同志，例如河北安国一位 1936 年入党的老同志张秀，寄来一篇稿子满纸都被泪水打湿，对毛泽东的一片深情，处处可见。更可称道的是那些和毛泽东没有接触过的年轻同志，他们有的是响应毛泽东和党的号召支援边疆的，有的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受过委屈，在生活上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坎坷经历，但他们没有忘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他们的文章和老前辈的文章同样使读者振奋受益。

## 五、关于征文办公室的工作

我们在征文组委会的领导下，在一年零六个月的时间里（包括善后）做了大量具体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有下列几个数字：1. 先后同京、晋、

豫、湘、粤、赣、陕的 23 家单位探讨过合作开展这项活动的事宜；2. 举办组委会、评委会全体会议、颁奖会、新闻发布会、组委评委工作会会议、编辑部会议、办公室会议共 22 次；3. 起草、打印、分发各类文件 28 种；4. 回复群众来信 200 余封；接待外地主办单位成员和组委来京人员 20 余批次；5. 认真登记、阅读了全部来稿，负责进行了分类和初选，并为评审委员准备评审材料 20 套（每套 40 篇），仅此一项就用去复印费 3000 多元；6. 抄清稿件 40 余万字；7. 编辑加工处理稿件约 260 万字，其中最后编入丛书的 140 万字；8. 顺便在这里报告一下经费收支。实际募集到由征文办公室支配使用的经费是 11 万元整，现已全部用完。开支广告费 34200 元，印制纪念卡和信封印刷费 15000 元，发放评审费、劳务费 11600 元，八折购进《毛泽东与我》丛书 300 套用去 15600 元，颁奖会用费 17000 元，其余为日常办公费用。总之，办公室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也由于不是正式的机构，大家全凭工作热情组织到一块，工作条件和经费很有限，例如 10 月 30 日在纪念堂搞颁奖会，因借不到汽车，无法报车号，而出租车又不准入广场，运往纪念堂的赠书和奖杯是借用三轮车推进去的。北京市交通局特勤处的民警同志都被感动得帮助推车。绝大多数同志不计得失，办公室人员一年间领取劳务费没有超过 200 元的，有几位同志连这 200 元的劳务费也没有领。另一方面他们也感到工作中还有许多缺点，这主要是办公室负责人向各参加单位和组织会请示汇报情况不够，工作中有急于求成的情绪，在其他一些环节上也存有缺陷。

毛泽东与我征文活动已经圆满结束，征文办公室和丛书编辑部的同志都感到很有收获，那就是他们在这次活动中所受到的教育和培养。因此，

他们对各参办单位及其领导、对评审委员会的各位专家，对给予他们关怀和勉励的组委会顾问和领导，对所有关心和帮助过这次活动的单位及个人，特别是对一千多位撰稿应征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毛泽东与我征文活动组织委员会办公室

蒋建农

1994年元月5日

## 后记：毛泽东与我

毛泽东是我心目中最敬仰的伟人。从1982年本科毕业前夕撰写第一篇党史习作(毕业论文)《土地革命中毛泽东关于富农政策的理论》起，学习和研究毛泽东，迄今已经30年了。30年间，我在中共党史、民国史、军史、国史、党建、统一战线理论等研究领域，撰写出版了十余种论著，主编或副主编了30多种书籍，发表了60多篇学术论文，以及电视专题片脚本、纪实文学、书评、报道等。其中涉猎最多的是毛泽东生平、著作和思想研究。近两年不断有出版社的朋友劝我把论文整理一下，出本论文集。我想自己年龄刚刚半百就出集子，太不自谦了。但是考虑到自己目前从事的是纯粹行政性的工作，短时期内很难挤出时间专心搞学术研究，也就同意做一阶段性的总结，并借此之机，梳理一下自己过去在学习研究毛泽东的过程中，存在哪些不足和问题，以待来日重拾旧业时汲取。

本书的书名，借用了我在1993年为北京电视台策划和撰写9集电视专题片时，张爱萍老将军题写的片名《情系毛泽东》，以表达对毛泽东的景仰之情。书稿选取了19篇研究毛泽东的论文(其中一篇作为序言)和4篇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毛泽东思想继承

发展关系的文章，全书连同后记，以及一篇附录——“毛泽东与我”征文活动总结，共25篇文章。所有文章都是我独自撰写的，除去今年9月脱产到中央党校学习，得空赶写的《实现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长征中围绕领导权的斗争》和《中国革命中心的北移与陕甘根据地的战略地位》外，都曾公开发表。

下面谈谈自己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过程与感受。

### 一、10年攻读

范文澜同志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经常为搞历史研究的同志引用。我还曾听邓力群同志说过：搞社会科学，没有10到15年的积累，是写不出像样文章的。我上大学起，也经历了10年的攻读学习。

真正开始接触和学习毛泽东生平思想是1978~1982年自己在河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学校恢复老校名为河南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期间。当时围绕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社会上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有过激烈的争论。莫衷一是的观点，使自己从父辈和《星火燎原》等革命回忆录中对毛泽东形成的观感，受到很大的冲击。借助于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学习，我把《毛泽东选集》反复读了多遍，包括后来被收回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其中，每篇文章后面的注释，我都一条不落，反复研读。可以说是《毛泽东选集》引导我走上研究中共党史之路的。我们学校中国古代史和世界近代史的教学研究力量很强，许多同学被老师们精彩的讲述所打动，早早地就把研究志向聚焦于那两段纷呈的历史。而我则始终为中国共产党人波澜壮阔的奋斗历史所吸引。先是学习何干之和胡华的中国革命史，后来又读了李新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接着研读了用三个大纸袋子装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和稍后由中央党校出版的

多卷本《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共8册）等基本的党史书籍。河南大学是创办于1912年的百年老校，学校的图书馆藏书很多，各种书籍和解放前的报刊齐全，我记得诸如《独秀文存》、《守常文集》、罗章龙的《京汉工人流血记》、华岗的《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会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后来才知道此书是张闻天主持编写的）、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等等，当时都曾涉猎。最为幸运的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竟然是黄元起先生。他是1928年入党的老党员，后脱党，但仍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和教学，是著名的史学刊物《史学月刊》（最初为《新史学通讯》）的创办人。黄先生不仅指导我如何查资料，给我开了一张长长的书单，而且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什么是“左”倾，什么是右倾，如何辩证地看待历史人物和事件。我的毕业论文《党对富农政策的演变》，从一个侧面贯穿了20多年的党史，除了黄先生的指导外，因从没有写过论文，我把当时《近代史研究》上刊发的郭德宏、梁尚贤、金冲及等老师关于土地革命的论文作为范文来研读、模仿，先后6易其稿，后来以《毛泽东关于富农政策的理论》为题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上发表。这段经历，使我对党史的学习，由对概念和一般过程的记忆，开始深入到注重史料与理论的结合。

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在郑州市第十中学从事高中历史教学。1983年父亲离休后，在帮助他整理书橱过程中，欣喜地发现有一整套上世纪50年代初中宣部印行的《党史资料》（1951~1954年，共24辑），内中收录了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当年撰写的回忆各个时期党史的文章。此外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土地改革文献汇编》、《整风文献》、《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献汇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毛泽东思想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史》、《毛泽东同志会见国际友人斯诺的谈话》、《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材料》、《批判林彪反革命军事路线参考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评论〈水浒〉参考资料》、《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罪行材料》、中共中央组织部编《组工通讯》（1978～1982年，内有大量平凡冤假错案的信息）、《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下），以及历届党代会和历届人大文件集、党的重要会议，如全国代表会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八大二次会议、九届二中全会等的文件集等。整理和阅读这些材料，使自己初步了解了建国后的历史，同时也萌生了报考硕士研究生的念头。当时正在反精神污染，人才自我设计被视为精神污染的一种表现。我所在城市的教育局规定，新毕业的本科生必须工作两年以后才能调动工作或报考研究生。这样，我在教学之余，进行了两年多艰苦的自学和备考。这个时期曾看过当时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选》和《毛泽东诗词选集》，以及198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发表的大量文章和怀念文集、回忆录等。记得那时还曾非常认真地阅读过中央党校编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建设等几本黄皮书，做了不少的笔记和摘抄。回想这三年的自学，虽然很勤奋，但失之泛泛。三年间没有练过笔，除读书笔记外，没有写过一篇文章，甚至连书信也很少写。我考上研究生后，和当年的同事张墨老师（一位忘年交，由海军退役后，在中学教师的岗位上研究中国古代的水军和水战，20多年矢志不渝，发表过多篇高水平的论文）通信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你的文字表达能力远不如你口头表达。非常感激这位前辈的肺腑之言。

1985年9月，我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朱建华先生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中国政党史方向硕士学位。朱先生上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研究生班。他治学严谨，著述丰厚，不仅以东北地方史研究专家而

享誉全国（著有《东北现代史》、《东北解放战争史》、《东北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抗联史》等），而且是中国政党史学科的开创者，他主编的《中国政党史》至今仍是教育部指定的学科教材。他的《中国近代政党史》、《中国政党史词典》、《中国政党人物传》、《中国政党百年风云录》、《中国政党史大事记》、《统一战线纪事本末》和《中国政党史资料选编》，以及多篇相关的论文，在学术界和统一战线工作部门具有相当的影响。我的另外两位授课老师王金钰先生和陈瑞云先生，也是史学名家，她们分别在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史等多个领域，建树颇多。几位先生开设的课程基本上属于中华民国史范畴的，但实际上在学习中却都要以中共党史为参照。比如朱先生讲授国民党、青年党、国社党、农工民主党等党派的历史及其思想渊源和理论主张，评价其得失，十分注重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相比较，注重放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大背景下去分析。这样，就拓宽了我们的思路，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当时，朱先生兼任吉林大学图书馆馆长，这使我们得以用馆长弟子的便利进出内部阅览室和港台书库，甚至在中午休息时帮助那里的工作人员值班、办理借阅手续，从而比别的同学更方便地涉猎了大量的“禁书”。更为难能的是，朱老师耐心地带领我们跟他搞科研，手把手地给我们改稿子，从开始的词条，逐渐到文章和书稿的部分章节，教我们如何选题、如何查资料、如何立意和修辞，逐步养成我们独立的科研能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毕业以后的十几年间。我在民国史领域发表过十余篇论文，几乎全部是在研究生阶段撰写的。比如《从孙中山到邓演达——平均地权学说的历史发展》（《史学月刊》）、《神州国光社与十九路军》（《史学月刊》）、《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史学集刊》）、《工读主义的兴衰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学集刊》）、《简论国难会议》（《民国档案》）、《邓演达平民革命理论研究》（硕士论

文，《中共党史研究》）等。因此，非常怀念那段学习生活，也十分怀念朱老师。朱老师为人高尚，温文尔雅，一派和气，从没有听他议论任何人一个“不”字，总是尽可能地帮助别人，提携学生。毕业后有两次他带领我们编著书稿。我因为在当时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查阅资料相对方便，额外承担了一些统稿的任务。他就一定坚持把我和他一起并列为书稿的主编，我再三推脱，他却在校清样时又把我的名字列上。这使我至今感怀和愧疚。研究生三年，使我具有了独立的科研能力，文字表达水平也有了长足进步。当时虽然没有专门撰写研究毛泽东的文章，但是丝毫没有放松对毛泽东生平思想的学习。特别是对毛泽东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有了切实的感悟。这为我后来撰写出版《当代中国统战思想史》（国家八五社科规划项目，与肖杰合著）和《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社会》（与唐洲雁合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二、在中央文献研究室

1988年6月，研究生毕业后我有幸被分配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工作。非常感谢到学校考察我的孙玉珊和吴正裕同志，感谢文献室的室领导。室里起初分配我参与《毛泽东年谱》初稿的撰写。听老同志讲，这项工作反反复复已经搞了10年了，编写方针几经变化。我先后在副主编冯蕙、吴正裕、赵福亭同志指导下，写1936年7月到1937年7月的《年谱》初稿。这一年在毛泽东波澜壮阔的人生中是不同凡响的一年，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我从查档案开始，先试写了一个月的初稿，领导认可后，就全面铺开搞。文献研究室有非常“幸福”的研究条件。一是有整套毛泽东文稿档案；二是资料室的同志随时把公开发表的关于研究毛泽东思想生平的学术论文和回忆文章，也分别按毛泽东生平时间分类汇集；三是经报批同意后，有可能比较方便地采访

到任何你需要采访的人物（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甚至如陈伯达之类的人物。这是让其他科研单位和高校的同行都无比羡慕的条件。所以，外界有的同行不无偏激地说，在文献研究室只要不是傻瓜，假以时日都能成为专家。在这种有利条件下，我们剩下的就是熟悉材料，将其融入历史背景，按照经胡乔木同志审定的编辑方针编写的问题了。当然，还得查阅《红色中华》、《新中华报》、《救国时报》等报刊和各种回忆录，尽可能多地搜罗可能遗漏的材料。同时，为搞清毛泽东交往或论及的事件和人物，以及一些相关事件的来龙去脉，也得查阅大量的背景资料，包括民国档案，并做很多的考证。当时最大的困惑是感觉《年谱》编辑方针对材料取舍的要求似乎是过于严格了，大量有据可考的历史内容，虽然弥足珍贵，却没能在《年谱》充分展示。当然，这也可能是领导们准备为以后写毛泽东传而有所预留吧。我用了半年的时间（到1988年底），写出这一年的《年谱》初稿，约10万字。不曾想，这居然是所有撰写《年谱》初稿的同志中，参与最晚、记录谱主生平年限最短（仅一年），而文字量却是最多的。这主要是缘于谱主在这一年中丰富多彩的经历。在此过程中和在稍后的一段时间里，我用写《年谱》中积累和涉及的资料，分别撰写出版了《走近毛泽东》（即斯诺与毛泽东，与曹志为同志合著，1990年出版，2003年再版）和《长征途中的毛泽东》（与郑广瑾同志合著，后两次修订再版）。1992年底，《年谱》的副主编终于腾出手来修改我的这段初稿。当时还没有普及电脑，稿子都是手写的，资料大多也手抄的。时隔4年再去翻检、核对这些材料，确实有些怨言。但很快就被副主编们的严谨、仔细所折服。记得我在初稿上采用的是“X月X日谱主（省略）就某某事致电某某某”这种格式，一位副主编认为应该是“关于某某某事致电某某某”。我坚持说，在语法上没错。那位副主编就专门去请教了语言学家吕叔湘等，吕老认为“关于”比“就”更正式，更规范，

后者则比较口语化。再如,《年谱》的主编逢先知同志,为人谦和、民主。他虽为部级领导,却从不允许我们这些小年轻称呼他官衔或老师,我们都当面叫他“老逢”,至今如此。当时他带领我们《年谱》小组(一个处级单位)的同志,逐年逐月逐日逐段逐句地审读讨论稿子,随后又组织室内的专家和室外的专家审读,大家边读边议。这使我受益多多。这样,在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到来之前,《毛泽东年谱》(1893~1949)出版。顺便说一句,从1994年开始,我受命参与建国后《毛泽东年谱》的编写,具体任务是撰写1966~1976年的年谱初稿。我已经比较认真地阅读了这10年的档案,并写出1966年的初稿约6万字。1995年3月,因工作调动离开文献研究室,就没有再持续下去。

我在文献研究室毛组参与的第二项工作是《毛泽东画册》的编辑。这个项目的是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中央批准由文献研究室和新华社合作编辑的。我是画册出版后署名编辑人员中的最后一名,也确实确实是出力最少的,但却可能是受益最多的。我记得只搞了些打杂和外围的服务工作,唯一一件有点技术含量的事情是帮助校对图片内容与文字说明是否相符。当时可能翻阅了上万张照片,为搞清楚拟采用照片上的每一个人物,确实要下一番工夫,多次请老同志帮助辨认。那些历史画面因此而深深地印入脑海。现在随便拿出一张相关的老照片,不用看说明文字,我就能说出个八九不离十。朋友不无夸张地赞扬我这点伎俩时,我就自嘲为看图识字的能力强。因为参与这项工作,我了解了画册编辑出版的全过程。此后的10年间,我在工作之余,主编或以我为主组织编辑出版了十余种画册,其中与姜廷玉、刘家齐同志一起主编的《长征画典》,还获得了1998年度的中国图书奖。参与《毛泽东画册》编辑工作的另一个收获是,1990年夏我随高风、刘东鳌、刘敏同志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去江西、广东、湖南、湖北等省毛泽东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拍摄一些外景照片,以弥补当年历史照片之

不足。他们是专业摄影家，我则主要搜集些文字材料。此行使我萌生一个志向，就是把毛泽东建国前足迹所及，全部重走一遍，一则增加些实际感受，二则拍摄些旧址照片和搜集些坊间的资料，将来写一本图文结合的《毛泽东足迹》（最近翻捡旧作，居然发现两章当年试写的初稿）。20多年来，我利用出差和休假去过十几个省和上百个县的近千个旧址，有的省去十余次，有时一次走了十几个县。比如2002年夏，我和军事科学院的金立昕大校利用休假自费去山西、陕西省，重走毛泽东东征和转战陕北的行程，走了16个县市，100多处旧址、战场等，有很多的感触，了解到许多过去没有留意或是没有接触到的知识。比如，当时正在宣传“与时俱进”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在佳县白云观看到毛泽东当年以“亚洲部”（转战陕北时毛泽东和中央所部对外的化名，有时亦称“昆仑纵队”）名义在观看山西某晋剧团演出的《反徐州》后的题词手迹“与时俱进”，在佳县县委门口看到影壁上毛泽东当年为县委的题词“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这使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党的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这样，我每去一个地方，事先备课，事后就在地图上作出标识，并把搜集来的材料稍加整理归类。现在，只剩下甘肃、宁夏、四川松潘、滇东北等少部分地区还没有到过。正所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

我在文献研究室的第三项工作是参与《缅怀毛泽东》的编辑。这也是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项目，由离休返聘的毛组老组长赵福亭同志任主编，刘益涛和蔡钊珍同志任副主编，我是编辑。文献研究室有个好传统，每个研究组都积累了一些采访记录。由于这些采访大多是有针对性的就事问事，比较零碎，但也为编回忆领袖的文集提供了一定的基础。这次编《缅怀毛泽东》，先是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名义向与毛泽东有过较多交往的老同志发出约稿信（发送范围和名单经室领导审定），约稿信的大意：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经

中央批准拟编此书，请您赐稿云云。大约发出近 300 封信，后来又经过其他渠道直接约请过近 20 位同志写稿。到了约定的回复时间没有回信的，我们就打电话催问。老同志身体不好，无力执笔的，我们就上门采访，回来整理，然后再请老同志审定。有时也需要帮助提供一些背景材料。老同志都很踊跃，一般来说已经离休或退居二线的动作快于仍在岗位上的。但也有个别老同志借此机会为自己的某个历史结论鸣放不平。按照室领导的要求，编辑组十分注重对文章内容的考订、把关。收入的文章对毛泽东的爱戴之情溢于言表，但已全然没有“文革”时期那种过誉之词，非常客观朴实。除个别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在文章中有抬高自己作用的情况外，最后被采用的文章，都是比较客观的，许多情节和史实是第一次披露，史料价值很高，可读性也很强。由于所有撰稿者都与毛泽东交往密切，而且职位很高，涉及的事情大多是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所以，这批文章弥足珍贵。可惜的是，当时因为我们编辑者思想上条条框框过多，有些也很有价值的文章未能收入。在我们编辑组中，工作氛围很好，主编、副主编也干普通编辑的活，特别是赵福亭同志对我很放手。我除编辑一些稿件外，还参与做外联、录音整理、稿件登录和分发等编务，特别是将征集到的稿件分派给大伙，这使得一位副主编不无意见地发牢骚说，究竟谁是副主编啊。赵福亭同志听到后索性向室领导建议，让我也做个副主编。于是，我在文献研究室工作 7 年间唯一一次上了室委会纪要。那时文献研究室所有书稿都是由局级以上领导担任主编或副主编的，只有少数相对不太重要的选题才可能由处级干部做副主编。而我只是个助理研究员，没有任何行政职务，能成为一个课题的副主编，确实是个破例。这是组织上对我的鼓励。在参与编辑《缅怀毛泽东》的过程中，我有些想法：一是对书名有意见。我很欣赏周恩来研究组把缅怀周恩来的文集起名为《无尽的思念》，建议将缅怀毛泽东的文集起名

为《毛泽东与我》。但是，领导没有采纳。二是我对约稿的范围有意见，认为过于强调被约稿者职位的高低。三是对已经收上来稿件的取舍标准有意见，认为标准过严，致使一些很有价值的文章或一些段落情节，没有收入。虽几经建议，但领导没有采纳。那时，自己还比较年轻，不知天高地厚，就通过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发起了全国性的“毛泽东与我”征文活动。中顾委秘书长兼全国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李力安同志欣然出任征文组委会主任，我作为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具体组织协调。这次活动是民间的，但因为得到老同志的关怀和相关组织的支持，居然获得圆满成功（具体情况参见本书附录《“毛泽东与我”征文总结》）。1993年10月30日早晨，原本拟出席征文活动颁奖仪式的胡锦涛同志，因临时有事不能参加，他特地打电话要李力安同志转达他对活动圆满成功的热切祝贺和对活动参加者与组织者的亲切问候。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组长汪裕尧同志和《缅怀毛泽东》主编赵福亭同志出席了当天的颁奖仪式。这次征文活动中结集出版的6本《毛泽东与我》丛书和摄制的9集电视专题片《情系毛泽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缅怀毛泽东》一书的补充，这也是我参与《缅怀毛泽东》编辑工作的额外收获，更是难得的一次锻炼。其中由我独自撰稿并担任策划的电视专题片《情系毛泽东》，是我第一次“触电”。起初也不知道该怎么搞，只是有个简单的设想，就边拍摄边写解说词。因为当时文献室还在和中央电视台合拍一部全方位表现毛泽东生平的大型电视片（原计划也让我参与撰稿，我因太忙就推辞了），我们就想避开生平思想等比较郑重的内容，仅着重突出毛泽东的情感世界。片子共编了九集，每一集的标题上都有一个“情”字。具体的是：一、洒向人间都是情；二、风雨沧桑故园情；三、别梦依稀烈士情；四、万里征途同志情；五、红墙内外卫士情；六、永难忘怀手足情；七、荡气回肠舔犊情；八、浩浩正气人民情；九、神州共忆领袖情。

电视片在北京电视台等21家省区市的电视台播映,后来还出版了录像带和光盘。此后,我又陆续参加了一些电视专题片脚本的撰写,并多次接受过多家电视栏目或节目的采访。

我在文献研究室参与的第四项工作是《毛泽东传略》的撰写。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组织编写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计划在1991年建党70周年之际出齐50卷,但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传记编写任务一直没有落实。当时,由中国人写的毛泽东生平,除悼词外,只有文献研究室为《大百科全书》写的毛泽东词条(经胡乔木同志审定)。在《中共党史人物传》主编胡华同志的一再要求下,文献研究室领导答应承担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传记的编写任务。毛泽东传略由毛组副组长吴正裕同志负责,我被派作帮助其查资料的助手。吴正裕同志“文革”前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文史功底扎实,尤其在古诗词方面造诣很深,他对毛泽东诗词的一些见解深得胡乔木同志的欣赏。他主动提出由他写解放前的稿子,让我撰写建国后毛传的初稿。我诚惶诚恐,认真阅读了20多本各种体裁的传记,用5个多月的时间查阅建国后的毛泽东文稿档案,撰写出约10多万字的初稿。逢先知同志亲自审改,他不仅善于从宏观上驾驭史实,而且他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时期毛泽东组织农村调查工作的亲历者,当时正在编写《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对建国后毛泽东的情况非常熟悉。在他的指导下,我压缩修改了两稿。第三稿是他亲自执笔改定的。因此建国后的《毛传略》很顺利地得到党史人物传代主编彭明老师的认可(当时胡华老师已因病去世)。在这个过程中,记得是1989年秋季以后,吴正裕同志患心脏病,一度住院治疗,病情稍减,他就坚持工作。因为同时承担着几个课题(都很急,相对而言《毛传略》只是室领导口头承诺的任务,而不是由中央批准立项的课题,其重要性稍次),他负责的建国前部分毛传稿较

长时间还没有脱手。在党史人物研究会方面的催促下，他商请毛组其他领导同意，大概是在1991年春节后，让我接手写1934年10月到1949年10月的《毛传略》。稍后，又修改续写了到1927年7月的初稿。整个稿子（12万字）经吴正裕同志审改后，于1991年5月下旬通过人物研究会方面彭明和王洪老师的审核。6月，我曾奉命去陕西省岐山县的“523”印刷厂校对该稿清样（当时仍是铅字排版，整套书是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终于完成此稿，没有影响七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共党史人物传》50卷出版发布会。我因此与人物研究会的多位老师熟识，并在当年的换届年会（党史人物会第二届会员大会，原会长何长工老人已去世，李力安同志被推举为新会长）上当选为理事，还一度成为《中共党史人物传》后50卷的副主编之一。阴差阳错地参与《毛传略》的撰写，使我对毛泽东生平思想的研究有了质的进步。因此，我非常感谢吴正裕同志和毛组的其他领导，感谢逢先知、彭明和王洪等前辈的指导、教诲，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郭洛夫同志的认真编校（我在以后同他的交往中还从他身上感悟到许多为人的优秀品格）。另一方面，我也因为参与此事而倍感自己的浅薄和不足，从而更刻苦地钻研和学习。在文献研究室工作那七年间，我是两地分居，住集体宿舍，老婆孩子在外地，也没有家务拖累，无论白天黑夜，还是节假日，基本上就泡在办公室。特别是晚上下班后，没有任何干扰，每天都能在烟雾缭绕中（抽烟）看五、六个小时的书。在1993年最忙碌的那八、九个月里，我干脆就住在办公室，除去睡觉，眼不离书，烟不离手，连理应享有的一个月探亲假也没有歇，好像有写不完的东西，使不完的劲。那时，思想上也比较苦恼，两地问题和住房问题长期无望解决，每月100元左右的工资，无法养家糊口等，挥之不去。于是，我就自己给自己安排事情，一件事情没搞完，就又承诺了另一本书或另一篇文章，害怕自己闲下来。好像只有忙碌，才充实，

才清静。感谢上天，给予我这样一个催人奋进的工作环境，我对毛泽东研究的知识积累，主要是这个时期打下的。

我在文献研究室的第五件事情就是几度被人诟病的所谓“干私活”。对此，我无可奈何的调侃为：我在毛组的工作分两类，一种是党组织直接交付的，另一种是我主动承担的党的工作。最早是1988年我到文献研究室不久，在与好友张民闲聊，得知他在参与编辑《老一辈革命家家书选》时，搜集了很多关于毛泽东家庭情况的背景资料，就提议编写一本《毛泽东家世》。随后，我们就和高风、唐洲雁等同志分头查找资料编写，于1989年在城市社会经济出版社出版。问世后，很快就出现了多个盗版本，文字上的错谬不少。为正视听，1993年经文献研究室审定，在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此书的增订本。此后，一发而不可收。我前面说到的《走近毛泽东》、《长征途中的毛泽东》、《毛泽东与我》丛书、电视片《情系毛泽东》，以及后来搞的《世纪伟人毛泽东》，当属此列。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好友张占斌（当时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现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积极倡导和组织团队合作编写书籍，并逐步形成了高级领导和著名学者指导、各类专家把关、硕士以上学历的中青年同志协作编写的出书模式，逐步形成了有宋一夫、岳庆平等兄长朋友为骨干的合作集体。我参与其中的（任主编或常务副主编）记得有：《新版〈毛泽东选集〉大辞典》、《当代中国政治事典》、《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大辞典》、《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著作大辞典》、《毛泽东研究事典》、《四十年国是反思》丛书等。现在反省这段经历，从“失”来看，就我个人而言，失之于浮躁、鲁莽，至少是严重地有悖于中国“厚积薄发”的治学传统（我们是边干边学，甚至是有些“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劲头），在旁人看可能是近乎胆大妄为了。文献研

究室的纪律很严，好像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科研人员在工作之外，如果发表一篇文章都需报批审定。老同志中对此，有履行的，也有不执行的。我们的做法，自然是大逆不道了。对此，我们当时就有认识，要么不敢署真名，要么竭力淡化自己在书稿中的作用，不署名或者用笔名，有时明明起主编、副主编作用，但只列名为编委（这倒是有点低调做人的味道），甚至连自己工作单位的名称也尽可能回避。事实上，这样做也是徒劳的。渐渐地“干私活”的名声就形成了。客观上讲，一是单位交付的工作量吃不饱，自己有余力做其他的事情，而且也并没有因为做这些事情而影响完成单位安排工作的时间和质量，一般都是超额完成任务，事实上，业余时间从事的课题，都有利于单位任务完成质量的提高。二是我们在自己的主观愿望上都是认真严肃地对待我们选中的课题，深知这些课题在政治上的严肃性，丝毫不敢儿戏。每一本书的提纲、体例和章节以及词条，我们都要反复切磋讨论，都要请外单位的专家（在本单位不敢声张）参与把关讨论；编辑过程中，我们是猛看、猛学（我们说是“恶补”），边学、边干。初稿出来后，骨干成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同心协力，没有一个人敢懈怠，没有一个人敢偷懒。工作日，每个人把一部分稿子，在晚上审改；星期天则聚在一切讨论解决问题，经常为一个学术问题争吵。我们不懂就问，不会就学，结识了一大批前辈学者，他们给予我们许多无私的教诲和帮助，使人感动，至今一到年节我们还会去健在者家中拜望问候。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坚守基本的政治纪律，正面宣传和研究，从不使用未公开的档案材料。三是今天看，上述书稿的立意正确，总体的质量有保证，也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具有社会需求，得到一些党委和机构的支持，得到一些领导同志，甚至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与肯定。比如《毛泽东研究事典》出版后获得当时由中宣部主持评定的1993年度中国图书奖；再如《新版〈毛泽东选集〉大辞典》出版后

曾经获得山西省政府特等奖，李先念同志办公室曾经调阅审查了“西路军”等有争议问题的词条，结果没有异议，李先念同志还欣然为该书题词（为该书题词的还有薄一波、宋任穷、聂荣臻、王震同志）；87岁高龄的陈云同志曾亲笔为《马恩列斯毛著作大辞典》题词“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江泽民同志则亲自为《毛周刘朱邓陈著作大辞典》题写书名。我们认为，这些绝不只是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对这几本书的关怀和厚爱，而是充分表达了党的领袖在“六四”风波和苏东剧变之后，对全党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殷切期望。我们从未敢用此殊荣为自己谋官、谋利。我们当时虽然没有任何行政职级，但从那时到以后的20多年间，也从没有在自己的工作总结或职称评审材料中提及中央领导同志为我们主编或副主编的书稿题词的事（这是第一次公开谈这些情节）。我们当时就回绝了一些文化公司高稿酬的诱惑，坚持由国家正规的出版社出版印刷这些书籍，以保证其质量和严肃性。唯一至今使我们惶恐不安的是当年不知道这些书稿能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如此重视，否则，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敢发起组织编写这些书稿。实在是负有厚望啊。

### 三、在行政工作岗位上

1995年春节，我携妻儿去李力安同志家拜年（1994年秋，正是在他老人家的帮助下，我们结束了长达9个年头的两地生活），他谈及他在中顾委解散后，中央安排他担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需要找一个懂业务的同志做秘书，问我是否愿意。我当即表示同意。这样，在4月份我就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所工作。此后至今的17年间，我基本上是在行政岗位上工作。

### 1. 秘书岗位上的7年

李老是1935年入党的老前辈，曾经在村、区、县、地、省各级党委的各个职位上工作，又有在人事部、财贸部、中组部、整党指导委员会和中顾委等中央部门工作的阅历，是党的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在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岗位上，他作为亲历者对党史、国史的回顾与研究，其感悟之深，自然是一般的专业技术人员所不能比拟的。除主持当代所的各种科研项目和全国党史人物研究会的工作外，老人家在所长任上公开发表了20多篇学术论文（内部文稿和各种会议讲话除外），多次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新华社的内参转载，其中被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复印的就有8篇。每一次写文章前，都是他在考虑成熟后，先把观点、目的，甚至包括文章的框架告诉我，初稿出来后，他再认真修改。和有些纯粹的研究人员就事论事的思维方式不同，他往往是从大局着眼，把理论与史料、历史与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事件原委和后果影响的分析，见解独特，引人深思。这对我这个习惯于从史料到史料的书生触动很大，从中学到很多分析和研究问题的方法。李老非常关注现实问题，十分注重进行实地的调查研究，每年至少一次或多次去地方对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调研，回来后写出调研报告送中央领导同志或有关部门参考。比如，1995年12月，到辽宁锦州农业试验区调研；1996年11月到浙江温州做股份合作制和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调研；1997年5月到江苏和浙江做乡镇企业改制调研；1998年6月，到闽西、赣南做党史工作和老区建设调研；1999年3月到山西晋中、晋城市做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情况调研；2000年七一前后，到河南许昌、长葛和临颖等县的农村调研，并和南街村的群众共庆党的80岁生日；同年9月，他又到陕西榆林地区做西部开发和防风治沙调研。李老还常常思考历史研究成果的转化

和普及的问题，除在建国 50 周年之际组织全国性的国史知识竞赛和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新中国》电视片等之外，还以很大精力发起并具体组织“大中小学国史教育状况调查”，亲自担任课题组组长（国家十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我是课题组副组长之一）。这些对我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逐渐开始悟出一点如何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个老生常谈却总是言不及义的问题的道理。在李老身边工作期间，除去写过几篇关于毛泽东研究文章之外，我还发表了《关于当前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邓小平理论与国史研究》（发表在《光明日报》，《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股份合作制的性质与发展方向》、《全面准确地理解江泽民关于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党建理论》、《为困难群体谋利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本书收录的 3 篇关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继承发展关系的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了我在李老影响下学风的变化。而为撰写这些文章所进行的研究，则大大地加深了我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及其深远影响的认识。

## 2. 行政工作之余的毛泽东研究

继做李力安同志秘书之后，我又曾在中央办公厅助理巡视员、求是杂志社办公室副主任兼秘书处处长和编委会秘书、挂职江西省抚州市委副书记、求是杂志社办公室负责人、红旗出版社社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办公厅副主任兼服务中心主任和基建办主任等岗位上履任。这些基本上都是行政性的工作，因此，自己一直为本职工作和学术研究爱好之间的矛盾所困扰。前 7 年因为李老对我特别关爱，除差旅服务、文稿起草、办公室日常文件收发等常规性秘书职责外，其他杂务都不用我搞，而是积极鼓励我研究问题。离开李老之后（2001 年元月李老不再担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之后，他说再用我做秘书就浪费人才了，就帮我调动了工作），因为要独当一面，就彻底陷于行政事务之中。只能是挤时

间搞点自己的“业余爱好”了（借用好友张占斌的话，逐渐成为党史圈的“票友”了）。自1995年国家开始实行每周双休日之后，我每周坚持只休息一天，另一天到单位看书（出差和在江西挂职时例外），已经坚持至今。而且，从1995年开始，没有休过一次工龄假，挤出一切时间“还债”（出版社和报刊约稿，师友让帮忙救急）。其中关于毛泽东研究方面的主要有：一是与王宏斌合著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外交生涯第一幕》，讲述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活动。宏斌兄是我读本科时同班、同寝室的同学，是我非常尊重的兄长。他不仅自己在清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等方面建树多多，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而且多年来一直鼓励、引导和帮助我搞学问，是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学习榜样之一。二是在好友韩钢、张树军的一再鼓励下，在郑惠老师和张静如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撰写完成《中共“一大”人物传丛书》中的《毛泽东》一书。这本书是以《毛泽东传略》的基本观点为依据扩充撰写的，约45万字。成书后在送审期间，又得到郑谦、庞松、张琦等学长的帮助和审改，于1997年12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由于成稿比较仓促，撰写过程中，我对过去有些积累和研究的内容，就多写；接触少的内容，就少写。所以各部分内容很不平衡。加之，当时《毛泽东文集》还未出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未出齐，写解放后毛泽东生平时可以公开引用的书籍，除回忆录之类的材料外，主要就是《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文革”时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不便引用），所以，在材料使用上捉襟见肘。在写的过程中，我自己对这本书就不满意，但害怕影响整套丛书的出版时限，就轻率地出手了。尽管书稿通过了送审，没有观点和大的史实错误，但是水平一般。这反映出我在治学问题上的不严谨。朋友们安慰我说，出版了，就好，毕竟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比较详细的毛传。但我本人一直耿耿于怀。终于在2009年红旗出版社为纪念五四运

动 90 周年出版《五四风云人物传丛书》之际，我作了修改，增写了 5 万字。但因为总的框架没有彻底改变，所以修改稿也并不尽人意，只是少了点遗憾而已。三是在 2003 年“非典”期间，我和原来在文献研究室工作的同事边彦军、刘敏、张素华商定，合作编写《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我最早萌生此意，是 1991 年与张占斌、张树军、张民、刘敏等朋友编写《新版〈毛泽东选集〉大辞典》时。后来一直进行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和资料积累，甚至多次在出差时在各地的旧书市寻购建国前出版的各种毛泽东著作版本，已经搜集了包括晋冀鲁豫中央局、晋察冀中央局和东北局印行的《毛泽东选集》等 100 多种解放前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单行本或著作集。而边彦军、张素华同志，1978 年就开始在文献研究室的前身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一直参与各种毛泽东著作的选编和研究，对毛著版本情况非常熟悉。具体分工是刘敏负责 1927 年以前的写作，我负责 1927 ~ 1949 年，边彦军和张素华负责 1949 年以后的。大约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最终完成共 360 万字，我承担部分约 80 万字。书稿完成后，龚育之和张静如老师分别为我们作序，为书稿大大增色。该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四是修订再版《走近毛泽东》和《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其中在修订后者时，我利用重新翻检长征史料的机会，趁热打铁，一气写出 5 篇关于长征的论文，在长征胜利 70 周年之际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史学月刊》和《中华魂》等报刊上。关于毛泽东研究的学术论文我已经撰写了三十余篇，其中在建国 60 周年前夕撰写的《毛泽东：社会主义中国的奠基人》，发表在 2009 年第 12 期《中共党史研究》，大体可以代表我目前对毛泽东的研究水平。

以上是我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大致情况。我常想假如自己一直坚持在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组工作会怎样？研究成果肯定会更多一些，但研究水平又能提高

多少呢？离开毛组17年在多个岗位的历练，既有自己的选择，也有迫于无奈。但无论情愿与否，在任何一个岗位上，对本职工作，自己都未敢有丝毫的懈怠。李老在“三讲”教育活动期间对当代中国研究所一位局级干部讲，“个性要服从党性”。我倒是没有那么高的觉悟，我觉得一个人总要有点担当，一个新的岗位，意味着一种社会责任，也是一次学习和对自我的挑战。如果一味地怨天怨人，只能一事无成。所以，自己对这些工作都是十分投入的，也都或多或少有些可以自慰的成效。我想这些工作对我开阔眼界、增加对社会和国情的认识、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乃至对我学习和研究毛泽东肯定会大有补益的。但是，在我内心仍然期待着能早日重回研究阵地。

蒋建农

2012年11月19日